

北京文博

BEIJING WENBO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主办

1999

3



50年北京文博大事回顾

《北京文博》编辑部编

• 王府井发现二万年左右的古人类遗址 •

1996年底考古人员在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工地发现了古人类活动遗址。出土石制品200余件，有石核、石片、石器和碎屑；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骨片300余片，如牛、马、鹿、兔、鸵鸟等；还发现用火遗迹，它们均出自距地表12米深的河湖相地层。根据遗址的地质地貌和石制品的文化特征及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确定该遗址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即考古学年代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并推测是一处古人类进行加工石器和生活的地方。这次发现在北京城区尚属首次，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家首都发现二万年左右的古人类遗址。它填补了北京平原地区从未发现过旧石器的空白。



• 上宅遗址的考古发掘 •

1984年北京平谷县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宅遗址。上宅遗址揭示的三期文化遗存的地层关系，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从而为建立北京地区新石器文化分期序列，奠定了基础。上宅文化的发现和确定还把北京地区与周围新石器文化的源流、体系类型和相互关系的探索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 雪山遗址的考古发掘 •

1960年在昌平县城西4公里处的雪山村，发现了雪山遗址，次年北大学生进行了实习发掘；1981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对遗址重新做了调查与钻探工作。雪山遗址首次在北京地区揭示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堆积层。



• 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 •

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包括都城和墓地两部分，自70年代开始挖掘，持续了20余年，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其上的铭文为夏商周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遗址中既有古城址，又有诸侯级墓葬的西周时遗址，在全国仅此一处。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克罍，盖内和器壁内有相同的43字铭文，记载了西周初年周王册封燕侯之事。



• 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墓的发现 •

1974年8月在北京丰台区大葆台发掘的大型汉墓，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黄肠题凑”墓，它的墓葬形制和棺槨结构，保存比较清楚和完整，为研究我国古代“黄肠题凑”墓的结构和葬制，并为进一步探讨包括“明堂”、后寝、“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正藏”和“外藏椁”的汉代帝王葬制，提供了十分重要和珍贵的实物资料。



• 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发掘和整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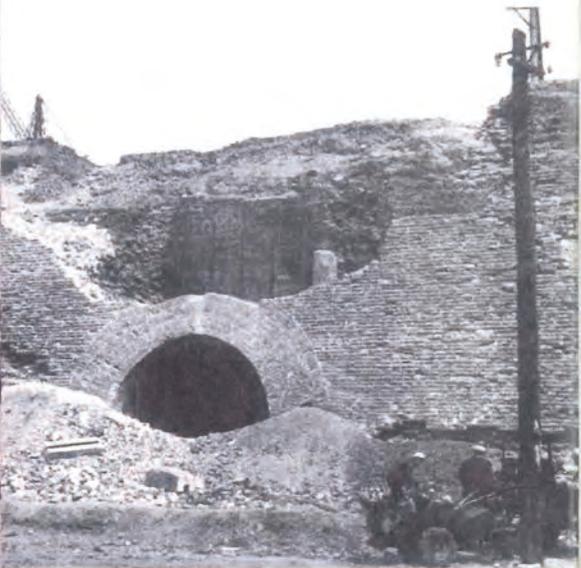
1956年是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以发掘拓印房山石经作为纪念的献礼。1956年4月开始在石经山开洞拓印，1957年夏开始对云居寺地穴藏石经的发掘，1958年底全部拓印工作结束。1980年成立“房山石经整理研究小组”陆续编辑出版了《房山石经》。这次房山石经的发掘拓印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 金中都南城墙水关遗址的发现 •

1990年10月在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凉水河北岸，发现了金中都南城垣丰宜门东侧河道出水的水道。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大的古代都城水关遗址。



• 元大都城的考古与发掘 •

元大都城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从1964年开始，至1974年基本结束的。在这十年的考古工作中，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并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迹。出土了一批瓷器、铁器、生产工具及建筑构件等。这对研究、复原元大都的平面布局、建筑形式，以及居住在这个城市里不同阶层居民的生活情况，均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 昌平十三陵定陵的发掘 •

1956年在昌平区明代帝陵——定陵进行的考古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以为科研获取实物资料为目的进行的有计划科学发掘，因而它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所揭示的地下宫殿及其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为北京明代考古树立了一块丰碑。



● 首都博物馆的筹备和建立 ●

1953年4月27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召集专家及社会知名人士进行座谈，讨论关于建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1954年2月筹备处正式成立。经过20多年的反复曲折，首都博物馆终于1981年10月暂以北京孔庙为馆址正式建馆开放，它是北京市最大的地志性综合博物馆。



●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

建国初期，北京就提出关于城市规划的设想，1958年正式提出方案，这个方案提出的若干原则，如从历史形成的基础出发进行改建、扩建，控制城市发展规模，发展远郊卫星城镇等，也为后来的规划方案所沿用。1983年，北京市重新修订的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得到正式批准，内容包括：①城市的性质和规模；②城市布局；③旧城的保护和改造；④住宅和生活服务设施；⑤城市交通；⑥城市环境和城市绿化。其中的第三点对北京古都风貌的保护，制订了一些基本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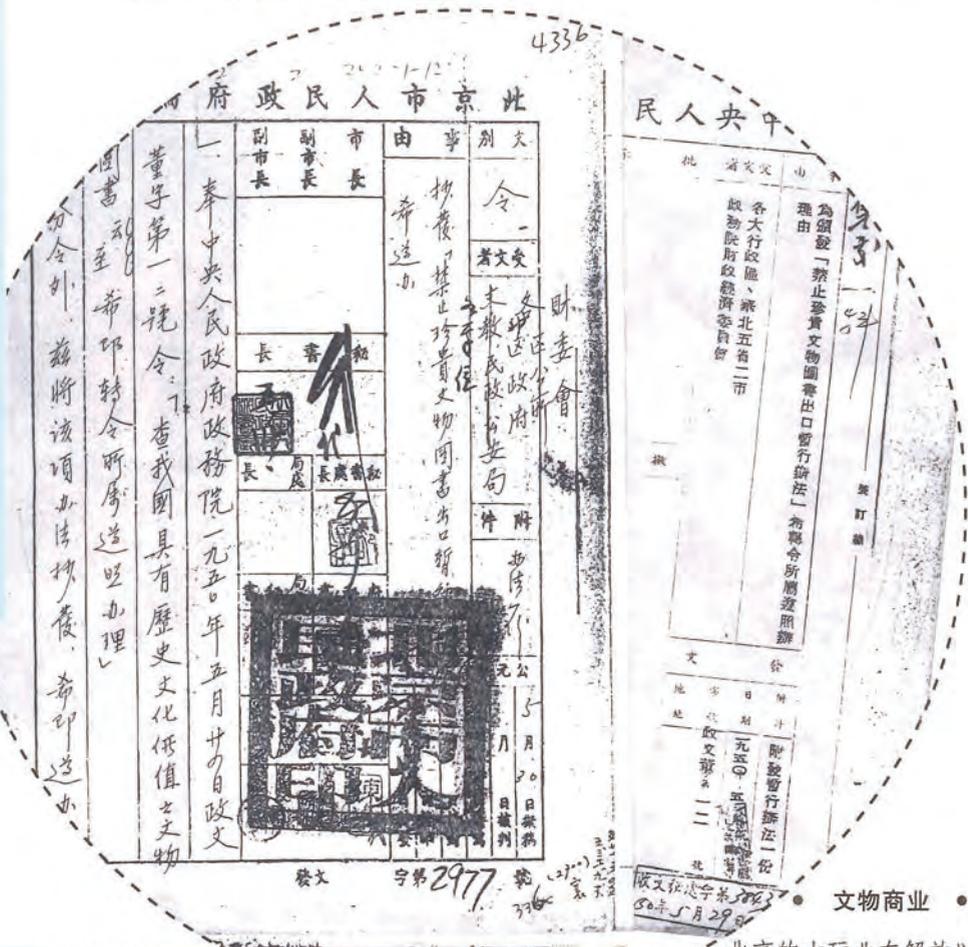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北京的文物立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遵照执行，这大概是解放后北京执行的第一部文物法规。改革开放后的这二十年，是文物法完善发展的二十年，北京地区已基本形成了由国家大法及配套的法律法规与较完善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相结合的法规体系，文博工作基本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邓小平
一九八〇年
九月

• 文物保护 •

1984年，由《北京晚报》等六家单位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以保护文物为主题的大型群众活动。邓小平同志为这一活动主题辞。



• 文物商业 •

北京的古玩业在解放以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51年6月，北京市工商联成立，正式将古玩业同业工会合并于历史艺术文物业工会。1956年，古玩业与其它行业一样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北京88家私营户合并为18家，由商业百货部门管理。1960年5月1日，北京市文物商店成立，标志着文物商业由单纯牟利的古玩业，正式转变为对文物进行收集、保管和进行有选择经营的文物事业单位，文物商业经营性质得到彻底改变。改革开放以后，成立了文物部门监管的旧货市场和拍卖公司，文物商业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彩四)

卷首语

北京的历史地位使北京列为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近五十年来,北京的文物、考古、博物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我欣喜地看到北京的重要考古发掘对北京史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看到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在整个社会文明建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也衷心地祈盼北京在建设现代化国际都市的同时,保护好历史文化,让北京这颗历史明珠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更加熠熠生辉。

侯仁之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



● 文物工作

保护历史风貌 发展文物事业

——北京文物事业五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梅宁华(6)

关于欧洲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考察报告 北京市文物局(9)

台湾文博状况考察札记 张展(15)

● 燕史研究

《燕下都》陶文释文补正 张晓云(20)

● 北京史地

论北京古代都邑形成与水资源关系 苏天钧(24)

历代帝王庙初探 傅幸(37)

辽代白塔寺史迹考 黄春和(46)

北魏太和造像年代质疑 刘之光(50)

房山石经与云居寺 杨亦武(54)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四合院平房保护区 刘季人(71)

京都庙会风俗源流纵览 习五一(75)

门头沟区的水利刻石 宋霞(85)

● 古建修缮

故宫筒子河宇墙维修工程的施工与监督 焦占红(89)

● 民俗谈往

“七夕乞巧”古今谈 王丹(91)

●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 1999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王辅宇(98)

封面:法海寺明代壁画——水月观音

封底:法海寺山门

封二至彩插四:50 年北京文博大事回顾

封三:房山云居寺石经的保护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任:宿白

副主任:梅宁华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心 马希桂 秦公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平 马法柱 王丹江 孔繁峙 刘建业 成大生 张展 张增光 宋大川
陈平 陈旭 荣大为 赵其昌 侯明 晋宏逵 徐伟 徐明 舒小峰
韩永 温桂华 葛英会 傅公钺

主编:张展

编辑部主任:陈晓苏

本期责编:陈晓苏 魏伯涛 张岩

美术编辑:田冰灵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 CULTURAL RELICS WORK

- Safeguard the Historical Style of Ancient Buildings, Promote the Cause of Cultural Relics by Mei Ninghua(6)
- Exploration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 Cultural Cities in Europe
.....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al Relics (9)
- Records 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Antiquarian and Museum Work of Taiwan
..... by Zhang Zhan (15)

● HISTORIOLOGY INTO THE YAN STATE

- Suppliments and Amendments to the Decipherment of Pottery Inscriptions in the
Lower Capital of the Yan State by Zhang Xiaoyun (20)

● BEIJING HISTORY AND GEOGRAPHY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Cities and Water Resources in
the Beijing Area by Su Tianjun(24)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mperial Temple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 by Fu Xing (37)
- On the Historical Remains of the White Pagoda Temple of the Liao Period
..... by Huang Chunhe (46)
- A Query about the Date of the Northern Wei Taihe Image
..... by Liu Zhiguang (50)
- The Fangshan Stone Scriptures and the Yunju Temple by Yang Yiwu (54)
- The Reservation with Single-story House Quadrangle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ighth
Lanes North of Xisi by Liu Jiren(71)
- On the Origin of the Custom of Holding Temple Fairs in the Capital
..... by Xi Wuyi(75)
- Irrigational Stone Inscriptions in Mentougou District by Song Xia (85)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3, 1999

● REPAIRS OF ANCIENT BUILDINGS

Repairs of the Protecting Walls along the Moat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ir Supervision by Jiao Zhanhong (89)

● ANCIENT FOLKLORE

Ancient Custom of "Girls begging Needle Work Skill from the Vega in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on" by Wang Dan (91)

●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Event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2nd, 1999) by Wang Fuyu (98)

EDITORIAL BOARD OF THE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u Jimin, Li Xueq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ans: Mei Ninghua, Liao Jin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Qin Gong

Members: Yu Ping, Ma Fazhu, Wang Danjiang, Kong Fanshi, Liu Jianye, Cheng Dasheng, Zhang Zhan, Zhang Zengguang, Song Dachuan, Chen Ping, Chen Xu, Rong Dawei, Zhao Qichang, Jin Hongkui, Xu Wei, Xu Ming, Shu Xiaofeng, Han Yong, Wen Gui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Wei Botao, Zhang Yan

Art Editor: Tian Bingling

It i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保护历史风貌 发展文物事业

——北京文物事业五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梅宁华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五千年华夏文明在这块土地上薪火相传、经久不衰。近现代史上更有无数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辈在这里谱写出民族解放的壮丽诗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古都北京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北京的文物事业也翻开了划时代的崭新的一页。

1949年新中国刚一成立,文物保护工作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故宫、天坛、颐和园等都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回到人民的手中,其中绝大部分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管理。为了使全市的文物保护工作纳入正轨,1951年7月1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的北京市文物调查组正式成立,其任务是进行保护北京地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此后调查组积极开展文物接收和考古发掘等文物保护工作。1954年2月,首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并于当年举办了《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1957年10月28日,故宫、雍和宫、孔庙等共36项文物古迹被公布为北

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首都博物馆筹备处撤销,另组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负责北京市区、县的文物考古工作,北京市的文物保护队伍逐渐扩大。自6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十年浩劫”期间,我市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受到较大冲击,大量文物古迹和私人收藏被毁坏。当时,我市文物工作者出于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精神,1967年2月13日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正式成立,负责收集、整理、保护红卫兵查抄的有价值的古书文物,并对革命文物和古代建筑进行调查保护。当年8月份,该小组迁入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办公。为了集中力量深入开展工作,1968年11月29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首都博物馆筹备处、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三家单位又正式合并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并于第二年建立了文物队、图书队、文物发掘队、文物清理拣选队四个下属职能单位。这次机构调整不仅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使我市文物保护工作全面开展得到保证,也为我市今后的文物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无论解放



初期还是“十年浩劫”期间,我市的文物保护工作都得到党中央的关怀,北海团城、古观象台、圆明园遗址、袁崇焕墓等文物古迹的保护,定陵的考古发掘,徐悲鸿纪念馆的建设都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开展的。我市文物工作者也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保护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北京市的文物工作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1979年11月28日,市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此后各区县先后成立了文物管理所直至组建区县文化文物局,专门负责本区县境内的文物保护工作;成立了我市古迹保护委员会做为政府的咨询机构;成立了市文物研究所负责全市的考古发掘工作;成立了市古建筑研究所负责对我市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及修缮设计;成立了市文物鉴定所负责出境文物的鉴定工作;成立了市文物建筑修缮质量检查站负责对古建修缮的质量监督;组建了文物保护协会、博物馆学会、考古学会、东方收藏家协会等群众性民间组织;创立了文物保护基金会。1981年11月7日,市人大七届十六次会议正式批准公布实施《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这是我市第一项文物规章。1987年市人大批准公布了《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此后又制定、修订了8项政府规章并予以实施。为加强对文物建筑的保护,建立了巡视检查制度,市区文物管理部门每年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视检查,查处了一批私自拆、改、建项目,消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文物是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物工作者引导全社会重新认识文物的价值,从基础工作做起,全面推动文博事业的发展。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



开展全市文物普查,确认我市有文物古迹7309项;公布了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使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达到265项;划定了五批共202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保护了文物古迹周围较好的环境景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部建立了“四有”档案;为了使后人以史为鉴,将15处帝国主义列强侵华遗址、遗迹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并设立了标志碑;为加强对古都整体风貌的维护,将25处具有传统风貌特色的地段和传统街区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以“谁使用、谁维修、谁受益”为原则积极鼓励全社会投资修缮文物,二十年来共投资约4亿多元,抢险修缮了司马台长城、天宁寺塔、大觉寺等一百余项文物建筑,修缮后开放了慕田峪长城、湖广会馆、恭王府花园、雍和宫、东岳庙等150处文物景点;长城、故宫、北京猿人遗址等五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地下文物保护方面,公布了两批地下文物埋藏区,有计划地发掘了琉璃河商周遗址,发现西周燕国都城;开展了延庆山戎墓葬遗址、门头沟龙泉务窑址、平谷上宅遗址、房山镇江营遗址等项目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进一步认清了北京的历史发展脉络;文物部门还配合上地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北京西客站、京石高速路、陕甘宁天然气进京、东方广场、颐和园管理处地下文物库等大型建设工程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工程,取



得了金中都水关遗址、王府井古人类活动遗址、元代政治家耶律铸夫妇合葬墓等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市场方面,在发挥国营文物经销主渠道作用的同时,积极扩展代购代销,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文物监管旧货市场、举办了文物艺术品拍卖;我市现有文物监管旧货市场7处,从事文物拍卖的公司15家,北京逐步成为全国文物流通中心。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中,我市文物工作者还继续指导、配合我市废品公司各收购站及北京铜厂、造纸厂等单位,从回收物资中挑选出古钱币十余吨、珍贵文物1389件,包括国宝班簋、波斯文鬲炉等。在博物馆建设方面,筹建开放了首都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炎黄艺术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中国科技博物馆等数十家博物馆,使北京地区拥有博物馆达100座,并将其中51座公布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地区的博物馆现拥有馆藏品226万件,不仅常年在馆内举办固定陈列,而且经常举办临时展览,深入厂矿、机关、学校,每年举办青少年学生参加的冬、夏令营等多种活动,现年接待观众达4000万人次。自1991年还开始实行北京地区博物馆通用年票,方便了市民参观。在文物宣传和普及广大市民文物保护知识方面,1984年北京市文物局与北京日报社等6家单位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当年收到国内外捐款数百万元;1991年举办了首届北京文物节、1993年举办了首届文物博览会、1995年举办了纪念北京建

城3040年活动,1999年北京市文物局与北京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电视专题片《古都北京》,编辑出版了大型图书《图说北京史》、《北京文物精华大系》。这些工作提高了广大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而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的广大市民又成为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的坚强后盾。

近二十年,也是我市文物工作大力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二十年。我市制定了“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的方针,确立文物是资源的观念,努力发挥文物的价值。不仅每年都有三至五处文物古迹对社会开放,文物古迹成为我市开展国内外旅游的基础。市属博物馆也举办赴外展览二十余次,《老北京民俗展》、《孔子儒学展》、《茶文化展》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市文物局对内也不断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对下属单位实行了目标责任制和馆长、负责人聘任制,量化工作任务。鼓励博物馆实践社会化,增强自身造血机能。

北京既是一座文化古城,也是一座发展的城市。市文物部门以“既有利于城市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为原则,加强了在城市建设和危旧房改造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在市区文物部门调研的基础上,市政府有关部门先后批准了五批涉及六个城区42个危改片的211项需要保护的傳統建筑名单,根据其价值制定了原址保护、易地迁建和收存构件等不同的保护措施,并与开发建设、施工部门共同执行。一些大型基建工程在项目审批时尊重文物部门的意见,在与文物保护发生矛盾时给文物“让路”。

国务院在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指出,北京的发展方向是“世界一流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全市文物工作者,都应以此为目标,高举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努力开展我市的文物保护工作,为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永葆青春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关于欧洲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的考察报告

北京市文物局

根据北京与巴黎、罗马友好城市文化交流的协议项目,由北京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率领的北京文物考察团一行七人,于1999年5月24日至6月5日,赴法国和意大利先后考察了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比萨、罗马、梵蒂冈等六座欧洲历史文化名城(以下简称欧洲六城)。此次考察的任务是了解欧洲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学习借鉴他们先进的保护理念和保护管理经验,找出我们的差距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切实加强当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

考察中我们分别与法国文化部博物馆局、巴黎市文化局、巴黎城市规划研究院、罗马市文物保护局的负责人和巴黎市小宫博物馆、塞尔努奇博物馆、罗马市政厅博物馆、罗马历史文明博物馆的馆长与文物专家进行了深入会谈。实地考察了古罗马市场的考古发掘工地和罗马市政厅博物馆的

古建筑维修与内装修现场。实地观看了罗马青铜城徽和巨幅油画的修复工作,与文物维修工程师进行了直接交流。参观了古罗马斗兽场、凡尔塞宫、圣马可广场、圣彼得教堂、梵蒂冈博物馆等一批有代表性的文物景点。徒步行程60多公里考察了欧洲六城的城市格局、道路交通、广场绿地、市政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等方面的情况,并注意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审视思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现将考察的主要收获和认识报告如下。

一、欧洲六城的先天优势 与北京城的几点比较

欧洲六城与北京城都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都具有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共同特点。各自最优秀的文物都被视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于中西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模式不同,两地的历史名城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历史名城保护工作的角度看,考察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了以下几点。

1. 年代大体相当但社会历史背景有所不同

欧洲六城中罗马是历史最久的城市。罗马古城建于公元前500年,已有2000多年建城史,现存的城墙是19世纪修筑的,它像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保护着公元1-2世纪古罗马帝国首都的著名文物古迹,断壁残垣和一柱一石。其他五城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比萨、梵蒂冈的文物遗存主要是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创造的,大体与北京城元明清三朝古都的年代相当。从同处于同一时代的层面看,欧洲五城与北京城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两地历史名城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有所不同,所以文化特点差异很大。

2. 城市整体格局和规划特点不同

欧洲六城整体平面均为不规则团形,全城格局呈开放型放射状。北京明清古城平面为凸字形(原计划建成回字形),规模宏大、布局严整,中轴线突出,左右对称,全城格局呈封闭型棋盘格状,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独一无二。

3. 古建筑的材料和结构不同

欧洲六城的古建筑都是大理石、花岗岩或粗石类的拱形石结构建筑,从宫殿、教堂到普通民居都是如此。建筑装饰也都是石刻雕像或青铜铸像。这种建筑的整体承重性强,坚固耐用,寿命长,不易烧毁,不怕日晒雨淋,抗自然与人为破坏的能力较强,上百年、几百年的古建筑随处可见,沿用至今依然如故。欧洲人把石头变成了建筑艺术。保护维修工作难度相对较小,主要是防风化侵蚀,清洗楼面污染物等(他们叫洗楼)。

北京的古建筑是砖木结构,木结构承重,砖墙只起围隔作用,许多古建老墙中都用碎砖头和渣土填充。从王府、寺庙到大片民居都是如此。建筑装饰跟着木头走,多是彩画,或有砖雕。这种建筑的安全使用期短,最大的天敌是水和火,漏雨易糟朽倒塌,失火易烧毁难救,年久失修必成危房,抗自然与人为破坏的能力较弱。北京的古建筑多为百年左右,几百年的原装建筑就很稀少珍贵了。保护维修工作难度相对较大,要延年益寿就要拆开大修,更梁换柱,重作彩画,重砌墙体。尽管中国人把木头变成了建筑艺术,已有近万年历史,自成体系,博大精深,却给我们今天的古建筑保护工作出了一道难题,维修任务重、耗资大而且需要经常进行。

4. 建筑高度和城市公共空间不同

欧洲六城的古建筑一般都是3-7层的楼房,整个老城区可谓楼房林立(梵底冈除外)。楼房居住空间大,人口密度高,要

求城市必须有较多较大的公共空间,以满足人们室外活动和交往休闲的需要,所以他们的广场、街心花园、楼间绿地非常多。至今巴黎人还保留着在街头休闲观景、罗马人喜欢在广场娱乐的传统习俗。

北京旧城主要是平房四合院,最大的故宫、王府也是放大的平房四合院。平房四合院占地面积大,人口容量小,为了容纳整个城市人口的总量,所以北京旧城规划建设的面积较大。但城市的公共空间却很少,城市公共空间被分散安排到了各家各户的四合院中,人们关起门来种花栽树,自我享受十分惬意。但当人口急剧增长,优雅安详的四合院变成了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室外又很少有公共活动空间时,居住生活环境恶化。

5. 道路宽度和道路网络的网络形态不同

欧洲六城中,除梵底冈、威尼斯水城外,民用楼房多,人口密度大,加上当时的交通工具多是轴距较宽的马车(与今轿车轴距差不多),为便于人们出行,当时的道路建设的都比较宽,一般道路的宽度今天仍能在一侧停车,一侧单行。而且每个楼房周围都是环路,每个广场周边都有好几条道路相通,全城的道路网络是开放型放射状,四通八达。巴黎的城市规划专家告诉我们,这种设计还与当时的政治统治方式有关,如一旦某个广场发生聚众造反事件,军队可以迅速从四面八方赶来冲散镇压。据了解,他们的旧城区至今没有出现过为了扩宽或新修道路被迫拆除古建筑的情况,至今还能适应现代城市汽车多、旅游人口流量大的交通问题。

北京旧城广大,人口密度相对较小,当时出行多是坐轿骑马,故胡同狭窄,大街主干道也不宽,路网密度低,环路、支路少。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统治森严,不允许平民百姓乱串,大街小巷实行宵禁制,所以道路网络是封闭型棋盘格状。这种格局绝对难以适应今天现代城市生活汽车多、居

住和旅游人口流量大的交通与停车问题。

6. 市政排水基础设施不同

据了解,欧洲六城的市政排水管道都很宽大且系统完善,属超前设计。甚至威尼斯的城市污水很早就是先沉淀后再向运河、大海中排放的。

北京旧城的老排水设施很差。据我们了解,一般只有一米左右的直径且不成系统。居民污水只能向河湖水系中排放。比较讲究的大宅院也只是埋入地下几十个无底大陶罐做渗水井,让污水慢慢渗入地下。到了民国时期,河湖水质污染已十分严重,出现了不少“龙须沟”和“盖板河”。

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比欧洲六城与北京城的差异,不是为了比较谁先进谁落后,只是为了说明以下两点。

1. 欧洲六城之所以能够完整保存下来,没有经过任何大的改造,还能基本适应今天现代城市生活和旅游功能的需要,与他们的建筑坚固耐用、道路宽交通顺畅等先天有利的客观条件有直接关系。

2. 北京城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有我们自身的城市特色,另一方面在历史名城保护和旅游功能的发挥上,存在着比欧洲六城更多、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索解决。

二、欧洲六城保护的基本做法和主要经验

欧洲六城集中体现了欧洲历史文化最辉煌的成就,历史名城的完整性和整体风貌得到了举世公认的最有效、最好的保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的文物具有三大特点:即富于变化的建筑物、逼真求实的雕刻塑像、细致入微的油画壁画。建筑、雕刻、绘画又往往完美融合在同一建筑物上,其最高成就集中表现在豪华典雅的宫殿、雄伟高大的教堂和收藏巨丰的博物馆美术馆中,并与数量

众多的民用建筑、广场喷泉、花园绿地、河湖水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经过多年建设和积淀形成了今天充满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神秘宗教氛围和高雅艺术风格的历史名城。其巨大的文化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天天人流如织,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国际旅游城市。他们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做法和主要经验至少有以下几点。

1. 保护意识强,共识程度高

他们对历史名城的保护,有一个从文化崇拜意义上的保护理念向文化经济意义上的保护理念的发展过程。

最初政府和文化知识界就普遍认为,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名城是欧洲文化艺术史上两个颠峰时代的产物,是令人难以超越的文化经典,必须认真保护研究和学习继承。不仅古罗马的斗兽场、万神殿要保护,古罗马的断壁残垣、一柱一石也要保护。不仅米开朗其罗、拉菲尔的不朽之作要保护,整个佛罗伦萨也要保护。这种出自文化崇拜意义上的保护理念从一开始就有很高的起点。

后来欧洲的文化旅游首先从历史名城兴起,如本世纪的前30年,佛罗伦萨就开始从意大利的“文化首都”发展为旅游城市,修建了火车站和高速公路。今天欧洲六城都已是非常繁荣的国际旅游城市,据了解巴黎现在每年的外国旅游人口就高达7000万。历史名城成为旅游业的重要支撑和创收基础,显示出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娱”几乎带动了这些城市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了这些城市的生存基础和经济稳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就使文化经济意义上的保护理念和社会共识提高到深入人心和不可改变的程度。

2. 在旧城外围建设新城区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在旧城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必然出现的种种

矛盾和冲突,新旧城区各自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互为补充。

欧洲六城由于具有先天有利的整体保护的客观条件,本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和改造。从整体到个体、从道路到广场、从地上到地下都得到了精心保护和日常维护。旧城区的性质与功能也不断向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文物研究展示中心和国际旅游城市发展。教堂继续保持着古老的宗教功能并免费供游人参观。其它重要的古建筑少数作为政府办公,多数作为博物馆美术馆使用。许多古建筑楼房的一层普遍改造成为旅游服务的小型商店、餐馆、换币银行和书店等。旧城改造主要进行地下电网、供暖供气、上下水等无碍历史名城风貌保护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为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更大需要,罗马早在墨索里尼时期就开始在罗马古城的南侧建设新罗马城。巴黎则在旧城区外围依次建设了历史风貌协调区,拉德芳斯新区和工业区。他们在新城区主要建设住宅楼、公司大楼、大型宾馆、商场和购物超市等,从根本上避免了旧城保护与城市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3. 严格依法保护,管理机构健全

首先是立法早、执行严。法国和意大利早在1913年和1939年就制定了文物保护法。而且依法保护管理严格。如意大利的五座历史名城的保护区中绝对没有建设过一座现代建筑。罗马市文物局的负责人比喻说,如果在罗马20平方公里的古城中建设一座新建筑物,就等于在你们的故宫里建设新建筑物一样不可思议。但只有巴黎出现过例外。据介绍,60-70年代迫于当时的人口压力,政府曾批准在旧城区建了一座很高的玻璃幕墙塔楼,当时就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这种破坏历史名城风貌的苗头被很快遏制住了。至今这座建筑孤零零地矗立在旧城之中,像一个“怪物”非常刺眼。

第二是保护机制有效。如法国的法律

规定,公用古建筑全部由政府拨款维修,民用古建筑由私人出资必须每15年维修一次,主要是洗楼。如果私人不修政府将强行维修,再由个人付款。久而久之成了调整旧城区人口构成的手段,无力维修的人便搬到新区居住,有能力的人住到了旧城区,使文物建筑得到有效保护。

第三是政府的保护管理机构健全。如法国文化部共有六个局,其中就有三个局是文物保护机构,即博物馆局、历史文化遗产局、历史文物建筑局。他们职责明确,分别负责博物馆文物、古建筑管理检查、维修工程审批和质量监督等,而且具有相当于我国规划局、建委的很多职能,是管理城市规划建设的首要部门。巴黎市设有历史文物建设局,主管全市建筑工程的许可证,保证了巴黎风貌的维护。足见政府对保护历史名城权力机关设置的高度重视。

第四是体制上是分级管理。法国和意大利一样,国家级古建筑和博物馆的保护经费、维修工程等全部由文化部直接管理。巴黎市政府只负责市级古建筑和博物馆的保护管理。职责分工十分明确。这与我国的属地管理与上级业务监督指导相结合的体制不同。据了解,法国全国有33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巴黎有99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的文物类博物馆美术馆共2400个,市一级政府的保护量很大。

第五是保护维修的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形成了产业规模。欧洲六城文物保护维修的工作量很大,涉及古建筑、雕塑、油画、青铜器等各类博物馆藏品。从事这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众多,大部分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方面的技术专家数量远远多于理论学术专家。他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丰富,务实不空谈,是最能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以他们为骨干的文物保护维修企业很多,仅罗马市就有100多家大公司,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重要的维修工程按照市场经济规则,通过招投标进行。文物管理部门为保证质量,一

般不选择报价最低的公司并依法审批工程方案,进行质量监督。考察中我们还特别注意到了他们对“修旧如旧”维修原则含义的理解、把握程度和技术手段,以达到保护文物延年益寿为最终目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们此次考察期间,正值欧洲六城为迎接天主教 2000 年“圣年”,进行大规模文物建筑维修的高峰期。六座历史名城几乎都成了“大工地”,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可以看到维修教堂、博物馆、公用、民用古建筑的繁忙场面。亲身体验了他们全力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名城文化形象的执著精神、巨资投入和壮观场景。这种情景是在国内没有见到过的。

三、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 3000 多年的建城史和 800 多年的建都史。北京的城市特色不仅在中国为仅有,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更是独树一帜。保护北京的城市特色不仅是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也是我们对人类承担的重大责任。随着北京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加快,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面临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本世纪 80 年代以前,为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要求,拆除了以北京城垣为代表的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进入 90 年代后,随着旧城改造的全面展开,旧城许多地区失去了原有的传统景观、高大建筑的日益增加,使旧城区的历史风貌逐步被“盆景”化。北京旧城改造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大决策,对旧城危旧房不加以改造,北京的历史名城地位难以为继,关键在于改造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这一点也是市委市政府近年来十分关注的问题,这关系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将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21 世纪北京旧城将形成怎样的面貌。结合这次对欧洲历史文

化名城的考察,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

1. 进一步廓清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总体思路,确定保护与建设并举的方针

北京旧城 62.5 平方公里,危旧房多,基础设施差,旧城改造势在必行。但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开始大规模改造旧城以来,由于没有确定相应的原则和方针政策,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多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为平衡改造资金,在旧城内建设了许多大体量、超高层、现代样式的建筑,这就使旧城在整体风貌到单体建筑特色上都很难与北京的传统环境相协调。这次考察中我们了解到,巴黎市内有许多新建筑,但并未损害巴黎的整体风貌。这是因为巴黎确定了明确的保护原则,任何新建筑必须与传统建筑相协调。北京也曾一度要求建筑有传统风貌,如高大建筑加上大屋顶或亭子,效果并不理想。另外,从旧城改造现有情况看,往往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确定方案,项目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和设计,不能形成整体效果。北京旧城形成初始,自元代开始就有严格完整的设计和原则,历经数百年形成了独特的风貌。改造旧城并达到历史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必须采取保护与建设并举的方针,以历史风貌为依据,总体安排旧城的改造和建设。这要求对旧城改造从总体规划到单体建筑都必须有明确的要求,确定相应的原则。

2. 将历史名城保护与北京的产业建设紧密结合,有效整合北京文物资源优势

我们通过这次考察了解到,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的支柱产业,即城市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旅游业。我们目睹了这几个城市游人如织、饭店林立的景象。相比之下,北京的旅游业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有相当大的差距。多年来,北京的旅游主要是“老五件”(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八达岭),游客滞留天数和消费水平

下降。这种旅游是景点旅游而不是文化旅游。北京现在每年 200 多万的境外游客,与北京的历史名城地位不相称。即使目前这种状况,北京的旅游业也主要是依托文物形成的物质条件。但多年来旅游业重硬件即饭店和服务设施建设,轻对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很难取得突破性发展。从北京的地位和条件看,北京应该成为旅游城市,存在形成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先天优势,但如不加引导,文物资源很难实现其经济价值。以中心城区东西城为例,近年建了许多大宾馆、大商场,相互竞争,效益下降,而这许多大宾馆、大商场建设很多破坏了中心城区原有的景观环境和文化氛围。在欧洲几个城市的中心城区,实际上很少有大型商业设施。我们认为,中心城区如有计划内地改造几条四合院街区,发展有传统特色的旅游业,其经济效益并不一定比大商场低。为此,必须把对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放在发展和扶植北京旅游产业的角度考虑,充分认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北京旅游产业发展的物质条件。

3. 尽快立法,实现依法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很不规范。罗马市、巴黎市从本世纪初就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对城市的历史风貌依法保护,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北京作为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应制定符合北京实际和国家大法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对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在法律上予以保障。同时,对现已确定的 25 条历史街区做出详细严格的规划,严格控制和执行。由于北京没有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门法规,文物部门依据文物保护法只能对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采取保护措施,无法从总体上有效地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因此加快立法和规划显得十分

迫切。

4. 制定优惠政策,形成有利于旧城风貌保护和开发的良性机制

由于目前旧城内改造项目平衡资金难度大,开发商追求容积率,给北京历史风貌保护造成巨大压力。为此,应通过政策引导,减免参与旧城危房改造的开发建设单位的税费,鼓励开发建设单位按传统样式整片开发改造街区。对已被定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段,应通过土地和产权置换,由所在区或市属开发公司整治改造。旧城改造要在政府统一规划指导下进行,通过政策调节开发商的行为,防止开发企业追求利润而给北京历史名城保护造成后遗症。

5. 加大政府对文物保护的投入,集中力量对重点文物景观进行综合整治

北京现有文物建筑 300 万平方米,以 20 年一个维护周期计算,每年修缮经费需 4 亿到 5 亿元,而市文物局 1998 年以前的修缮专项费用只有 400 万,经费严重不足。我们在这次考察中了解到,法国、意大利政府对文物修缮每年都拨大量专款。仅巴黎小宫博物馆的修缮,巴黎市政府就决定拨款 3 亿法郎。而古罗马斗兽场今年开始的修缮工程预算为 2000 万美元。为此,我市应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文物建筑修缮力度。除政府增加拨款外,应从文物旅游的受益单位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文物修缮。另外,对长期占有文物建筑不修缮,破坏性使用的单位,应通过强制措施给予一定形式的处罚。

目前,我市一些主要文物的周边环境恶劣,私搭乱建严重,破坏了文物景观,不利于保护和利用,应加强综合整治。如将天坛、地坛、月坛、日坛、先农坛内及周边地区尽可能按历史原貌进行整治,不仅保护文物景观,也在市中心形成较大面积的绿地,改善北京的城市面貌。

台湾文博状况考察札记

□ 张展

应(台湾)中华两岸事务交流协会邀请,北京文物文化台湾交流访问团 1999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5 日赴台湾进行了交流考察。交流考察的主旨是有关两岸的文物古迹保护、博物馆的管理和营运及探讨两岸文物互展的市场导向。

在台期间,台湾接待方安排众多学界名流与大陆去的人员座谈,台湾方面参加交流座谈的有文物、古建、历史、陶瓷、宗教、美术等方面的学者,参加人员全部是大学教授或著名建筑师。

在台期间,北京文物文化交流访问团对台湾沿东西海岸两岸的重要市县及中央山区进行了考察,计有台北、基隆、宜兰、花莲、台东、高雄、台南、南投、彰化、台中等地。参观考察的项目有博物馆、纪念馆、古

迹、图书馆、科技馆等。

往返途经香港停留期间,还参观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艺术馆等。

一、台湾便览

台湾的文物工作分三方面,一是以台北故宫博物馆为代表的艺术类收藏品博物馆;二是台湾当地的古迹;三是考古发掘,主要是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最为著名。另外还有对台湾岛原住民(即我们通常称为高山族)的民族学和民俗的考察研究。

支撑台湾文物工作的科研力量和财力支持都很有力。台湾的文化教育程度很高,历史、文物学者云集,加上经济的高速高度发展,反映在文物、博物馆方面,呈现



台南天后宫(一级古迹)

出一派繁荣景象。博物馆的馆舍和展览设备、展览手段都是一流的。

台湾人受教育的程度水平较高,因而,人们的文化意识、文物意识也较强。在博物馆里,观众的心理反映从他们的认真程度和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来博物馆的目的性很明确,绝没有我们在北京博物馆中那种熙熙攘攘走马观花式的参观。

台湾的文物遗存以早期原始社会和元明清三代为主,元明以前几乎是空白。近代考古学家在台湾发现大批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所反映的文化物证,证明台湾的原始民族文化与大陆中原文化是同一系统。在距今 2000 多年前西汉时期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台湾的记载。三世纪初,三国时期的《临海水工志》记:“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隋以前称台湾为夷州,所谓临海在浙江沿海一带。之后,元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台湾、澎湖的岛屿。澎湖巡检司归福建泉州路同安县(今厦门)管辖。在台湾经常听到历史接待人员讲,台湾的历史只有 375 年,是指荷兰侵略者 1624 年入侵台湾。这种说法仅就文明和现存遗迹讲,并不科学和准确。由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

要,1885 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台湾省。

台湾人口 2200 万,基本上由汉族和高山族构成。其中高山族人口约占 3%。高山族是日本占领时期的叫法,当地人称原住民,细分为 9 个民族,现在主要居住在中部和南部。

在台湾的汉族人主要是清初以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其中福建籍人占 80% 以上。所以,台湾的风俗文化、生活习惯同闽粤完全一致,这在文化遗存中非常明显。

二、古迹

台湾文物古迹主要有寺庙、城廓、考古遗址、衙署、书院、宅第、陵墓、关塞等。全岛文物总数相对很大。无论是政府和民间都非常重视。

台湾地区文物古迹分为三个级别,一级古迹由“国家内政部”颁布;二级古迹由省级政府颁布;三级古迹由县市一级颁布。分别相当于大陆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台湾地区共有一、二、三级古迹 297 处,其中一级古迹 24 处,由“内政部”认定,是全岛文物的精华,管理和修缮都非常严格,在当地文明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比如一级古迹“赤嵌楼”。赤嵌楼是荷兰占领台湾时期,于明永历七年(1653 年)建成,是当时商业和行政的中心,位于台南市中区。明朝永历十五年(1661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作承天府。清康熙年间,毁于战火。光绪五年就原址建文昌阁和海神庙。日本占领时期改修为历史博物馆。现存的古代遗迹,除基垣外还有古城门一座,但已残破。海神庙南侧有九座石碑,其中包括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序、平定台湾成功碑等。在赤嵌



国立历史博物馆



国立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身体展厅

楼集中这么多的历史人文史料，它既是台湾人民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见证，又是珍贵的文物古迹，年代相对久远。来参观的人很多，是台湾人所共知的古迹。

台湾现存古迹都是明朝以后的，大都集中在台湾海峡一侧。有几处著名的古炮台，如二砂湾炮台、亿载金城等，与大陆沿海的炮台很相像，至今仍是人们凭吊的地方。

列入一、二、三级古迹中最多的是庙。台湾的庙与闽南一带的庙接近，祭祀妈庙、风雨神等，还有佛庙，这大多与出海祈平安有关。这是当地的一个特点。比如一级古迹，鹿港龙山寺是台湾寺庙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处古迹。占地 5280 平方米，山门前后有 12 根柱，造型挺拔。前殿面阔七间，设五个门。该殿有两处独具特色的石雕，一是龙柱，造型一龙在上一龙在下，取天翻地覆式的雕法，另一是抱鼓石，体型高大。前殿后有歇山重檐戏台，宏伟壮观，其藻井为八角型，叠有重重斗拱集向中心。大雄宝殿歇山重檐顶，殿内外共有 50 根柱，规模较大。龙山寺保存完好，使用功能几百年

不变，至今仍是人们祭祀的地方。

二、三级古迹中有大量近代殖民时期的建筑，年代都在 80~200 年间，我们曾参观台湾省立博物馆，就是利用日本总督府改建成博物馆的。

三、博物馆

在台湾期间，我们参观访问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国立历史博物馆，台湾省立博物馆，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奇美博物馆等几乎全部是台湾地区著名博物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亚洲乃至世界著名的一座博物馆，它的馆藏文物是清宫廷所收藏的历代珍贵文物，除两次鸦片战争中侵略者掠夺和溥仪盗走的一小部分外，为保护这批文物于 1924 年成立了故宫博物院。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北京故宫文物装箱南迁，第一批共计 242592 件文物（包括 6411 件书画、4402 件铜器、83894 件玉器和 23780 件南宋瓷器等）。抗战胜利后，1948 年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局又下令将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中的精品迁移台



国立史前文化博物馆——遗址陈列大厅

湾,总计运台文物 2972 箱。(一说 5500 多箱,86 万件)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是在此基础上成立并于 1965 年 11 月 12 日正式对外开放。

台北故宫博物院可称得上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全中国文物藏品最精、最多的一座博物馆。其馆舍之精良,展陈手段之先进也是首屈一指的。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于 1955 年,收藏以中原文物为主,地方文物为辅。大部分文物系 1946 年至 1947 年原河南博物馆迁台文物和战后日本归还的文物,藏品总量 60000 余件。收藏方针方面,除了珍藏中原文物外,以闽台文物为特色。该馆位于台北市中心,馆舍是 1970 年落成的一座外形为中式的六层楼。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中华文物通史陈列,在陈列体例上是一种创新,非常值得我们仿鉴。以文物再现历史文化演进的全貌,比“教科书”式的陈列从观念上和设计理念上更易于被观众接受。

在我们参观过的博物馆中最有特色的是国立史前文化博物馆和奇美博物馆。

台湾的史前遗址有 1000 多处,分属二十个不同的文化,从时间划分先后有四个主要的文化发展阶段。该史前文化博物馆位于台东市卑南遗址,是一处遗址与陈列馆相结合的大型博物馆。博物馆分两部分,一是在遗址上建立的文化公园,二是博物馆,规模宏大壮观。文化公园是以遗址原状为主,配以文物展示馆,由博物馆统一经营管理。博物馆建筑面积 40000 平方米,建设投资折合人民币 15 亿元。该馆还在建设中,预计 2000 年底可以开放。

奇美博物馆是由奇美集团投资创办的一个大型博物馆,该企业是台湾著名的大企业,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创办博物馆,广泛征购文物,回报于社会。

奇美博物馆是中国全境(包括台港澳)唯一一座大型西方艺术博物馆。收藏品全是近三十年奇美集团斥巨资从国外拍卖会上购得。其中有列宾、雷诺阿、达利、米勒、罗丹等国际大师的作品,藏品丰富。该馆执行长潘先生讲,该馆只在外国拍卖会上征购作品,因中国作品已在中国人手中,故不与中国人抢东西,而选择西方艺术品作收藏,可以让中国青少年不出中国就能看到西方艺术。可谓独具慧眼。该馆展口分五部分:西洋艺术品、乐器、自然史、兵器、古物。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奇美博物馆更大规模的新馆将在 1999 年 11 月对外开放。

四、随 想

台湾的古迹富丽繁褥、精巧紧凑,但缺少内地古迹的古朴混煌。寺庙都由民间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加之善男信女众多,香火旺盛,捐资改建,添建很多,很难保持原貌。加上庙资庙产丰厚,从不为筹资所困,充足的资金加上信徒还愿所添建之物,使古庙金碧辉煌。

台湾地区古迹的历史、文化、文物价值远远比不上大陆。如彰化县鹿港龙山寺,

人称台湾最美的古寺,一级古迹,乾隆年建,在我们看来也很一般。

给我们最突出的感觉是台湾地区人们对古迹的关注、热爱以及官方对古迹管理,加上较高的科研水平。文物出版物多且精,任何一处古迹修缮后都出版一本专刊以记录资料档案。

随想之一。在享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教育水平的基础上,又有足够的经济收入,人们尽情享受自然和历史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也是由于文化水平高,经济富足,给人的观念带来很大变化。文物的价值在台湾得到充足的体现。热爱文物、保护文物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参观博物馆是每位老少公民的自觉意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不只一次听台湾人讲:不能打仗,一打仗,故宫的文物就毁了。人们已经把文物财富同战争与和平联系在一起。在台期间,正值暑期,各博物馆人头攒动,随处可见成批的学生和儒雅文明的年轻人。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每年观众超过230万(台湾人口数2200万)人。

随想之二。在台湾考察文博单位,有一种义工形式非常有意义。就连接待我们这样专业的人员都由义工接待。义工的行为纯属为社会尽义务,不索取任何报酬,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乐此不疲,无怨无悔。义工都有良好的教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且经专业培训。在台北故宫,负责导引讲解的一位年轻义工的专业知识之丰富,我们都自愧不如,据她讲,为了当好博物院的义工,她自费参观过许多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和大陆的许多名胜。同时义工的负责精神,热情精神也令人感动。

随想之三。台湾人的敬业精神非常值

得学习。在台湾也存在着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也有工作的不稳定性。但我们接触过的人都是那样敬业,彬彬有礼,主动热情。十几天中,我们无论何时何事都没有遭到冷遇。可贵的是,他们的这种敬业热情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行为。

随想之四。台湾文博单位的管理水平非常高,这并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在台湾接待人员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理念”。例如“设计的理念”、“管理的理念”。落到具体处,比如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从建筑设计,陈列设计到日常管理,处处透出一种品位,一丝不苟,一尘不染,可谓公众的利益无时都能体会到。所有管理都很到位,没有死角,接待人员在讲到某一问题时常说:“我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制度不允许。”根本没有人情和面子。

台湾同大陆两岸阻绝近半个世纪,虽同根同源,由于政治原因,两岸意识形态不同。台湾社会欧化很严重,人们的观念都受欧美思想支配,对问题的看法常常两异。此次两岸学者交流,对祖国文化的认同是一致的,也洽谈了一些交流项目的意向。本人在资料部门任职,引起台湾国家图书馆馆长的注意,对方非常有兴趣在古文献研究、出版,交流方面同我们进行实质性合作。这些同样是赴台的收获。

来去匆匆,浮光掠影,挂一漏万,但所见所闻足以感受到血浓于水的兄弟情谊。美丽的宝岛的轮廓已挥之不去地扎根于脑中。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燕下都》陶文释文补正

张
晓
云

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大批陶文,是我们研究战国燕系文字的重要材料。199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燕下都》一书(以下简称为《燕》),公布了大量的陶文拓片,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完备的燕陶文原始资料。但该书对于一些陶文的释读还有可商之处,今不揣浅陋,试作释文上的补正,以就教于方家。

本文按原书的顺序逐页逐条进行补正,文中拓片模糊,字形不清晰者,暂仍其旧。凡未注明引文出处者,均采自《燕》。为行文方便,所引书目一律采用简称。文后附书目简称对照表,读者可以参看。

1. 图 20.1(图一) 《燕》释为“左宫田左”,误。应为“左宫卑工”,《陶徵》释为“卑工”是正确的。(页三六)“左宫”为机构名,专门管理官营的制陶业。“卑工”为人名。“左宫某”或“右宫某”为燕陶的一种固定格式。如左宫癸(《季木》29.9)、右宫邨(《季木 29.10》)等。

2. 图 20.3(图二) 《燕》释为“左宫者瓜”,“者”应释为“旅”。者字在春秋以后上端所从的“木”字形逐渐变得像“止”字。旅字从𠄎,春秋时𠄎字偏旁写得很像“止”字,故止、𠄎易混淆,此处我们不难看出拓片字是从𠄎的。^①瓜字应隶定为“州”,金文中州作𠄎(井侯𠄎)、𠄎(散盘)、战国货币文字作𠄎(“平州”布)、𠄎(同上),形体与此极其相似。

3. 图 20.12(图三) 筒瓦上印文“左口”应即“左事”。

4. 图 47.13 《燕》释“右口”,当释为“右土”。战国时土字作土(《音录》十三·二)、土(《印文》)。

5. 图 61.3(图四)刻文“口吐”,当释为“佗吐”。佗字战国玺印中作𠄎、𠄎(《续齐》),《古陶字汇》卷八佗字作𠄎,与此形相同。

6. 图 73.4 《燕》释“六口”,应释为“六𠄎”。𠄎和𠄎都是“𠄎”的假借字,读为“斛”。“𠄎”在战国文字中作𠄎(盱眙铜壶)、“𠄎”字作𠄎(纒安君钺)。②另外,此书



中的全部误释，如下：图 86.5 及 6、图 158.1、图 227.5、图 233.7、图 234.7、图 235.7 及 9、10、图 236.8、图 240.8 及 9、图 241.1、图 245.9、图 463.11、图 464.9 等等，均应同此改。

7. 图 74.6 《燕》释“良”，应释为“中”。此片可与图 215.6(图五)拓片相对照，后一拓片“中”字被倒置。燕明刀中中字作、、，燕国玺印中作、、。

这是燕文字“中”的特殊写法。^③

8. 图 75.10 印文“遯”应隶定为“𨾏”，字从辵(辵)，并非从彳，“目”形应为“贝”之省体。𨾏即得，古文字中从辵与从彳往往互用无别。𨾏字见《音录》二·四，作，《玺印集林》作。

9. 图 85.8 《燕》释为“六”，释字不误，但将原拓片倒置。

10. 图 86.3 应释为“冶”。战国时

期三晋兵器中冶作 (魏十三年繁阳戈)、 (韩九年郑令矛)等形,字形均与此陶文相近。

11. 图 86.5 (图六) 及 6 《燕》释“匚”、“匚口”,均应释为“六吉”。

12. 图 86.7 (图七) 《燕》释“匚工口”,未释字即“耳”。耳字在战国时期作 (《尊集》)、 (《音录》十二·一)。图 217.1 《燕》未释,据字形应分析为从壬从耳。即“珥”。该字又见于燕玺(《玺汇》2603)。

13. 图 135.13 及 14 《燕》将原拓片倒置,误认为是三角形戮印,应释为“丁”字。图 158.2 及 3、图 160.1—5、图 220.4 及 5 均同此释。

14. 图 138.5 陶盆颈部的刻文《燕》无释,可释为“竹”。

15. 图 158.1 “二□□”应释为“二吉反”,反读为半,反、半古音同属帮系元部字,音近可通。^④

16. 图 159.4 《燕》释“不”,殊误,应为“币(师)”。^⑤

17. 图 162.6 (图八) 印文“土工口”,未释字应为“衆”字。图 224.11 同此释。《音录》二·一衆作,与此形近。

18. 图 163.8 并非“卅”字阳文。图 208.4 《燕》释“卅”的刻文与此阳文比较,字形迥异。

19. 图 163.12 印文“左昌”应为“左中昌”,可参本文第 7 条。

20. 图 164.4 (图九) “匚攻口”,未释字应为“罟”,从网从古从刀。战国时期许多从网的字网作、父、可参《玺汇》2826。图 165.5 同此释。

21. 图 165.2 印文“左匚君鑲正口”,未释字从“𠂔”从犬,可释为“器”。西周金文,战国兵器及玺印,陶文中“器”常省为“哭”形。如燕武坪君钟(《据古》23.12.4)之哭(器)”。

22. 图 165.3 (图一〇) 印文“匚攻空”,“空”可释为“垚(坳)”,从土从几。《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九号简有字作,《包山楚简》266 号有字作,李家浩分别释为、

、^⑥均可证。图 242.11,图 234.10 均同此释。

23. 图 165.11 印文“匚口”,缺释字当为:“医”,字从日从女,匚省为。金文中医字作 (医侯旨鼎), (盖鼎)均与此形近。

24. 图 166.3 罐残片陶文“匚出戊”,应改释为“蚘生戎”。“蚘”字即“蚘”,字见《字林》。“出”即生字,读为“甥”。某生某,燕私名玺中习见(《玺汇》3416、3478)。战国玺印中生作(《玺汇》5173),与此相类。陶文末一字据字形分析从戈从 (母),即戎。戈字作,为燕系文字常见。

25. 图 214.14 印文“口”,《陶汇》释为“米”,实应为“朱”。侯马盟书中“𠂔”字作、,左旁所从为“朱”字变体,其字从支朱声。^⑦燕官玺“右朱贞玺”(《玺汇》0367)“朱”字形作,同此。图 358.6 豆柄印文《燕》也误释为“米”,应同此改。

26. 图 209.2 (图一一) 《燕》释“扬”,应隶定为“易”。图 359.7 同此释。

27. 图 228.1、图 237.1 《燕》误释的“𠂔”、“𠂔”两字,均应为“器端”。关于“器”字可参见第 21 条。燕国铜质长条形官玺多自名为“端”或“身(信)端”,端从金从,与“𠂔”字有异,过去多误将燕玺中的“端”称为“𠂔”,“玺”,不确。^⑧

28. 图 236.5 《燕》无释,据字形分析,该字从豆从,应释为“登”。

29. 图 239.6 “匚攻十二”,《燕》误将释为“十二”合文,应改释为“土”。

30. 图 239.7 (图一二) 印文“匚攻口”,未释字应为“安”。安字从从女,古文字中作如下诸形: (《音录》7.2)、 (《陶汇》3.550)、 (《陶文编》7.53),均与此处陶文形近。

31. 图 240.4 (图一三) 《燕》释为“走”的印文应释为“建”。建字初文象持物树立于“”内之形,所树之物似是木柱一类东西。金文中建作 (赵建信君钺),燕国玺印中作 (《玺汇》596),均与此形近。

32. 图 240.9 应为“二吉”，并非“上甸”。图 241.1 及 5、图 242.9 均同此改。图 242.3 的“上甸”应为“三吉”，图 463.11 应释为“四吉”。

33. 图 241.2(图一四) “□甸□”，应为“匝牟”两字。匝字从匚从出，见于战国玺印，作 (《铁云藏印四集》)、 (《玺汇》2045)、 (《凝清》)。牟字与秦国高奴禾石权“牟”字同。

34. 图 242.8(图一五) 《燕》无释，可释为“良”。良在甲骨文中作 (《乙》二五一〇)、 (《乙》七六七二)，金文中作 (齐侯匜)、 (季良父壶)，战国文字中作 (《尊古》)、 (信阳简)，可证。

35. 图 244.3 可释为“壹”。战国玺印“壹”字作 等形(《玺汇》5274)，与此形同。

36. 图 408.1 刻文《燕》隶定为“𦉳”，恐不可信。此字左旁与燕下都出土陶文中的“𦉳”字绝然不同，此陶文究为何字，待考。

37. 图 452.3 双龙饕餮纹半圆形瓦当边轮正中印文《燕》释为“左甸更(鞭)”，当隶定为“左甸彘(鞭)”。更字据《说文》是从支丙声，与彘字不类。《说文》古文鞭作，可证。

38. 图 464.5 印文“右甸攻□”，末一字当为“青”，青字在信阳简中作，楚帛书作，战国玺印中作 (《铁云藏印四集》)、 (《玺汇》3158)，均与此近似。战国陶文“𦉳”所从“青”同此作(《陶汇》3.788)。

39. 图 464.9 “𦉳，左□，六吉”，此处𦉳即“坪”字，为燕文字写法。字又见于燕国方足小布“坪隆”，《玺汇》013号“坪隆都司徒”等燕国官玺。

40. 图 464.11 印文“左甸攻倬”，倬字应释为“剗”，从專从刀。并非从人。

燕玺剗字作 等形(《玺汇》3903、3153)。倬字即倬，《音录》附 30 上作，从人从专。^⑨图 228.1，图 346.5 中的倬均应改释为“剗”。

41. 图 465.4 阳文“右宫□”，末一字当为“肩(臂)”，从启从月(肉)。战国玺印中启字作 (《印邮》)，鄂君启节作。

①朱德熙：《战国旬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

②李家浩：《盱眙铜壶考》，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中华书局。又朱德熙：《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般》，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③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载《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④参见注②李家浩文。

⑤王恩田：《释 B(自)、𦉳(官)、𦉳(师)》，《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

⑥李家浩：《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又《包山二六六号简所记木器研究》，载《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⑦裘锡圭：《关于侯马盟书的几点补释》，载《文物》72 年第 8 期。

⑧吴振武：《释双剑谿旧藏燕“外司圣𦉳”玺》，《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

⑨朱德熙：《鄂君启节考释(八篇)》，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引书简称对照表：

《季木》——《季木藏陶》

《音录》——《古陶文音录》

《玺汇》——《古玺汇编》

《陶汇》——《古陶文汇编》

《尊集》——《尊古斋古称集林》

《凝清》——《凝清室所藏周秦钟印》

《续齐》——《续齐鲁古印撷》

《摺古》——《摺古录金文》

(作者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论北京古代都邑形成 与水资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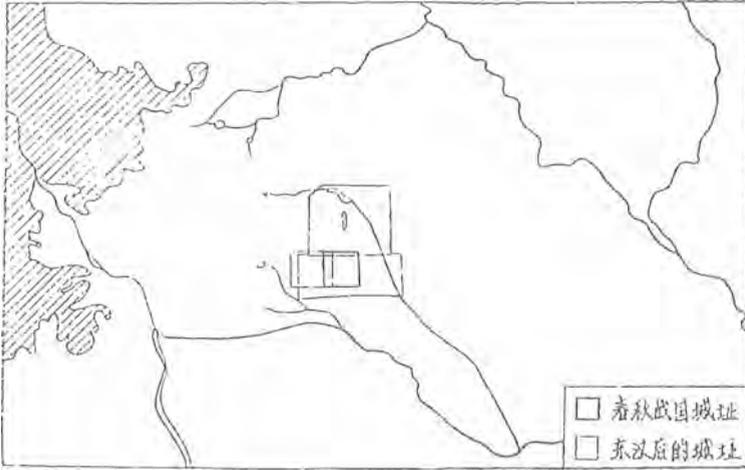
● 苏天钧

北京都邑形成发展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燕和蓟这两个上古方国,原隶属于殷商。武王伐纣后,封其族人于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蓟城变为燕国争霸中原的基地。这一段可看作北京都邑发展的雏形阶段。秦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燕国疆域为其中的六郡。自此之后,直至隋唐五代,蓟城逐渐从一个诸侯国的都城发展演变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边陲重镇。这一段时间内蓟城主要的历史功能是军事要塞。契丹统治者接收燕云十六州后,升幽州为辽朝的陪都。这个时期可算是北京都邑向都城发展的过渡阶段。金朝海陵王杀金熙宗,夺取王位,迁都燕京,并定名为中都。这一段时间北京作为都城来讲,可算为成熟期。元统一中国,定都北京,称为大都。明、清两代相继建都于此。这三个统一的王朝在这里建都,可说是北京地区都邑发展的一个鼎盛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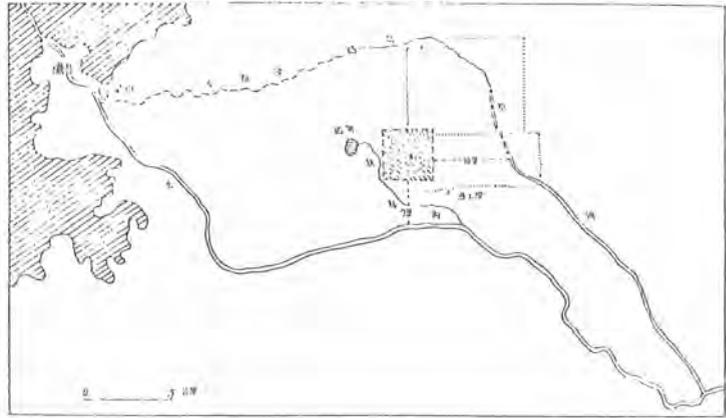
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在自然条件方面,并非十分优越,甚至有很多欠缺之处。但这并没有阻碍北京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宏伟的都城。笔者试据各种因素,稍加分析论述。

一、北京地区的自然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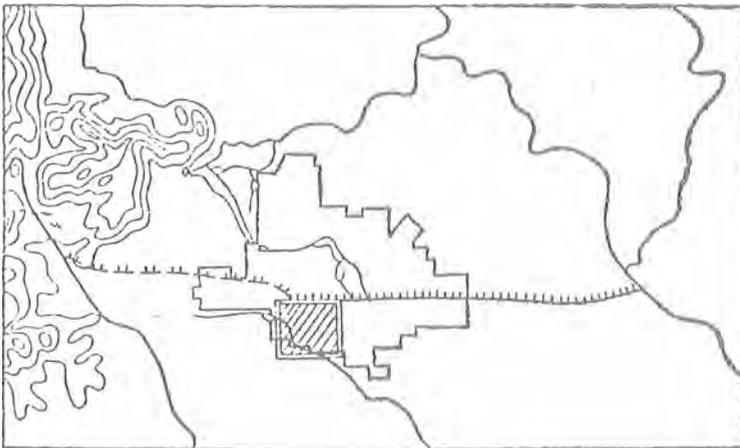
北京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北部为连绵不断的群山,东部是冲积平原。西部的山地属太行山脉,连接着山西高原。北京山地属燕山山脉,连接内蒙古高原。西山与军都山在今昌平境内关沟交会,形成一个大山湾,围绕着东南的北京小平原,故称之为“北京湾”。最高的山峰是灵山,海拔2,303米;次为百花山,海拔1,991米;另外,今怀柔县境内的黑坨山,海拔1534米,也是北京地区著名的高山。山间分布着延庆、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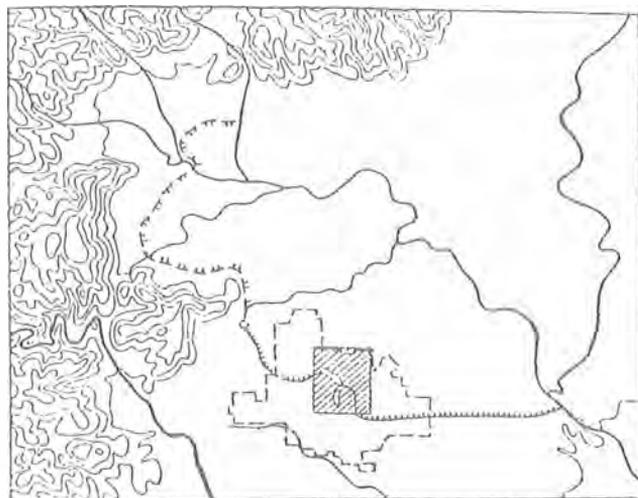
春秋战国时期和东汉以后城址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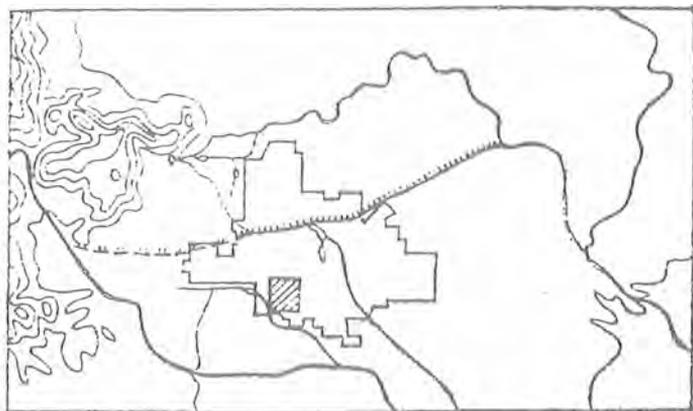
蓟城与附近水道
相对位置图



金口河引水
工程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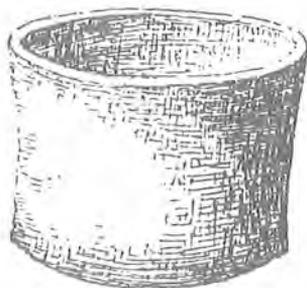


白浮堰引水工程示意图



戾陵堰——车箱渠引水工程示意图

和平门至宣武门工段
出土的春秋战国时代
陶井圈



平、平谷等小盆地和山麓半盆地。北京平原总的看是比较平坦的。它由几条河流冲积形成,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稍有倾斜,平原局部有所起伏,高差数米到数十米不等,形成一较明显的扇形脊背。古代北京的早期都邑,就坐落在这一扇形脊上,即今宣武门至广安门一线的台地之上。

古代北京地区周围有五大水系,即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大清河、蓟运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在北京境内的主要支流有奶水河和清水河。这一水系对北京古代都邑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永定河自今石景山流出进入平原地区,水流湍急,落差很大。每遇丰水年,往往造成严重的灾害。永定河水害时刻威胁着北京都邑的安全,历代统治阶级无法“驯服”这条河流,以致历史上永定河留下了“浑河”、“无定河”的名称,今天河水仍然经常泛滥。永定河在北京小平原上泛滥、滚动、改道的历史,给这一地区留下了不少的沟、塘、淀、泊,蓄积、补充了丰沛的地下水,这不能不算是永定河的功绩。

北京的气候近两三千年以来,处于温凉偏干时期,温度明显低于全新世温暖期。秦汉至隋唐时稍有上升,但以后又偏于下降。辽、金时进入较冷的“小冰期”,除元代略有回升外,清代初期最冷。年降水量约在630毫米以内,且多集中在一年的七八月间。一年内降水量分布不均,造成丰水年的洪涝灾害和枯水年的旱灾,以后又加上地表原始植被受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使得水旱灾害及以永定河为主的河流改道频繁,成为北京地区古代都邑发展的重大阻碍。历代对以永定河为主的河流屡加治理,但收效甚微。

二、北京的地理位置与都邑形成

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处于南北交通枢纽。在古代,北京周围可以利用通航的河流甚少,交通运输以陆路为主。北京就是这样一个沟通南北几个经济区的据

点。由北京向东北方古北口,可进入松辽平原;向西北方出南口,可直上蒙古高原;向南沿太行山东麓可深入华北大平原;北京东部为沼泽地带。可以说,北京城邑的起源,正是由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在春秋战国前,北京地区及其外围曾有很多古代的都邑,如琉璃河的商周古城等。为什么这些都邑没有延续下来?有人认为是因水患,也有人认为是毁于战火。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一个城邑的形成与发展,在早期和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北京的蓟城选址在一块台地上,这是因为要躲避永定河的泛滥威胁,同时又要能控制南北交通枢纽的永定河渡口(今卢沟桥一带),永定河渡口实际上正是北京都邑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最具体的体现。古蓟城所在的一片台地,恰离永定河渡口不远,便于控制,又因地势较高,可以避开永定河洪水的威胁。

古蓟城的位置在历史上也曾有较小的变动。1956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150余座春秋战国时代和汉代的古陶井,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今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以后在北京上、下水道工程和南护城河加宽工程中,也发现了65座陶井,这些陶井分布在今陶然亭、广安门内大街、北线阁、白云观、南顺城街及海王村一带,最集中的仍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

过去人们一般是依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来确定古蓟城遗址的。《水经注》记:“水又东北,经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经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郦道元以为《水经》所记载:“水‘过广阳蓟县(即古蓟城)北’是错误的,但郦道元到的蓟城是北魏时期的蓟城。《水经》与郦道元所见的差别,也许恰是河流改道、城邑稍移的结果。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陶井圈,其形状与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所出土的井圈类似,在井底所出陶器残片上也印

有陶文。我们推测这些分布集中的古代水井,是当时城邑的主要供水来源,由于永定河水流湍急,城市供水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法利用永定河水的。根据陶井圈分布密度情况,我们推测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蓟城的位置在今宣武门到和平门以南的地区内。

1974年,北京考古队曾在白云观以西的古蓟城遗址上发掘过三座东汉时期墓葬,发现墓葬叠压在城址之下。这一线索说明,起码这一段城垣始建于东汉以后,这正是永定河自东汉以后由原蓟城北沿今三海(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然后南下的旧河道改道,经今衙门口、东经小井至马家铺北南下,过蓟城南的结果。由于河道的变迁,故蓟城城垣因之向西稍迁。酈道元所见恰是改道后的河流,而《水经》所记,则是东汉以前的情况。

三、春秋战国时期

蓟城城址的方位与地下水的开采

殷商时期,北京地区有二方国,隶属于殷商,即燕与蓟。至周初分封,燕、蓟仍在,燕国城邑一般认为已为考古发掘查明,今北京琉璃古城址即是。蓟的城邑,其地望尚不清楚。考古工作者曾在平谷县刘家河发现一座殉有二组青铜礼器及铁刃铜钺等物的墓葬,出土物具有明显的商代文化特征。因此,这一带地区是寻找殷商蓟城遗址的重点工作地区。

古代文献记载关于燕与蓟的问题有限,且含混不清。如《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周本纪》:“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在武王伐纣之前燕与蓟是两个古方国。武王灭商之后,把他的家族分封在这两城土地上。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蓟国消失,燕国都

于蓟城,按《史记·燕召公世家》:“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韩非子·有度篇》:“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战国策》卷三〇,“燕”二:“臣……奉令出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

根据上述记载,燕国在这个时期确实迁都于蓟。而酈道元在《水经注》中所确定的蓟城方位应当是东汉以后的蓟城,那么东汉以前的蓟城在哪里呢?笔者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以及永定河古河道的调查资料等,春秋战国时期的蓟城应当在和平门到宣武门一线以南一带。所谓蓟丘也就是永定河冲积扇脊背上的一块台地。

永定河在北京平原冲积扇上摆动,留下很多故道。全新世早期永定河经八宝山向西北流,经圆明园入清河。进入历史时期后,永定河逐步由北向南摆动,先是由八宝山经紫竹院、积水潭,过坝河汇北运河入海。后来通过积水潭向南经北海、中海入龙潭湖再经肃太后河、凉水河注入北运河。再后河道又南移,出山后经卢沟桥到马家堡南苑之间,东南经今凉水河入北运河。

上述永定河的变迁与北京城址的迁移有一定的关系。永定河由三家店出山后坡陡流急,同时又夹带了大量泥沙倾汇而下,在汛期造成了很大的灾害和损失,因此,历代对永定河水资源的利用都采取审慎的态度。

在春秋战国时代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为什么发现了大量的井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供给城市用水的,由于永定河水势凶猛,城址的选择才在高台地上,供水的问题只能靠地下水来解决,由春秋战国直到两汉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在考古发掘中发现陶井最密集的地方六平方米之内就重叠四处,,井的底部发现很多打水陶罐,有的陶罐口沿上印有陶纹。春秋战国时代的陶井圈每节高矮不等,最高的 54.5 公分,最矮的 27 公分,直径在 63.5~60.5 公分左

右,外壁印席纹或绳纹,内壁是素面,这些与河北省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陶井圈大体相同,根据陶井的分布情况推测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蓟城应当在和平门到宣武门以南的地段。

四、秦代的燕、蓟地区

1. 郡县设置和行政区划

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设在古蓟城,称为上都,蓟城的位置在今北京城西南隅。

有关蓟城周围郡县设置情况,史书记载说法不一,惟有北魏酈道元《水经·水注》说的比较详细是可以信赖的,因为他本人亲自踏察各水系以及水系所经的城堡——详纪,如《水经·水》条载:“又东南出山,过广阳蓟县北。”酈道元注云:“水又东北巡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巡其北,盖《经》误正矣。”《水经》一书,一般认为成于东汉后期。《水经》称水过蓟城北,而酈道元引三国《魏土地记》云水过蓟城南,因此也有人认为东汉、三国之际,水曾发生大改道,从蓟城北部改流南部。今北京积水潭、后海、北海、中南海至龙潭湖一线。据考证即为水故道。

上述记载中所说的水是指今永定河(清乾隆三年改称永定河)。它的冲积扇以西山山口的石景山附近为顶点,向东北、东、东南三个方向呈辐射状倾斜低落,根据钻探结果达200~300米。其底部组成物质为疏松的厚层卵石、砾石,愈近地面,物质愈细。冲积扇顶物质较粗,愈向平原愈细。古代的蓟城就是在这个地区孕育成长的。按酈道元记述的情况,蓟城以南的地区即秦代的广阳郡,治所在蓟城,广阳郡以北即为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大古城)、渔阳(治渔阳,今北京怀柔县梨园庄)、右北平(治无终,今天津蓟县)、辽西(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辽东(治襄平,今辽宁辽阳)五郡。

2. 秦王朝为了加强对燕地的控制修驰道

秦始皇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于220年开始修驰道,以国都为中心修筑通向全国的驰道。《汉书·贾山传》记载,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他曾经前后五次视察修建驰道的情况,第四次巡视亲自来到燕蓟地区并刻石于碣石。

3. 为了防止匈奴的入侵修筑长城

秦灭六国后,命将军蒙恬率军北伐匈奴。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率秦军收复河南失地,“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此后,为了防止匈奴卷土重来,秦王朝征调大量民夫修筑长城,将原秦、赵、燕的北边防御的城墙按自然地形连接起来,由临洮至辽东长城万余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修筑长城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给燕、蓟地区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

4. 秦末农民的起义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陈胜令陈武臣攻取赵地,至邯郸自立为王。部将魏人市至齐地,齐旧贵族自立为王,并击败周市所率军旅。周市还至魏地,立魏旧贵族宁陵军为燕王。其后并国旧贵族建议韩广为燕王,国号燕,都蓟城。此时秦王朝已无力控制政局后导致楚汉之争,汉灭楚以后平定燕、蓟,秦亡。

五、两汉时代的燕、蓟地区

1. 西汉建制沿革(前206~公元8年)

按《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刘邦取得政权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度。一部分地区仍按旧制置郡,边远的地区如燕、赵、

齐、楚等地封其家族和有功之臣为诸侯王，称之为王国。郡和王国以下仍设置县，北京在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属燕王卢绾的封地，以蓟城为郡。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 年），改封其王子刘建为燕王，仍都于蓟城，刘建十五年后病卒。高帝后吕雉杀刘建元子，改为燕都。

高后八年（前 180 年），吕雉将其侄孙吕通封为燕王，吕雉病卒，吕通被杀。文帝元年（前 179 年），封琅琊王刘泽为燕王，仍都于蓟，刘泽两年后病故，其子刘嘉继承王位，刘嘉亡后，景帝六年（前 151 年）其子刘定继承王位。武帝立皇子刘旦为燕王，仍都蓟城。元封五年（前 106 年），始置十三州部，燕国属幽州刺史统监。昭帝元凤元年（前 80 年），燕王刘旦谋反，事败自杀，国除，改置广阳郡，治于蓟城。本始元年（前 73 年），宣帝改广阳郡为广阳国，诏立刘旦子刘建为广阳王，在位二十九年卒。

2. 蓟城地区出土的陶井

在西汉时代蓟城是广阳郡的首府，也是封王的王都，笔者在 1956 年夏开始挖掘永定河引水工程全线的古墓和古遗址，两年间共清理出西汉的陶井 115 座，这些陶井都是在宣武门至西便门一带护城河道上，陶井的结构为筒状形，每节高 20.5—38.5 厘米、直径 68—91 厘米，上下口均为子母口，由地下向上叠砌，子母口相咬。陶井中残存部分最高有 16 节之多，每个陶井的底部，都遗有几个陶罐及少量半两或五铢钱。陶罐高领折唇，椭圆形腹，腹上有弦纹多道，下部饰绳纹，平底稍向内凹，口径一般 12 厘米、高 23 厘米，与北京地区西汉早期墓出土的陶罐形制相同。

1965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配合上水道工程、南护城河拓宽工程和中小型市政工程中发现 65 座战国至汉代陶井，其形制与永定河引水工程出土的战国至西汉陶井略同。分布在陶然亭、姚家井、广内北线阁、白云观、宣武门内南顺城街、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较密集的地方是内城西南角

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发现陶井 55 座，其中西汉早期陶井 29 座。

自 70 年代初，配合人防工程等先后在西单大木仓、礼士路真武庙三条、宣武门外中国图片社、校场小九条药材公司、牛街北口回民中学、北线阁印刷一厂、南线阁大印刷厂、广外滨河路南椿树馆、广安门人民汽车三厂、和平门外韩家潭、陶然亭北京京剧院、姚家井卫生材料厂等地又发现一批战国至汉代陶井并发现少量五铢钱和王莽大泉五十铜钱，可见这口陶井一直延用至王莽时代。

根据陶井群的分布情况，推测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蓟城应当在发现陶井最密集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地方。

3. 清河镇朱房村古城遗址

古城遗址位于昌平区清河镇西 1 公里的朱房村，按昌平区志记载朱房村的朱字原为猪字，该遗址的发现是北京市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会文物调查研究组周耿先生发现的。该古城垣保存完整的仅西南角。计由西南角向北断续保存 115 米左右，由西南角向东一线完整，保存 150 米左右，东南角濒河，特别隆起，上有一近代墓葬，保存了城角基点，东面隆起如堤，尤可辨识为城垣基的残迹。惟北面及东北、西北两角无存。但部分城基夯土仍然保存，因而城的大小四至是可以清楚的。城为正方形，南北向，每面长约 500 米，周长约 2000 米。按秦汉之制：“千夫之城，万家之邑”，该城应为西汉时期县级城。

1954 年，周耿先生曾对此城发掘过 3 次，出土有大量西汉时期的陶片，铁器有铁刀、剑、戟、裤铲、镢、镜、车轴瓦等。同时还发现一座冶铁炉，但被窑厂取土破坏。附近还有用绳纹砖砌的一堵墙，可见此处当时为冶炼场所。

1955 年 10 月，笔者与考古学者已故于杰先生第四次发掘，在城垣上开一豁口，同时还清理一处城垣断崖，拟了解城垣结构、筑城方法、夯土内含遗物以及城垣建筑年

代。通过发掘清理,得知此城结构:城基宽达 11.85 米、夯土残高达 3.15 米、顶残宽 1.4 米。夯土层厚薄不一,最厚的 20 厘米、最薄的 10 厘米。夯窝直径 6~7.5 厘米,夯层十分清晰。在城垣断崖处发现柱洞 3 个,洞内残存大量木炭,似是筑城时用以加固木板的木杠遗痕,由此推测筑城时采用版筑方法。夯土内含遗物有夹砂粗红陶片、夹砂粗灰陶片、泥质灰陶片、泥质红陶片四种,以陶质论,前两种是北京地区较为典型的战国时代或战国以前的遗存,后两种则是战国时代的遗存,而竟没有一片汉代的标准陶片,因此,推测此城的建筑年代上限应当是战国,下限当在西汉之际。

1958 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进行第五次发掘,在城东北角,发现古井十几座,这些水井是用一节节陶井圈堆叠而成埋在地下。井底均发现有高领罐及五铢钱等。陶井圈外壁印有绳纹、内壁为卷云纹,这样的陶井圈在北京白云观、陶然亭等地都有发现,可以确定为汉代陶井圈。城内地面上分散有大量汉代筒瓦、板瓦和瓦当,瓦当上花纹有卷云纹、卍字花纹和“千秋万岁”的篆体字,地下埋有整行的墙基和房基,根据砖的尺寸和花纹,可以断定为汉代的建筑基址遗迹。

通过几次发掘清理,使我们对朱房村古城遗址有初步了解,此城城基宽达 11.85 米、顶残宽 1.4 米。按《周礼·考工记》、匠人为沟洫一则所记的筑城方法:“墙厚三尺,崇三之”,即筑城方法,底与高成一与三之比,则当日此城的高大可知。因此,该土城原来必定是一座具有军事意义的边城。北京距长城不远,在秦、汉时代,它是防胡军事基地之一,而居庸关更是秦、汉时代全中国九大要塞之一,不难看出,此城即是秦、汉时代防胡军事要塞工程重要的一环,为拱卫古北京城(蓟城)的犄角。

六、曹魏时期蓟城的西迁与戾陵堰、车箱渠的修建

上面已经谈过,过去的史学界都是根据酈道元的《水经注》把蓟城的位置定在白云观一带。1974 年在白云观以西的城址上作过发掘,发现在墙基下压着东汉墓葬三座,根据这个线索这座城墙始建年代应当晚于东汉,这样与《水经注》所谈的并不矛盾,注文说:“……漯水又东经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姚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漯水又东北,经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经其北,盖《经》误证矣。”酈道元认为漯水的走向不应经过蓟城的北面,应经过蓟城南,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因为他所见到的漯水走向是东汉以后漯水改道和蓟城西迁的情况,东汉以前漯水确实经过蓟城北,这就是漯水走向的三海大河故道。

曹魏时期北京有一项大的水利工程,即戾陵堰与车箱渠,这项工程记载散见于《三国志·魏志》、《水经注》、《晋书》、《资治通鉴》等书。按《水经注》所记碑文如下:“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原径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步,山水暴发,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经昌平,东经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齐,原湿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晋元康四年,……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坏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车箱渠,所在漫溢……”

七、辽、金时期城址的扩建与引水工程

公元 936 年辽把幽州升为陪都,称为南京,城址基本上未动。按《元和郡县补

志》说：幽州城制南北 9 里，东西 7 里，城周合为 32 里，折今制 24 里，这种说法是符合现代调查材料的。在白云观后有夯土墙一段，已确定为城墙的北壁，白云观以西京包铁路西 20 米处也有一段夯土墙，这是城墙的西壁，东壁和南壁已无处可寻。根据《日下旧闻考》、《春明梦余录》、《顺天府志》等书记载，尚可查出一些线索。《寄园寄所记》云：“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熳胡同尤甚，深底各二丈，疑为幽州城濠。”《光绪·顺天府志》谓其说近是。又石驸马大街东，旧有大明濠，甚宽广，直抵城下闸口，而入于护城河，疑即幽州城濠东北端。这一段的记载证实了东壁的位置。此外，1952 年 11 月在姚家第一监狱门前发现了一个唐墓，按一般情况，墓葬多在城外，由此墓南北作线延伸，恰自新路、丞相胡同，与法源寺相距极近，烂熳胡同为幽州城故濠所在，亦信而有证。城垣东西北三壁既得，可推知南壁应在贾沟村附近。总之，辽南京城还是延续唐的幽州城原来的形制无甚大改动。

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按《金史》记载不权拓其东壁，即西南也有拓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海陵迁燕诏说：“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为其确证，是当时未曾拓筑变革的仅有北壁一面。西城墙目前还有许多残迹，最高处约一丈许，分布在今马连道仓库、碣子门、高楼村、凤凰嘴一带。北端在羊坊店东南角，城根关家园子一带。南端在凤凰嘴村的西南角。这些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是金代西城垣保存较长的一段。南城墙从凤凰嘴西南角东转延首村南有自西向东一条水渠，估计可能是金代的护城河遗迹。东到万泉寺、石门村、霍道口、祖家庄、菜户营等村，也有连续不断土丘形的城墙遗迹。东城墙四路通以北是永定门车站，以前这里有一道土岭叫做窑岗子，岗子内外曾发现过很多辽代墓葬，这是金中都城的东城墙遗址，北至黑窑厂、梁家园还可以看出较高的台地。《皇明文衡》卷三十七之“游梁氏园记”记载梁家园

还有旧城遗迹，称为萧太后城，更进一步证实东墙垣的方位。北城墙已无迹可寻，是否与辽南京东城在一条线上，目前尚不敢确定。1956 年永定河引水工程中，在白云观护城河北岸发现了很多石雷和金代的铜钱。这此石雷都是守城用的抛机的石炮弹，可以证实了北壁的所在。

金中都城遗址已经过了钻探，证实和文献记载材料出入不大，经考古勘测，东南角在永定门火车站西南的四路通，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西南角上。

中都城内的水是引自城外西北的西湖（今莲花池），专供宫苑用水，流入同乐园、西华潭（鱼藻池），然后从龙津桥下向东南流出城外。宫苑用水数量有限，比较容易解决，由全国收上来的赋税中的一部分粮食、盐、铁、丝、帛等集中到中都城，靠陆运是无法解决的，大部分是靠水漕运。通过运河运到通州，再由通州通过旱路运往中都城，通州距中都仅 50 里，但每年要花费大批人力、物力才能完成运输任务。金统治者最初利用西山诸泉水及小湖导高粱河凿渠东下通州，但由于水源不足，枯水期流量有限，无法通航，不得不引用卢沟河水，这就是有名的金口河工程。《金史·河渠志·卢沟河》：“大定十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曰：‘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命计之，当役千里内民夫，上命免被灾之地，以百官从人助役。已而，敕宰臣曰：‘山东岁饥，工役兴则妨农作，能无怨乎。开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罢之。’十一年十二月，省巨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还奏‘止可五十日。’”

由上述可以看出凿金口河用很短的时间就竣工了，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且造成了很大灾难。《金史·河渠志》载：“……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瞿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

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其后,上谓宰臣曰:‘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平章政事驸马元忠曰:‘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竟不能行而罢。”

“二十五年五月,卢沟决于上阳村。先是决显通寨,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至是复决,朝廷恐枉费工物,遂令且勿治。”

金口河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不经过考察研究卢沟河的水性就擅自决定开工,以至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金朝统治者不得不着手改善陆运,大定二十八年决定在卢沟河上建石桥。

八、元大都的兴建与水利工程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把开平称之为上都,燕京称之为中都,翌年派刘秉忠在金中都的北郊修建新的都城及宫室,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建国号为元,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由开平迁入新都城,命名为大都。大都城周长57里有余,南北略长,东西稍短,共辟11座城门。各座城门上都有宏丽的城楼,城的四角有角楼。

元朝放弃金中都城的旧址,而北迁建元大都,主要原因是水源供给问题,辽、金两个朝代北京不过是陪都,元代上升为国都,北京所处的地位是统治者的“心脏”。在原来的金中都城的城址上扩建,水源是一个大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北迁建设新城,引用新的水源来解决宫廷及人民生活用水以及漕运等问题。

在修建元大都城之前,郭守敬就建议引玉泉水以通漕运,这就是郭守敬向忽必烈面陈水利六事的首条。后来,漕运一事虽然未能付诸实现,但却解决了宫苑用水问题,即沿用了金朝引水工程的旧渠道,导玉泉诸水如高粱河,引入城中,流经宫苑,注入太液池,这就是所谓的金水河。《元史·河渠志》“金水河”条记载:“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流至(义和)[和义]门

南水门入京城,故得金水之名。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中书右丞马速忽等言:‘金水河所经运石大河及高粱河、西河俱有跨河跳槽,今已损坏,请新之。’”这是宫苑用水主要来源。

至元二年,郭守敬曾建议利用金朝废弃的金口水灌溉农田以及解决京畿的漕运问题。《元史·郭守敬传》:“……‘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兵兴以来,典守者俱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又言:‘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人之患。’帝善之。”由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郭守敬大胆地使用了金朝废弃的金口河,解决了当时修建元大都所需西山建筑材料的运输问题,同时还可以在河水流经之地解决农田的灌溉问题。为了防止山洪暴发所造成的水患,他总结了金朝治河失败的原因,在上游设减水口,如遇山洪暴发,可向西南方向排洪,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条河落差较大,河水浑浊,日久泥沙必淤积成患,所以这条河利用的时间很短,后即废弃。

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陈述水利十一条,提出引白浮泉水至大都的运河工程,使漕运的船只直接驶入积水潭。这项宏伟的工程计划,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实现了。它不但解决了漕运问题,而且对大都的用水、美化大都的环境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白浮堰的修建,给元朝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增加了雄厚的实力。通惠河的通航,除了每年增加数十万石的漕运粮食外,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元朝统治者赐给郭守敬一万二千五百贯钱。其实,他的功绩远不止此,他总结了前人在水利工程上的失败原因,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水利工程的实践经验,在今天仍发挥着作用。

郭守敬经过多年严密的调查和勘测,

发现白浮村神山泉的下游有着丰富的水源。现在根据史书上的记载,有:王家山泉、龙泉、冷水泉、玉泉等。但实际上,昌平西至瓮山一带绝不止这些泉。由于地下水位的变化,历代这些泉时隐时现。元朝时,北京地区的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泉水相当旺盛,但白浮堰的引水工程用水,仍非这些泉水所能解决。

引水工程的走向是西行而南折,逆水而上,是这项引水工程中的一大特点,郭守敬积累了几十年治水工程的实践经验,他在调查黄河的过程中,对比了黄河沿线地形的高度,总结出黄河入海口低于黄河沿线任何地方,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海拔为零点的基本概念。如果他测量不出白浮村的海拔高于瓮山泊入水口,那么,这项引水工程就将是徒劳的。翻阅今天北京郊区昌平和海淀的地图,知道白浮村海拔为60米,瓮山泊入水口海拔约为48米。由白浮村到瓮山泊约50余里,地势徐徐下降。

《元史·河渠志》记载:“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瓮山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从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曰通惠。凡役军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鍤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两便。”

上述记载,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水,在白浮村修建了一个挡水坝,汇集成白

浮堰。根据1955年考古调查,我们了解到神山泉在汛期其水流量亦不甚大。即使七百多年前的元朝,气候湿润,雨量较多,在枯水季节作为引水起点的白浮堰来说,神山泉的供水量也是微不足道的。1978年,我们又在这条引水路线上进行调查和钻探,以搞清白浮村周围是否有其它大的水源。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只有截流东沙河水,才能够增加白浮堰的蓄水量。神山泉的位置是在白浮村的东北角,也就是现在的昌平区化庄与三峡村之间,靠近东沙河的西岸。东沙河也就是温榆河的支流,这条河的流量很大,拦截这条河水作为白浮堰的补给水源,条件是非常优越的。然而西向逆水而上,南转汇瓮山泊,沿途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亩泉、西来马眼泉、侯家庄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温泉、龙泉、冷水泉、玉泉等泉水作为补充水源。

按《析津志》的记载,白浮至瓮山诸泉水的出处如下:“……白浮泉源出县东神山,流经本县东,入双塔河,为通惠河之源。百泉源出县东北,至南碾头与虎眼泉会流,入双塔河。一亩泉、马眼泉、南安泉,以上三泉源出县西孟村社,经南双塔故城,合河入双塔河。沙涧泉出县常乐社即榆河之上流也。冷泉源出青龙桥社金山口,与玉泉合,下流为清河。玉泉源出于青龙桥社玉泉山,与冷泉合流,为清河。”《元一统志》记:“……泉出县西南七十里玉泉山,东流南流入宛平县界。清河源出于县南玉、冷泉二水,流至东燕丹村。东南入榆河……”。这两条记载,把主要泉水的发源地讲得很清楚,史书只记载由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却没有提及经沙涧泉、冷泉再流入瓮山泉,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有一些文章的记载是不符合的。按文献记载,应过双塔、榆河等地。经考古调查,知双塔与榆河之间,现今仍保存着两个村落,一个叫做东闸村,一个叫做西闸村。这两个村落的名字,应该说是与白浮堰引水工程有关

的。在这里设两个闸口,截流双塔河与榆河,来补充水源,再经后章村、前章村继续南下,这样就比现在京密引水工程所走的路线要近一些。如果当时引水工程走向是按今天的京密引水工程的路线,经阳坊、前沙涧、前柳林等地,那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些地方的地层都是沙石层,而且路线也较远,经过这段地区必定会有很多水渗漏地下,这在当时的引水工程技术条件下的确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但如果按前面说的走向,也存在着问题,因为这个地区内海拔约为46米,而瓮山泊入水口海拔约为48米,如果不提高这个地区的河堤,水是无法通过的。据我们初步调查,有的地区尚保留有高出地面的河堤残迹。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来证实。

元大都引水工程是取得巨大成就的。首先是引用玉泉水来解决宫苑用水,其次是重引金口河水以运输西山木石供元大都建设之需,最后是建白浮堰,导诸泉水至大都城,使通惠河通航,漕运直接进入大都,这是元朝引水工程的杰作。

九、明清两代城建,南粮北调

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率军攻入大都。为防止蒙古势力卷土重来,仅用一月时间收缩元朝北城,另筑北城墙,今德胜门、安定门外所见之土城残迹,就是当年缩城时放弃的元城北垣。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人提出修建外城的计划,计划外城周环七十里。后因财力有限工程过于浩大,而仅修筑南部外城。这一工程直到嘉靖四十三年完成,自此,北京城平面呈一凸字形。

从永乐十五年起,着手修建雄伟的宫殿,在宫殿中布置优美雅致的园林,仿效南京都城的规制,建置庙社、郊祀、坛场、宫殿和门阙。在贯穿北京的长达16里的中轴线上,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宫殿群,充分体现极端专制皇权至上的思想,代表专制皇权的一切中央枢纽都设在北京,富豪巨商也纷纷迁此经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进入北京。



元代白浮堰九龙口遗址

北京城商业繁荣,成为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清朝自定鼎燕京,一切沿用原有城池和宫殿,除局部加以维修和扩建外,基本维持原状。清统治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西郊园林建设上。著名的畅春园、圆明园、颐和园都是这一时期的园林杰作。清代也是中国城市建设、园林建设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

明清两代粮食供给与宫廷所需之物均靠陆运和海运,这时郭守敬所建的通惠河已经不能发挥原有的功能,原因是在元代北京地区处于潮湿区域性的小气候,降水量较多,因此在此时期郭守敬所建引水工程发挥很大的效应。到了明清时期气候干旱,降雨量较少,因此白浮堰的引水工程就废弃了。那么,漕运问题只能靠海运和河运,然后用人力将所有货物运进京城,有的文献记载明代为了修建十三陵恐怕白浮堰引水工程割断了龙脉,废弃了白浮堰引水工程。

十、结 语

古代北京都邑的变迁与水源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由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蓟城就开始开采地下水,而且开采的方法是很科学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井是用一节节精制的陶井圈叠砌而成,而这些陶井圈上印制花纹,说明当时对陶井圈非常重视的,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井与井之间距离很近,这说明当时对地下水开采利用不仅是生活用水,有可能供给蓟城内苑之需。在井的底部还发现了大量的打水用的陶罐,很多陶罐上印有陶文,这些陶文对研究地方文字和历史断代上是有利的依据。

曹魏时期戾陵堰和车厢渠的修建,是北京地区水利史上首创,但是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如果不利用永定河冲积扇上的故道,是无法实现的,我们由文献记载

上可以看出,造戾陵堰必须开车厢渠然后导高粱河才能达到分流灌溉的作用,但是这条灌渠并没有使用多久就废弃了,后来虽加以重修,但使用时间是长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枯水期达不到预期灌溉的效果,另一个则是在每年的雨季里如果遇到丰水年,山洪暴发,水流湍急,必然造成严重的灾害,这个问题也是悬而未解的。

辽代南京城的建立,是在唐的幽州城基础上,由于军事上的关系城池没有扩建,水源的问题还是引用西湖水(莲花池),金中都由于城池的扩建,水源就感觉不足了,除解决生活用水外,又引用卢沟河水以解漕运之需,金口河竣工不久就失败了,还没有达到戾陵堰与车厢渠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没经过考察和总结前人的经验而造成的。

元大都城的设计,总结了前人经验教训,在大都城的规划上是经过调查研究和周密思考的,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设计,这是要归功于刘秉忠,在水利工程方面,就是元代水利科学家郭守敬,在修建元大都过程中,郭守敬又重开金口河,运西山石木料供大都之需,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他设立了减水口(溢洪道),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造福于百姓,在宫廷用水方面,引玉泉山水,通过金河,从宫城流出,这不但对园林加以美化,而且对环境净化也起着作用,为了不使这条水系污染,统治者用条文规定,凡污染者皆受刑法制裁。在漕运方面是引白浮泉及西山诸水系至大都城内,这条引水工程可以说是元朝的杰作。

上述元代以前各个时期水利工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对今天北京城市建设可能有很多借鉴之处。由历史上看,北京的变迁与水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首都人民决不能忽视,要坚决执行节约用水,要充分利用水的循环使用,不这样就不能造福于子孙。

(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历代帝王庙初探

傅 幸

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西四阜内大街131号的历代帝王庙,是始建于明嘉靖初年的皇家庙堂,也是我国现存惟一的一座历代帝王庙。它是明、清两朝皇室崇祀我国历代帝王的宫寝,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国民对其历史上的圣君明王进行总体性祭祀的最高殿堂。是国务院1996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北京市第159中学使用。近来西城区在继“亮出白塔”之后,又有恢复历代帝王庙的动议。本文有鉴于此,拟对历代帝王庙稍作介绍与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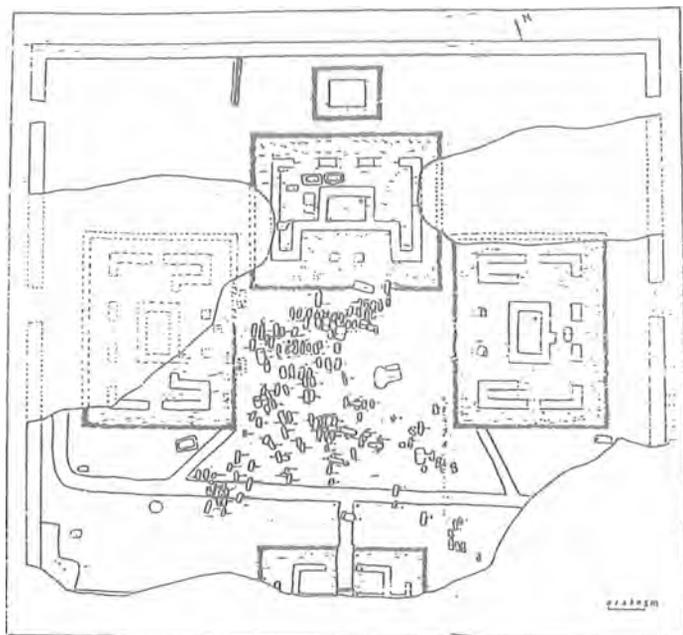
一、历史渊源

历代帝王庙虽创建于明代中叶的嘉靖初年,但其历史渊源却几乎可以上溯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古史传说时期。法祖敬宗,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的先民们,早就有将本部族已故杰出领袖(如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当作部族宗神来礼拜奉祀的风习。这既是先民们法祖敬宗观念的重要早期表现形态,也是我国祭祀历代帝王的开始。不过,那时可能还没有什么历代帝王庙,只是逢年过节到郊外或在宗庙中随祭。这类祭祀活动,古人称之为“郊”与“禘”。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古籍

《礼记》,在《祭法》中曾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书中说的,正是对有虞、夏后、殷、周这四个不同部族将其已故首领先王各自奉为神明祭祀的记录。《左传》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大约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人世间兼并战争的频繁和五霸七雄的出现,由于强秦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依稀可见,原先被各部落分别奉为宗神的太昊,少昊、颛顼(原东夷部落集团宗神)、炎帝(原西羌部落集团宗神),已逐步上升为各据东、西、北、南四方中一方的地域大神,而黄帝(原北狄部落集团宗族)更从地域大神上升成了位居中央,一统天下的大帝。由这五位组成的五帝,也成了中华民族先民所共同奉祀的先王上帝。《礼记·月令》在讲述战国晚期天子所应祭祀的先王上帝时,就将太昊奉为春季应祭祀的东方木德青帝,将炎帝奉为夏季应祭祀的南方火德赤帝,将少昊奉为秋季应祭祀的西方金德白帝,将颛顼奉为冬季应祭祀的北方水德黑帝,最后将轩辕奉为中央的土德黄帝。

对历代帝王的早期崇祀,我们还可以从



图例

- | | |
|---|-----|
| — | 夯土墙 |
| — | 散水 |
| — | 柱洞 |
| — | 复原线 |
| — | 柱础石 |
| — | 台阶 |
| — | 灰坑 |
| — | 灶坑 |
| — | 祭祀坑 |
| — | 排水 |
| — | 管断 |
| — | 崖 |

图一 凤翔雍城秦宗庙遗址中“亳社”图

先秦时期的帝王诸侯们所普遍奉行的“存亡国、继绝嗣”的举措中找到线索。《礼记·乐记》就曾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这里所说的黄帝、帝尧与帝舜之后，就是史书中所谓的“三恪”^①。而周武王封这些久已亡国之君的后裔为诸侯，就是为了让它们作为亡国之族的宗嗣，奉祀其先祖圣王而不令绝其祀。周武王对这些前朝圣王也要经常祭祀。《周礼》郑玄四类注所说的“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前几年，陕西省考古专家在凤翔马家庄发掘出了春秋时期秦都雍城的秦国宗庙遗址。在秦国宗庙主体大殿的身后，却还隐藏着一个小小方亭子似的建筑遗迹。有关专家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亳社”，即“亡国之社”，也就是秦君祭祀已亡国的前代帝王的殿亭^②（图一）。如果此说不误，它应当就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历代帝王庙”。

汉承先秦之制，间或也会有郊祀五帝等历代帝王之举。但这在当时可能还非常

制，也还没有专门的“历代帝王庙”的建置。将对历代帝王的祭祀奉为常制，从目前已有的历史文献分析，可能开始于隋代。《隋书·礼仪志（二）》云：“高祖既受命，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禘祫之月，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咎繇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殷汤于汾阳，伊尹配；文王、武王于泂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汉高帝于长陵，萧何配。各以一太牢而无乐，配者殮于庙庭。”因此，《同野集》所录明人萧端蒙撰《京师新建帝王庙碑》中说的“（祭祀历代先王）自秦而下，废而不讲者千年，隋始制为常祀，”还是对的。但隋代的做法是“各庙所都”，即于各帝王旧时发迹之都城设庙，还没有一个集中崇祀历代帝王的京师总庙。

祭祀历代帝王于京师设庙，从已有的历史文献记载看，应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旧唐书·玄宗本纪》曰：“天宝七年五月壬午，……三皇以前帝王，京师置庙，以时致祭。其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在各置一庙。”看来，实行的是京师置庙总

祭与各肇迹处立庙分祭相结合的做法。因此,明萧端蒙在《京师新建帝王庙碑》^③中,才有“唐天宝间,乃以群臣议置三皇五帝庙各一于京师”的说法;清世宗雍正帝在其七年《御制历代帝王庙碑》^④中,也才会有“历代帝王崇祀之制,肇于唐天宝七载,始置庙京师”的记载。不过,当时祭祀的庙宇,还不是一个包罗十分齐全的历代帝王庙。

二、缘起沿革

全面祭祀前代帝王的历代帝王庙,应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这在明清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是洪武六年初建,洪武七年遇火烧毁,当年又重建于鸡鸣山阳的^⑤。据《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六年与七年曾两祀历代帝王庙,而《明实录·太祖实录》更明确称七年上躬祀历代帝王于新庙,可知南京帝王庙确有六年初建、七年毁于火后重建之事。

明初永乐帝迁都北京后,诸坛庙陆续完备,惟有历代帝王庙一直迁延到嘉靖初年亦未建。此前明帝奉祀历代帝王,不是遣使至南京旧庙致祭,便是在北京其他坛、殿附祭,既不方便,又不郑重。这对明代帝都北京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得不设法弥补的重大缺憾。于是等到稍有闲暇余力而又好兴土木的嘉靖初年,方有在北京兴建新的帝王庙之举。对该庙究竟始建于何年?有关史书的说法却小有出入。笔者经过对有关历史文献的初步考证,认为其年代与事件发展的次序应当是这样的。

1. 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命罢帝王郊坛从祀,令建庙于京师,罢南京庙祭。《续文献通考》称,“嘉靖九年庚寅,右中允廖道南曾奏请将原在北京郊坛与五岳四渎一齐祭祀的历代帝王,改在南京历代帝王本庙祭祀。嘉靖帝虽初表依从,但不久他就改了主意,“命建庙于北都致祭”,“春秋俱在京行礼”。

2. 北京庙成前,暂于皇宫文华殿祭祀。据《续文献通考》,嘉靖九年,礼臣们顾虑建

庙费时,影响对历代帝王来春之大祭,故建议明年于南京本庙权添一春祭。帝览奏降旨,“来春暂于文华殿设坛(祭历代帝王),朕亲一举”。

3. 九年,嘉靖帝否决廖道南撤灵济宫改帝王庙之议,令工部另相地选址。据《明实录·世宗实录》载,嘉靖九年右中允廖道南曾“请撤灵济宫徐知证、知谔二神,改设历代帝王位”,然礼臣认为该地“所在窄隘,恐不足以帝王寝庙,宜择地别建”,于是帝命“工部其相地卜日兴工”。

4. 九年末,工部建议将帝王庙改置神武后卫(按:即今址),十年正月丁酉(初十二日),“奏入,报可”。据《明实录·太祖实录》,嘉靖帝批准工部将帝王庙地改置神武后卫即今址的日期在十年正月丁酉(初十二日),那么,廖道南初奏改灵济宫为帝王庙、礼部驳其奏建议改地,嘉靖帝准奏、工部选定新址并上奏诸事,则肯定不可能发生在十年的正月丁酉日以前短促的十一天中,而必皆发生于嘉靖九年。《野获编》将廖道南请撤灵济宫改帝王庙事载于嘉靖十年,当属误记,《帝京景物略》记其事于九年是对的。

5. 嘉靖十年正月丁酉(初十二日),明世宗正式批准工部奏议,允将历代帝王庙建在阜内保安寺故址,且不日兴工。事已具见上引《明实录·世宗实录》,不重录。嘉靖十年正月丁酉(初十二日)世宗准奏后,历代帝王庙于此后不久即当兴工。

6. 嘉靖十年春、十一年春,两祭历代帝王于文华殿东室。《明会典》载:“嘉靖十年春,为帝王于文华殿祭之……嘉靖十年,祀伏羲、神农……凡十一位于文华殿之东间……嘉靖十一年春,仍祭于文华殿”。

7. 嘉靖十一年夏,历代帝王庙落成;秋,世宗亲临祭祀。关于历代帝王庙最终落成的时间,《帝京景物略》与《明典汇》都说是嘉靖十年。《景物略》云:“世宗肃皇帝之九年,命建历代帝王庙……越岁庙成,上亲诣致祭”。“九年”之“越岁”,当即“十年”。《明典汇》说:“嘉靖十年三月,历代帝

王庙成”。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明实录》为当时逐日实录,所记事应最为可靠。该书言嘉靖帝正式批准于阜内保安寺故址建历代帝王庙,乃是在其十年的正月丁酉(初十二)日,是为此庙兴工时间之上限。如依《明典汇》该庙落成于嘉靖十年三月,则它自兴工至落成便只有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建成规模如此宏大的皇家庙堂,是根本不可能的,《明典汇》的说法肯定有误。《明会典》言“嘉靖十一年春仍祭于文华殿”,这是历代帝王庙到这时仍未建成的明证,《景物略》将该庙的落成定在嘉靖十年的说法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因此,雍正《御制历代帝王庙碑》称“嘉靖十年,乃建于京师阜成门内”,《光绪顺天府志》称“(历代帝王)庙建于明嘉靖十年”,都只能作已动工兴建理解,而不能作已建成理解。历代帝王庙准确的落成时间,应依《明会典》,作“嘉靖十一年夏,始建庙于都城之西。”这里的“建”,才是“建成”之意。《野获编》言嘉靖十年的“次年夏(历代帝王庙)竣役,”是正确的。《古今图书集成》也书定:“嘉靖十一年夏,(历代帝王)庙成;秋,上亲临祭之”。历代帝王庙的督建官,据《明典汇》载,是工部侍郎钱如京。

历代帝王庙在自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夏建成至1911年因清廷的灭亡而废止的近380年中,虽殿宇屡有修缮,但其作为历代帝王庙的名号、功能与性质却一直未变。1911年清廷覆亡后,历代帝王庙便遭废弃。民国初年,一度曾改作办展览之场馆使用。1931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与民国退位总理、慈善家熊希龄先生、幼儿教育家张雪门先生,利用历代帝王庙旧存殿宇,合办起了香山慈幼院实验学校。1941年该校易名为“北京女三中”,1952年被定为北京市重点学校。1972年统编为北京市第159中学而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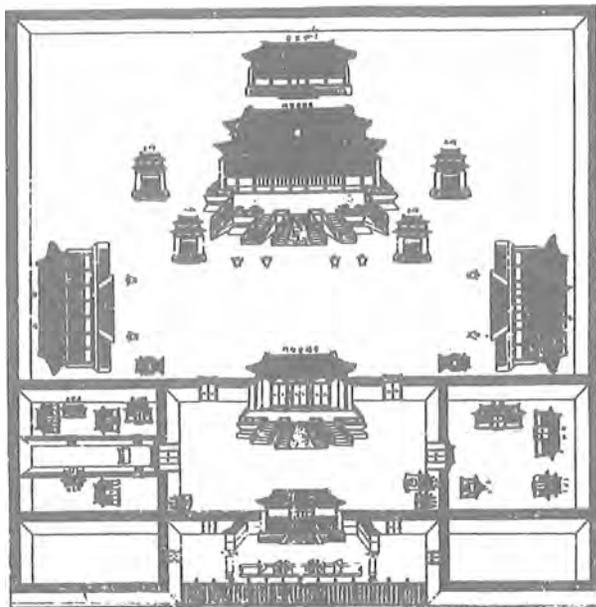
三、规模布局

清《礼部则例》载,帝王庙围垣周长“百

八十六丈三尺八寸”,合621米。其占地总面积,近年实测为18000平方米^⑥。除清代曾增筑过碑亭,改建过景德外西院诸殿外,建筑布局没有大变。

该庙明初创时的建制,明·孙国敕《燕都游览志》仅称该庙主殿祀帝王,两庑祀名臣;刘侗《帝京景物略》也只说它“庙五室”(按:实应为“殿五室”),均极简略,明末清初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则记其内有景德崇圣殿、东西两庑、燎炉、祭器库、景德门、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庙街东西的景德坊、下马牌等,内容稍备,但缺乏对具体建筑规制的描述。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的《礼部则例》是最早对其建筑规制作描述的典籍。这段文字,光绪《顺天府志》在引录时称文出《旧闻考》,《燕都丛考》称文出《顺天府志》,实皆应改为出《礼部则例》。记殿堂开间,《旧闻考》称“楹”,而其余两书称“间”。正殿琉璃瓦,《旧闻考》称“黄色”,而其余二书均称“绿色”。后者实是清乾隆二十九年改碑亭与正殿琉璃瓦为“黄色”之前的旧貌;前者,是此后的“新颜”。此外,随意增减文字的现象在三书中时有发生,引文皆不够准确。在《礼部则例》中,有“殿东御碑亭一”语。从语义分析此亭似为清构,而去除此亭大致便应是明庙原始布局。然从成书于雍正年间,略早于《礼部则例》数十年的《古今图书集成》之《经济汇编礼仪典》第二〇六卷载《帝王庙总图》看,该庙景德崇圣殿两侧雍正年间已有东、西各两座御碑亭,而并非如乾隆年间《礼部则例》所载,仅有“殿东御碑亭一”。看来《礼部则例》是漏记了一座清建御碑亭,而要恢复明庙原布局,则只需去掉景德崇圣殿两侧东、西两座清建御碑亭即可。据《日下旧闻考》引《同野集》,明人萧端蒙在帝王庙初成时也撰有《京师新建帝王庙碑》,明代不知置于庙中何处。今此碑是文虽存而石已亡。

清代对历代帝王庙的修缮,以雍正、乾隆两朝用力最大。《日下旧闻考》载其事曰:“帝王庙……明嘉靖间建。……雍正七年重修,有御制碑文。乾隆二十九年又修,



图二 《清会典图》卷一五《帝王庙图》

易盖正殿黄瓦。皇上亲诣行礼，有御制诗文，俱勒碑殿亭。殿内额曰：报功观德。联曰：治统溯钦承，法戒兼资，洵哉古可为鉴；政经崇秩祀，实枚式焕，穆矣神其孔安。皆皇上御书。”

雍正年间的重修，从乾隆《御制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称“庙自雍正癸丑缮葺”看，应自雍正七年至十一年（癸丑年），历时四年。除修葺明代诸旧构外，还增建了景德崇圣殿西侧与东南侧的两座碑亭。乾隆年间的重修，除修缮诸旧构外，又在景德崇圣殿东侧与西南各增建御碑亭一，《乾隆京城全图》的《历代帝王庙图》，绘有景德崇圣殿西侧与东南侧的御碑亭各一，其东侧之御碑亭已无，而只剩下一座巍然矗立的巨型石碑。据笔者实地调查，现四碑亭中：东碑亭阳面为清乾隆五十年二月《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记》满汉合文，阴面无字；西碑亭，为无字碑；东南碑亭阳面为雍正十一年《御制历代帝王庙碑》碑文，阴面为乾隆五十年《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碑文；西南碑亭阳面的乾隆二十九年《御制重修历代帝王庙碑》碑文，阴面为乾隆二十九年《历代帝

王庙瞻礼诗》碑文。看来，雍正年间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所绘《历代帝王庙图》中主殿东西两侧对称的碑亭，其正确位置应一在主殿正西侧（无字碑），另一在主殿东南侧（雍正十一年御制碑），二者并不严格对称，图绘有误。清嘉庆二十三年成书的《大清会典图》所附《历代帝王庙图》反映的，则是清乾隆五十年后的最后布局（图二）。该书所绘，已是今日所存的四座碑亭。其西南碑亭，应建于乾隆二十九年；东碑亭，应建于乾隆五十年。

帝王庙大门外街南，有绿琉璃瓦歇山顶大影壁一面，清雍正年间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有图。它应为明嘉靖年间始建时旧构，今仍存。据调查，该影壁正中原有砖雕莲花为饰，四角也饰有砖雕角花。“文革”期间均以石灰浆面封盖。原有绿琉璃瓦顶建国后大多脱落，1990年亚运会前修顶抹墙后，方成为今貌。

《清会典图》所载“庙前正中石梁三”、“朱栅”与“东西夹墙”，均已因近现代拆毁而不存。所载“左右下马石碑”，《春明梦余录》、《礼部则例》称“下马牌”。是原为木质



修缮前



修缮后

图三 修缮前后历代帝王庙山门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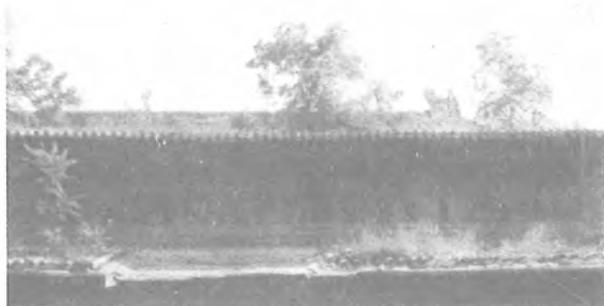
之牌后改为石碑，还是原本即为石碑而称牌，现已难以考定。这两座下马石碑原立于石桥两侧，建国后移至现址，“文化大革命”中碑身被砸碎并就地掘坑掩埋，今碑底座仍在庙门前两侧。庙前街东西两侧，旧有两座琉璃瓦顶重檐三门的彩绘景德街木构牌坊。这两座牌坊，《会典图》图绘而文不及，《梦余录》、乾隆《礼部则例》则均有记载。它也应为明代旧构，清代曾屡加缮修，1954年拓宽马路时被拆除。“庙门三间，左右门各一”，“庙门左右角门各一”。按：现左右角门皆已不存。三间庙门则于1994年挑顶大修(图三)。

景德崇圣门，《清会典图》称其“五间，崇基石栏，前后三出陛，中十有一级，左右各九级，左右门各一，界以朱垣”。现左右门与朱垣均已拆除不存，庙门与景德崇圣门则均为单檐，黑琉璃瓦绿剪边歇山顶。

“崇圣门外东院，《清会典图》称其“东垣一重，门一，西向；门内神庠三间，南向；

神厨三间，宰牲亭三间，均西向；井亭一，四面间以朱椽”。现除东垣与门已被现代拆除外，余均保存完好。神庠、神厨与宰牲亭1996至1997年曾重修。

崇圣门外西院，《图》则记有“西垣一重，门一，东向；门内照壁一。入门而北，界垣一；东西二门，皆南向；东一门内，关帝庙一，南向；右，祭器库五间，东向；西一门内，遣官房三间，南向；右，斋宿房五间，东向。入门而南，界垣一重，门一，北向；门内，乐舞执事房五间，东向；门之西，为典守房三间，北向。庙门内，东西看守房各三间；东，钟楼一，西向。”按：观《古今图书集成》附图，景德门外西院仅有西垣与门，院内空无一屋，反映的可能是雍正七年重修帝王庙以前直至明代的原状。在成书于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图》附图中，景德门外西垣院内的三座建筑的布局与《会典图》附图所绘大不一样，它所反映的应是雍正七年至十一年重修后至乾隆二十九年再次重修前的



修缮前



修缮后

图四 修缮前后历代帝王庙景德殿对比

格局,三座建筑有可能就是乾隆《礼部则例》所说的“承祭官致斋所”。《清会典图》附图所描绘的,则是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后的最新、也是最后定型的景德门外西院的建筑布局。如今,《清会典图》中所描绘的界垣、照壁、各门及关帝庙、遣官房、斋宿房、典守执事房均已于近现代拆毁;原西院内五间祭器库和五间乐舞执事房,则于1990年重修,作办公室用。一般寺庙各作东钟楼、西鼓楼的对称布局,但帝王庙却有钟楼而无鼓楼,此系已故帝王寝庙通制。庙门外东西看守房,也已于现代拆除。

景德崇圣殿,《图》称其面阔“九间,重檐,栋梁五彩,崇基石栏。南三出陛;中,十有三级;左右各十有一级。东、西一出陛,均十有二级。阶上下,鼎炉各四;左右,御碑亭各二;东、西庑,各七间,一出陛,均八级;阶下,鼎炉各二;东庑南,绿色琉璃燎炉一;西庑南,砖燎炉一;殿后,祭器库五间,南向。”按:鼎炉、燎炉、殿后祭器库五间,今

皆不存。景德殿在1995年大修前,殿顶杂草、树木丛生,最大的树木主干粗如碗口(图四)。明建帝王庙各殿,均用绿琉璃瓦或黑瓦绿剪边;乾隆二十九年,将“正殿与御碑亭均用黄琉璃,余皆黑琉璃绿缘”。四座碑亭,据碑文,正西与东南侧两座应建于雍正十一年,西南侧一座应建于乾隆二十九年,正东一座应建于乾隆五十年。

四、祀君配臣

隋以前郊祀历代帝王多为三皇五帝,然无常制。自隋高祖始将祭祀历代帝王定为常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祀君为尧、舜、禹、汤、周文、周武、汉高,配臣为契、咎繇、伯益、伊尹、周公、召公、萧何,然无京师专庙,只于各地分祭。唐玄宗天宝年间始于京师设帝王庙,然所祀之君仅三皇以前诸帝。

洪武六年初设金陵帝王庙,所祀为太

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馨、尧、舜、禹、汤、周文、周武、汉高、光武、隋高祖、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十九帝。《日下旧闻考》卷五一为乾隆《御制祭祀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所作注文称：“已而罢周文王、隋高祖、唐高祖之祀”。从六年庙毁于火、七年另建新庙的有关记载分析，所谓“已而”云云当指七年新庙而言。然据《明实录·太祖七年实录》，七年新庙所罢者仅周文王、唐高祖二帝，未罢隋高祖。故七年所祀，应为罢去六年周文王、唐高祖后所余之十七帝。其他各书所载或多或少，均不准确。金陵庙配飨名臣，明·萧端蒙《京师新建帝王庙碑》称有“自风后，力牧而下凡三十七人”，而《古今图书集成》引《图书编》言仅有风后、皋陶等三十二人。从《帝京景物略》录嘉靖十一年北京帝王庙首列各臣为三十二人，且与《图书编》仅坛位有别而姓名全同看，似当以《图书编》所录三十二人者为是。他们应是：“东庑风后，皋陶、龙、伯益、傅说、召公奭、召穆公虎、张良、曹参一坛，西庑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萧何、陈平一坛，又东周勃，冯异、房玄龄、李靖、李晟、潘美、岳飞一坛，又西邓禹、诸葛亮、杜如晦、郭子仪、曹彬、韩世忠、张浚一坛”。据《太祖实录》，金陵帝王庙主殿内分为“五室”祀各帝。这“五室”，不是指主殿面阔开间，而是指殿内的“龛”数，此制后亦为北京庙所继承。《野获编》言金陵庙“七年始设塑像”，《太祖实录》也说“列序圣像”，看来金陵庙是设有神像的。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未遑设帝王庙，仅于郊坛附祭；嘉靖十年，始为位于文华殿而祭之”（《野获编》）。据《明会典》，文华殿所祭乃“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凡十一位”。这一祭典在历代帝王庙建成开祭后似仍未断。据嘉庆《清会典图》卷一五载，清代在文华殿之东仍设传心殿，也祭上述十一位帝王与配臣。显然，清代传心殿所承袭的，正是明嘉靖文华殿之旧制。

关于明嘉靖十一年建成的北京历代帝

王庙的祀主，可以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1. “庙设主不像”（《帝京景物略》）。也就是说，庙中仅设神主灵牌而不设神像，与金陵庙设像者有别。

2. 庙中主殿内也设“五室”，仍承金陵旧制。

3. 初祀的十六帝，较金陵七年新庙减少了隋高祖。中室供三皇、左一室供五帝，右一室供三王，左二室供汉高、光武、右二室供唐太宗、宋太祖与元世祖，采用的仍是左昭右穆制。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年间关于元世祖灵位的取舍之争。《帝京景物略》载：“庙初，元世祖犹列。（嘉靖）十年九月，翰林院修撰姚涑奏言：‘元世祖虐浮犬戎，狡深刘、石，贪刷契丹、暴过女真’（按：意在撤去其神位）。部议‘太祖睿断有确’。不从。（嘉靖）二十四年二月，礼科给事中陈棻奏言，遂罢元世祖祀。”嘉靖帝十年遵明太祖遗制不罢元世祖祀而于其二十四年终罢元世祖祀，除如清乾隆帝在《御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中所说，是“狙于中外之见”外，（按：即所谓“夷夏之大防”），恐怕更为重要的还是明廷来自朔北蒙古族愈益严重的军事威胁。元蒙自洪武元年退出北京、遁居漠北以后，铁骑便不断攻袭明的北边城乡。然在明英宗土木堡被蒙军俘虏之前，明廷仍占优势，土木之变后明廷则转为了劣势、守势。嘉靖帝即位后，耽于道玄，无视朝政，蒙古军乘机屡屡入侵，边关频频告急。嘉靖二十一年，边关警报日至。嘉靖二十四年之历代帝王庙终撤元世祖祀位，正与这种紧张对立的军事形势有关，是明中叶激烈的国内民族矛盾的反映。这次撤元世祖之祀位虽说是事出有因，却是囿于夷夏之防，于理不顺，不如明太祖之明理大度。

4. 东西两庑配殿虽与金陵庙一样仍分设四坛，但各臣的分布却颇有变化，我们就不详录了。

清于入关伊始的顺治二年，就恢复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其祭祀礼仪虽与明代大同小异，但祀君配臣的组成却有重大变

化。奉祀君王除恢复了元世祖外,又新增了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和明太祖共二十一帝;配祀贤臣撤去了潘美与张浚,新增了许远、张巡、斛罗、韩里不、伯颜、粘没忽、木华黎、徐达、刘基,共39臣。明清鼎革后,作为前朝的明太祖、徐达、刘基君臣的增入,是理所当然的。值得重视的是,由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世祖神位的恢复和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及辽、金、元诸配臣神位的增入。这方面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满清也是从漠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他们之间同类相援的缘故,但从今日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高度审视,当年这种增入无疑也是有理有益的。但是因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南北朝时期五胡十六国之王和与辽金同为偏安之国的汉族东晋、宋、齐、梁、陈和五代等诸君均未入祀。所以这次的增入又是有所偏颇的,不全面的。这,正有待嗣后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继续予以校正补足。

据《清会典》载,于其在位六十一年十月,清康熙帝曾连下两道圣谕,令增补历代帝王庙崇祀帝王与配飨功臣。第一道圣谕称“应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第二道圣谕云“明愍帝(按:即崇祯)无甚过失,国亡由伊祖所致,不可与亡国者例论,万历、泰昌、天启三君不应入祀。”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帝谨遵遗命,增祀143帝,功臣49人。合原祀帝王共164人,功臣共79人。成书于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二〇六卷附《帝王庙祭祀图》与《清会典》文中载记仍均作五龕。《清会典》文末云“原祀五龕,增二龕,共七龕”,所记应是乾隆年间的后事。

乾隆元年,谕旨增祀明建文帝。乾隆四十九年又降谕旨,认为康、雍时“诸臣不能仰体圣怀,详细讨论,未免因陋就简”,既云“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适足以启后人之訾议”,“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意存轩轻。”谕旨诘问:如将自汉昭烈至唐及五代之君“概

不列入,则东、西晋、前后五代数百年间创守各主祀典缺如,何以协春秋公论”?并具体指出:周世宗、北魏太武、道武帝均为偏安英主,唐宪宗被弑祸变猝乘,其能削平淮西,尚属英主,金哀宗自缢殉国实因海陵淫虐,均应一体增祀。汉之亡,亡于桓、灵而不亡于献帝。群臣奉旨,增祀北魏太武,道武,唐宪宗,周世宗,金哀宗等25帝,削去东汉桓、灵二帝。最终,共得祀君188帝,配臣79人,这一局面,一直沿续至清亡而未改。由于祀君人数较前猛增数倍,乾隆年间,除增景德殿五龕为七龕外,还将西一龕辟为左、右二室,将西二、西三、东三这三龕各辟为中、左、右三室。各龕各室祀君配臣名号及排列次序,《清会典图》均有详备记录,读者可以参看,我们就不罗列了。

清帝康熙、乾隆在无道被弑亡国之主不得入祀的大前提下,能对亡国被弑的唐宪宗、金哀宗、明愍帝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准其入祀,这是十分难得的。尤其是乾隆帝在四十九年圣谕中,能对本朝顺治、康熙、雍正年间前代君臣入辽、金而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的不公正做法提出坦率的批评,并严旨予以纠正,显示了盛世明君的雍容风范,更为难能可贵。

关于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典仪,那是又一个专门的问题,这里就不涉及了。

① 古代新的统治王朝为笼络人心,巩固统治,往往封前代三个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特称三恪。恪,表尊崇意。三恪,起于周代。

② 亳,本为商代王都之专称,有似于周称京、楚称郢。“亳社,原指已亡国的商人之神社,后泛指亡国帝王的庙社。秦雍郑“亳社”,见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2期。

③ 《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城市》引《同野集》。

④ 《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城市》增录。

⑤ 见明萧端蒙《京师新建帝王庙碑》,出处同注③;和清雍正帝《御制历代帝王庙碑文》,出处同注④。关于金陵帝王庙的两次重建,见明沈德符《野获编》。

⑥ 《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简介》。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辽代白塔寺史迹考

黄春和

白塔寺位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因寺中有一座元代人仕中国的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建的大白塔而闻名遐迩。关于寺庙历史沿革,寺碑、佛教史料和北京地方志书对它均有记载,可以理出一条清晰、连贯的头绪:它始建于辽道宗时期,当时叫永安寺,寺中有一座“释迦舍利之塔”,金末元初因战火而寺毁塔存。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下令掘开辽塔,发现舍利等圣物,因此请尼泊尔工匠阿尼哥重建藏式白塔。至元十六年(1279年)白塔落成后,旋即建寺庙,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寺庙落成,忽必烈赐名“大圣寿万安寺”。元至顺二十八年(1368年)一场雷火将寺庙殿堂废尽,惟白塔幸存。明天顺元年(1457年)宛平人郭福奏请朝廷,寺庙又得以重建,并更名“妙应寺”。这次重建后,寺庙在明、清、民国和解放后又经多次重修,但建筑格局始终未变。由此可见,白塔寺自辽至今的历史沿革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时下的一些出版物上,凡是介绍白塔寺的文章几乎一致地声称白塔寺始建于元代,而无端地将其辽代历史抹去。因此,有必要对白塔寺那段“鲜为人知”的辽代历史重新进行审视和考证。

关于辽代白塔寺历史,元朝一位佛教长老如意祥迈所撰《圣旨敕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铭》(以下简称《白塔圣旨碑》)中有一段重要记载:

初,旧都通玄关北,有永安寺,殿堂废尽,惟塔存焉。观其名额,释迦舍利之塔;考其石刻,大辽寿昌二年三月十五日显密圆通法师道殿所造也。内有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无垢净光陀罗尼五部,水晶为轴。因罹兵火,荒凉芜没,每于净夜,屡放神

光,近居惊惶,疑为失火,即而仰视,烟焰却无,乃知舍利威灵,人始礼敬。奉御秃列奏其祥瑞,上闻而信之。欲增巨丽,俾开旧塔,发而祥视,果有香泥小塔。下启石函,中有铁塔,内贮铜瓶,香水盈满,皎然鲜白,色如玉浆,舍利坚圆,璨若金粟;前二龙王跪而守护;案上五经宛然无损,金珠七宝、异果十种列而供养。瓶底莖一铜钱,上铸至元通宝四字,乃知圣人制法,预定冥中,待时呈现,开乎天意。即至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帝后阅之,愈加崇重,即迎其舍利,立斯宝塔。^①

这段记载是目前发现的关于白塔寺辽代历史的最早史料,也可以说是惟一的一条可靠记载,因为明清时北京一些地方史料,如《宛署杂记》、《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顺天府志》、《日下旧闻考》等,虽然都有白塔寺辽代历史记载,但是明显可以看出,它们所记内容都超不出元初如意祥迈长老所撰的碑铭,都是源于元碑或辗转传抄的。这段记载虽然文字不多,但是它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结合历史进行分析考察,我们对辽代永安寺兴衰历史,寺庙重要人物以及宗派属性基本可以获得一些清晰的认识。

一、永安寺建时、建置及毁弃原因

首先看寺庙建时。《白塔圣旨碑》说永安寺“释迦舍利塔”建于辽寿昌二年,“寿昌”是辽道宗皇帝的年号,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永安寺建时应在道宗皇帝在位之时。道宗皇帝是辽代历史上奉佛最虔诚和最热心的一位帝王,史称他“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祝发三千”^②,在他的扶持和带动下,辽代佛教在他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出现了佛学

流派纷呈,寺塔星罗棋布的盛况;同时这个时候又是辽代密教最兴盛的时期,涌现出觉苑、道殿等一批著名的密教高僧,还形成了“显密融通”的佛学风气。永安寺在《白塔圣旨碑》记载中多处显示为一座密宗传播道场,特别是有密教高僧道殿在此建塔,与道宗时佛学风气正好吻合。由此可见,道宗皇帝时既有与永安寺吻合的佛教密教流行,又有道宗本人扶持佛教的良好的佛教发展氛围,永安寺兴建于是这个时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和特色是完全相符的。

关于寺庙建置,《白塔圣旨碑》说在“旧都通玄关北”。这一说法虽然不很具体,但所指与现在白塔寺位置大体相符。“旧都”,元人所指无疑是金中都,其中心位置约当今宣武区属界。“通玄关”就是通玄门,又称通天门。它正对着当时皇宫,是中都城北垣四门之一,自西数第二道城门。《金史》记载说:“中都城门十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③解放后文物工作者对中都城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基本确定了它的四垣、城门和城中重要建筑的位置。其中,北城墙约在今白云观北边附近,东北城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四座城门一字排开,会城门在今白云观西约一公里处;通玄门在今西便门西北不远处;崇智门在今西便门东北方向,南与牛街成一线;光泰门在今宣武门附近^④。从考古得出的这些结论看,今白塔寺位置恰在当时中都城通玄门北面,但横向上略偏西一点,不是通玄门的正北。严格说来位置是不符的,但稍加分析,应无疑问。因为从横向上看,今白塔寺与当时通玄门和崇智门距离差不多,客观上讲以其中哪一座城门指称都是可以的,但通玄门对着皇城,是皇家出入的门户,名声较大,因此当时人自然要选择通玄门来作为指示的重要参照对象。

关于寺庙毁弃原因。《白塔圣旨碑》说是“因罹兵燹”,由于“兵燹”,永安寺“殿堂废尽”,惟一留下了佛塔。从当时历史背景看,碑文所说“兵燹”应指发生于金末元初的蒙古灭金战争。据史料记载,蒙古在1206年

建立汗国后,曾于1211至1214年间先后对金朝中都城发动了四次围攻,在每一次入侵时都直接威逼到中都城下,屯兵于中都城外。永安寺地处中都城外北郊,正是蒙古军队南下威逼中都的屯兵之地。蒙古军队在第一次入侵时曾屯兵在中都郭外一座叫“仁皇寺”的庙中^⑤。由此看,永安寺也必定是蒙古屯兵之地。在当时社会那种野蛮的军事对抗中,战争造成的破坏是不难推想的,而事实上蒙古发动的多次灭金战争给中都城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城中宫阙废为瓦砾,城外一片荒芜,这些都有史料明记。由此看来,永安寺毁于蒙古灭金战争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永安寺显密圆通法师道殿其人

《白塔圣旨碑》记载“显密圆通法师道殿”在永安寺建造了一座“释迦舍利之塔”,说明道殿与永安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记载对我们了解永安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因为道殿这个人物是辽代末期声名显赫的密教高僧,通过对他的生平事迹和佛学思想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永安寺在当时的宗教地位、影响与宗教性质。

道殿生平事迹主要见于他所著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自序、门人陈觉《序》,以及门人性嘉所作《后序》中,他生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山西大同人。俗姓杜,字法幢。七岁拜师出家,十五岁学律。其后他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四方参学,接着是到燕京弘法,最后归隐五台山金河寺。其中后两个阶段的活动是由其门人性嘉《后序》中说他“利名不染,爱恶非交,既而厌处都城,肆志岩壑”^⑥之语反映出来的。但其一生踪迹只有燕京和五台山两地可以确定。燕京是他一生活动的主要地方和重要时期,他在燕京大唱显密融通思想,教授门徒,一时形成极大影响,他的门徒性嘉和陈觉就是他在燕京弘法时“亲蒙其教诲”的,“显密圆通法师”也是他在燕京时道宗皇帝赐给他的封号。由于道殿的大力弘扬,辽代

密教在当时众多的佛学流派中脱颖而出,占居重要地位,《中国佛教》一书中称:“辽代最发达的教学是华严,其次是密教。”^⑦由此可见密教在当时地位之高。道殿在燕京活动的地点永安寺当无疑问,但不应仅此一处。道殿归隐五台山是因为厌恶都市生活,由此看他当时可能已届暮年。归隐以后,他潜心著述,终于将他一生思想结集为《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书。其门人性嘉在《后序》中说:“每念生灵懵于修证,由是寻原讨本,采异搜奇,研精甫仅于十旬,析理遂成一卷,号之曰《显密成佛心要集》,并《供佛利生仪》。”^⑧庆幸的是道殿的这一著作连同门人的序文都流传了下来,原为一卷,现在分为上下两卷,最近看到中国宗教出版社有排印本出版。

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就是道殿隐居地五台山。这个五台山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它在河北蔚县境内,俗称“小五台”或“东五台”。《蔚州志》记载说:“五台山在城东一百里,其山五峰突起,俗称小五台,又曰东五台,以别于晋之清凉山。”^⑨金河寺就在这座“小五台”上。《辽史拾遗》引《山西通志》载曰:“金河十寺在蔚州东南(应为东北)八十里五台山下,河中碎石如金,故名金河寺,俱辽统和间所建。”^⑩辽时金河寺颇有影响,不仅出了一位显密圆通的道殿大师,著名《龙龕手鉴》的作者行均也曾卓锡于此,行均的著作也是在这里完成的。辽圣宗和道宗都曾亲幸金河寺,《辽史·圣宗纪》称:“统和十年九月癸卯,幸五台山金河寺饭僧。”^⑪同书《游幸表》也记载道宗于清宁九年九月“幸金河寺”。^⑫据《河北蔚县小五台山金河寺调查记》一文调查结果,金河寺现已毁弃,寺基尚存,位于小五台台北台东麓,西临金河。^⑬

道殿的思想特色是显密融通。所谓“显密圆通”就是显教和密教相互融合吸收。那么道殿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将二者合而为一的呢?为了加深对道殿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不妨看看他在理论上的独特创见。道殿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显密圆通成佛心

要集》中。这部著作共分四个部分:一显教心要,二密教心要,三显密双辨,四庆遇述怀。道殿在《自序》里说:“无畏(善无畏,唐开元三大士之一)来唐,五密盛行于华夏。……既经年远,误见弥多。或习显教,轻诬密部之宗;或专密言,昧黷显教之趣;或专攻名相,鲜知入道之门;或学字声,罕识持明之轨。遂使甚深观法,变化名言,秘密神宗,翻成音韵。今乃不揆琐才,双依显密二宗,略示成佛心要,庶望将来,悉得圆通。”^⑭由此可见,道殿撰写此书的动因十分明显,那就是因为显教之人“轻诬密教”,单执名言法相,而不知入道之门,密教之人又昧于显教,只知持明念咒。这些在他看来都不全面,都有偏废。所以他又说:“习显教者,且以空有禅律而自违,不尽究竟之圆满;学密部者,但以坛印字声而为法,未知秘奥之神宗。”^⑮有鉴于此,他认为显教和密教在理论和修法上应当相互吸收融合,优势互补。具体的说,习显教者应当学修密教坛印字声,学密教者应当吸收显教的精密理论和观法。道殿不仅在理论上力主融通,而且还落实到自己的修行实践中。他在《显教二教颂》中说:“数年何幸顿忘忧,显密双修称所求。五部神功功可赖,十玄妙观观无休。音高音下真言转,身去声来华藏游。法界众生欢喜事,只疑即在我心头。”^⑯从这首偈颂明显可以看出道殿将显教华严宗的“十玄门”观法引进到了他的密教实践之中。

三、永安寺佛教属性

《白塔圣旨碑》记载永安寺“释迦舍利之塔”由道殿建造,而道殿由上考知是辽代一位享誉北方的密教高僧,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推知永安寺在当时是一座典型的密教寺院。值得庆幸的是,《白塔圣旨碑》还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具体的依据,那就是元初忽必烈下令开启辽塔发现的塔藏圣物。

在永安寺“释迦舍利之塔”发现的塔藏中有两类圣物体现出鲜明的密教特色:一类是“无垢净光等陀罗尼五部”;一类是“香泥小塔二千”。^⑰无垢净光陀罗尼属于“法舍

利”，是佛陀精神的象征。遗憾的是这五部陀罗尼只有一部的名称标明出来，就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其余四部不知具体名称。不过我们可以看出以《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首的这五部陀罗尼应当是当时较为流行的用于塔藏的陀罗尼，就像密教金刚界五部陀罗尼一样也是一种佛教法定的组合形式。我们知道，陀罗尼是密教区别于显教的独特崇奉，是密教神秘主义的重要体现。陀罗尼为梵语音译，意译“总持”，意思是能摄持善法不使其散失，能摄持恶法不使其生起。陀罗尼有法、义、咒、忍四种形式，但一般所指为咒语形式的陀罗尼，又称真言陀罗尼，是诸佛菩萨的真实言教。陀罗尼由于有此特殊功用，它在密教里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密教修行强调身、语、意三密相应，即手结印契，口诵真言，意作观想，其中语密所修内容就是陀罗尼。由于密教的宣传和影响，陀罗尼还被佛教徒铭刻在经幢上，或书写印刷成经卷用作佛像，佛塔的装藏，以赋予被赋加者以灵性和功用，以此祈求功德。永安寺“释迦舍利之塔”所藏无垢净光等五部陀罗尼正是密教这一崇奉的具体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迄今发现的藏有陀罗尼经咒的塔藏中，所藏陀罗尼一般种类不多，皆为一至二种，像永安寺辽塔入藏五部之多实不多见，但我们联想到塔的建造者显密圆通法师道殿其人，就不足为奇了，无疑是道殿根据一定的密教供奉仪规进行布置的。

香泥小塔是密教特色的另一重要体现。香泥小塔又叫“擦擦”。《元史·释老志》记载：“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⑩它是用泥和以香料，用模范制成的小塔。形状是上面呈圆锥形，下面是圆形底座。形体很小，一般不过四、五厘米。擦擦起源于印度，从流传情况看，主要为密教崇奉。在汉地，唐代时长安、洛阳等地盛行一种叫“善业泥像”，也是属于擦擦，而其盛行正与当时密教在两地的流行相关。我国西藏、蒙古等地区流传的主要是密教，擦擦的供奉十分普遍，

其制品随处可见，遗存下来的不少。辽代密教沿袭唐代余绪，同时又有印度密教僧人慈贤、摩尼等人入辽弘密，密教影响极大。由此可见，永安寺辽塔所奉香泥小塔不是随意的奉物，它是当时密教流行的结果，是密教固有崇奉的体现。

永安寺辽塔这两类密教圣物不仅体现了永安寺鲜明的密教特色，同时为道殿在永安寺建塔，道殿在燕京的活动，以及辽代舍利供奉制度也提供了重要历史见证。

综上考述，我们对辽代永安寺历史可以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永安寺在今白塔寺位置上，建于辽道宗时期，是一座重要的密教寺庙，寺中有一座“释迦舍利之塔”，由辽代著名密教高僧道殿于寿昌二年（1096年）建造。金末元初之际在蒙古围攻金中都的战火中遭受严重破坏，殿堂全部废弃，只留下一座残破的佛塔。这座辽塔是元初重建塔寺的重要根据，也是连接辽金元寺庙历史的一条重要纽带。

①⑦元·如意祥迈《至元辨伪录》卷5。

②《辽史·道宗六》卷26〔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10月第一版第314页。

③《金史·地理志》卷24〔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版，第572页。

④《北京考古四十年》第160-162页。

⑤《大金国志》卷23。

⑥⑧性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并供佛利生仪后序》，《全辽文》卷9。

⑦《中国佛教》第91页。

⑨《蔚州志》卷4。

⑩《辽史拾遗》卷15。

⑪《辽史·圣宗纪》卷13〔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10月第一版第143页。

⑫《辽史·游幸表》卷68〔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10月第一版第1072页。

⑬《文物》1995年第1期。

⑭⑮道殿《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序》，《全辽文》卷9。

⑯道殿《显密二教颂》，《全辽文》卷9。

⑰《元史》卷202《释老志》。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员）



北魏太和造像年代质疑

· 刘之光

北魏太和造像是1957年由北京市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56年在侯燊先生的指导下,由笔者实地验看后提出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案,并于次年由市批准公布的。

近年来,为协助北京市石刻博物馆编制北京石雕图录,又曾数次去聂各庄车儿营勘查此造像。每看一次,即有疑点难以自圆,因而疑窦丛生,屡拟提出个人看法,以求相互探索。今造像失而复得,于修复后在石刻博物馆展出。事即告一段落,也乘此将所想疑点提出,供识者指正。

一、对一些有关造像记载的述评

有关对此造像的文献记载均很晚。过去一些金石爱好者均无著录。直到清末,始有此造像的出现。最初的记载应是志伯石的《寄影轩浮生目录》所载:“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四月初八日,赴辅卿处,同赴妙峰山进香,出西直门,十二里海淀,十里萧家河,……五里聂家庄,日已落,西去即山。山路坡陀,车行不易,乃下车步行。五里石佛殿。庙中香客已满,几无歇装;匀得

韦驮殿小室而住。……初九日阴,寅正起,赁舆登山……未初返。三十里至石佛殿,少憩,至各殿拈香,见石佛背有太和十三年款,始知为北魏所造云。”(引自《妙峰山琐记》,志伯石名润,系道光末年闽浙总督裕泰之子。)

此后,是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载:“石佛寺阎氏造像题名,太和廿三年三月十五日□……。石造像在昌平西南五十里石佛寺,光绪庚辰(六年,1880年)潞河张翼所访得者,……。”(见图一原书影)陆氏卒于光绪八年。《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应完成于此时,只是未能刊出,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始刊刻出版,但陆氏已在生前,见到此造像铭刻拓片,并收入其稿本。

《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载:“阎惠端为太皇太后造像记,存,正书。太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在昌平州西南五十里妙峰山石佛寺。前人未著录。光绪六年,通州张翼访得之。像造于太和十三年,为孝文帝即位之十九年。记中云太皇太后即文成文明皇后,帝之祖母,承明元年,尊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太和十四年崩,造像在十三年,正太后临朝时也。余皆阎氏人题名。”



图一 《八琼室金石补正》造像录文

此记和《八琼室》记载同一来源,只是《顺天府志》为清末出版,早于《八琼室金石补正》。

《妙峰山琐记》载:“石佛殿在洞之西北,山门一,殿三楹,并东向,有咸丰三年石刻题名。殿中奉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阎惠端等造石佛一躯;背面下方刻有造像记。”注解云:“共和己未(民国八年、1919年)四月初七日,余携第三儿登妙峰,至此瞻礼。佛身高与人等,背光石座具,身涂赤金,眉间嵌紫色宝石,左手按膝,右手曲肱,掌拊膺,不类今制。石座镌二尊者,小而倾侧,殿宇甚暗以烛照视,佛背上部镌列小佛十二层,层十二尊,加以彩饰,下部刻‘太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阎惠端为皇帝,太皇太后造像’等字,并列阎氏多人名。石面凹凸不平,字画如锥沙印泥,起落无迹。瞻礼竟,题名廊柱。”按《妙峰山琐记》民国十八年出版。作者奉宽为满人。硕学淹贯,尤对北京历史造诣深厚。

《北平旅行指南》也有类似记载,其云:“寺在温泉西北二十里山坡,即赴妙峰山之老北道傍,地名为车儿营,属昌平县。寺坐西向东,山门已塌,佛殿三层亦残缺。前殿有韦陀,中殿为正殿供奉石佛。佛面涂以泥,而装金饰彩,高八尺,宽有三尺五。后有佛光,并雕有小佛二十余尊。正中光芒

上画有佛印一颗。后背分为二截,上截为坐像小佛百余,下截刻曰‘太和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阎惠端为皇帝太皇太后造像’。余为造像人名。”是书系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并有造像照片一帧。

综观上述记载,《寄影轩浮生日录》是有关造像最早的文献记载;《八琼室金石补正》和《光绪顺天府志》则对文字和内容进行了辨认和初步考证;《妙峰山琐记》和《北平旅行指南》除介绍造像外,并有寺宇布局的简单记载。可贵的是《北平旅行指南》所留旧影,尚可辨认横披直椽,可知造像供奉殿内。石佛迁出,并建尖顶石亭保存则是民国二十四年以后之事了。

关于各记载所记年代有不同的差异,今据造像铭记拓片(见图二)就所识录出前三行,以资证明。

太和廿三年三月十五日比丘^僧

阎惠端为皇帝与太皇太后□□

母比丘僧阎道惠造像人阎□

自第四行起均为造像人阎□造像人阎□□……

铭记拓片“廿三年”是清楚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即认作是廿三年。但却未认出“皇帝与太皇太后”字样,并将母、比合而为一,认成毗字。只因未辨认出第一行的比丘二字,致有此误。



图二 铭刻拓片

《光绪顺天府志》只认出太皇太后，而将皇帝二字忽略。并考证太皇太后死于十四年，而造像为十三年，正是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之时。《光绪顺天府志·金石略》和《八琼室金石补正》成书时间差不多。二书编撰者所见拓片也应是同一时期之物。却得出两个不同年代，恐怕是《顺天府志·金石略》编撰者认为铭刻若是廿三年，太皇太后已死九年，不会有人为之造像，应以生前为是，生前正是“二圣”并列时期。为圆其说，乃认作是十三年。

但是，今日所见拓片并验证原石，应以“廿三年”为确。《顺天府志》的十三年自不能成立。那么此铭在太皇太后已死九年仍和在世皇帝并列为之造像，似与理不合；再者北朝若为死者造像，题记多加“亡”字，如为亡父母、亡夫、亡兄等。而此铭则无。纰漏焦点也即在此；铭文当以假的成分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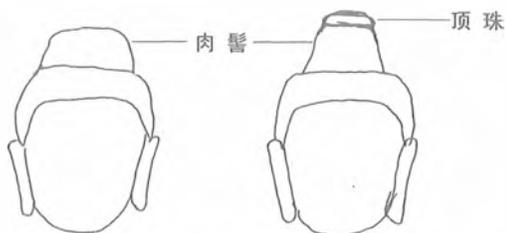
应予提出的，史树青同志在《北魏幽州光林寺考》（历史博物馆刊 1984 年 6 期）一文中即曾怀疑北魏太和造像的真伪问题。他言：“造像题记真伪问题，需进一步研究。问题的提出是京郊所存如此巨大石雕造像，何以未见前人著录？偏于光绪间为张翼访得。车儿营是进妙峰山通道北路必经之地，如果造像在此，必然为众人所知。张翼字燕谋，通县人，家资殷富，收集金石书画，不惜重金。是否有人对他蒙骗，而有意作伪？尤其造像题记中有‘毗邱’二字，其

中邱家显系清代雍正二年以后为避孔子讳，丘家改写作邱，故疑造像题记为清代雍正以后所伪刻。”

史氏对造像真伪有所怀疑，但所提论据不足。前文已提到，佛像于光绪二年已见于记载，排除了是为通州张翼访得和受蒙骗的问题。关于毗邱二字，是《八琼室金石补正》误认，前亦言及，史氏恰是只根据《八琼室》所载，未见到原石与拓片，误认原刻石即“邱”。陆增祥卒于光绪八年，验其一生，均在清世，避丘字讳，写作邱，理所当然。因而，其稿本《八琼室金石补正》丘皆作邱。付梓后仍保存原貌，并未改正。史氏据此一点，恰是受其误导，因此证据不能成立。但史氏是对造像提出怀疑的第一人。

二、佛像造型的几处疑点

佛教之传入中国，与之伴生的佛教艺术亦随之而入。佛像造型的制作材料多种多样，其中以石质造型，占有很大比例。以石为主的，以石窟寺为大宗，其次为单体造像。北京的北魏太和造像即属单体石造像中的身光式造型。身光是佛、菩萨身所发的光明，也有称背光的。此种造型在北朝非常普遍。此造像虽然外形属此类模式，但其细部又有明显差异。令人置疑也就在此。



图三



图四

北朝时期乃至唐代，身光式造像，尤其是站像，身光外缘顶端呈尖形，若平放似小舟。北朝晚期至唐身光或有半圆状，但多是坐像。而此造像为站像，顶端呈半圆，较为罕见。此为疑点一也。

其二，北朝时期造像的发髻，以云岗、龙门等石窟图录和一些散见图像为例，顶部多有肉髻，肉髻扁平若覆钵(图三)；早期发髻素平，云岗很普遍，稍晚发髻雕出纹路，若曲波状，若旋涡状。至唐代尤为普遍，此期也有螺纹状发髻，发纹粗犷，为数很少。此造像是螺纹发髻，螺如连珠，顶附肉髻瘦高，显得纤细(图四)，不如云岗、龙门的造像螺纹粗状，差异较大。明显的区别，还在于发髻顶端显现了顶珠，或称顶严。顶珠，据《佛学辞典》云，“佛之肉髻圆如珠之相也。”“顶珠，佛顶珠也，即世尊顶圆

如珠。”言肉髻即顶珠，今此像肉发髻之端又突出半圆如珠(图三)，以其不同于肉髻，姑以顶珠称之。髻上出珠磨光半圆形的顶珠，应是时代较晚的产物，自宋、元始见，明、清两代有顶珠之佛像则非常普遍。而此以北魏太和造像出现的顶珠，是很大的疑点。

更大的疑点，莫过于身光内之头光顶部坐中的金翅鸟(图四)。金翅鸟梵音迦楼罗，又译妙翅鸟，为天龙八部之一。北魏时期，无论云岗或是龙门鸟的形状雕于佛龕外侧，或立于屋脊正中，尚未见雕于佛头光顶部正中的。北朝时佛身光顶部多以佛坐中，至隋唐仍时有所见。此造像以金翅鸟展翅于佛头光之上，鸟且化成人形，头戴宝冠，隆胸凸腹，两臂附羽如翅向外伸张。如此模样的金翅鸟北京倒有所见。如居庸关元代云台和五塔寺的明初金刚座，俱雕于券脸顶部正中。和此造像头光中的金翅鸟非常近似，应属同一类型。但时代却相差很远。因此造像年代，不能不令人怀疑。

以上所提三点怀疑，如第一点佛身光顶部呈半圆形，虽属罕见，但并非绝无仅有而不足为凭的话，后两个疑点，发髻顶珠的出现，人形金翅鸟的出现，则是较晚时代的特征，是断代不容忽视的证据。今此佛像三点兼具，另外还有佛身光内所雕小坐佛的尖形发髻，伎乐的尖形发髻和衣饰均有可疑之处，但因涂有彩色，难以细辨，此不论及。笔者对佛教艺术源流知之甚少，难以确定造像的大致年代。若大胆假设，只从变形的金翅鸟来看，是否蒙古佛教受密宗的影响，蒙古统治中国北方后此类造型，影响了北京地区的佛教艺术。若如此，此造像可能是元代初年雕制的。

总之，无论是造像的造型和铭刻题记，均有疑可稽，因而怀疑它是元代早期造像，题记自属伪刻。但是，无论此造像是何年代的遗物，以其造型艺术，它也是北京地区的瑰宝。以上看法是否妥当，尚希识者不吝指正。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退休干部)

云居寺



房山石经与云居寺

杨亦武

一、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 75 公里的房山区白带山麓,是我国北方著名的佛教圣地。寺东北 1 公里处有石经山,又称小西天,山上有九个藏经洞,寺内南塔地基侧有一个藏经地穴,共藏有石刻佛教经籍 1122 部 3572 卷,石刻经版 14278 石。这部浩瀚的石刻佛教经籍世称房山石经,或称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的雕刻始于隋大业,历唐辽金元,至明末而止,长达一千余年,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黄炳章先生在《房山云居寺石经》^①一文中指出:“像这样大规模的刊刻石经,历时这样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堪与闻名寰宇的敦煌石窟相媲美,是世上稀有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隋唐时期的石经刊刻

静琬刻经在隋大业至唐贞观的一段时间,他原计划刊刻 12 部佛经,这 12 部佛经的具体名目,由于缺乏记载,已不得而知。《华严经》是他最初刊刻的一部,现藏于石经山雷音洞左之第八洞。其早期刻经如《法华经》、《胜鬘经》等则嵌于雷音洞内的石壁上。可以确认的静琬所刻石经主要有:《法华经》、《华严经》(晋译)、《涅槃经》、《维摩经》、《胜鬘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寿经》、《弥勒上生经》^②等。

静琬于唐贞观十三年(639)迁化,他所开创的刻经事业由其门徒玄导、僧仪、惠暹、玄法代代继承下来。辽赵遵仁《续铸成四大部经记》:静琬“以唐贞观十三年奄化归真,门人导公继焉;导公没,有仪公继焉;仪公没,有暹公继焉;暹公没,有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不绝其志。”

玄导是静琬刻经事业的直接继承者。承静琬遗训,玄导首先续刻了《大品般若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思益梵天所问



唐贞观八年静琬刻经题记

经》、《佛地经》等四部。唐总章二年(669)玄导题记残碑载其事：“玄导……夙厕缙林……先师遗训，于此山峰□□□、楞伽、思益、佛地四部律……”

玄导所刻石经还有：《胜天王般若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僧羯磨经》、《比丘尼羯磨经》、《佛说四分戒本》、《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四分大尼戒本》、《菩萨受戒法羯磨文》等。玄导时期所刻石经尚有：显庆六年(661)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麟德二年(665)刻《四分戒本》、咸亨二年(671)刻《佛说造立形象福报经》等。此外，玄奘译《说无垢称经》、《解深密经》，虽无题记佐证，但其字迹与玄导所刻诸经极为类似，有可能也是玄导时所刻。

玄导的继承人是僧仪。僧仪的事迹尚待考证，他所处的时代大约是在武周时期。这一时期未见大部头佛经，所刻石经主要有：垂拱元年(685)庞德相造《金刚经》，天授三年(692)刘行举造《佛说当来变经》、《施食获五福报经》，长寿三年(694)沙门正智造《弥勒下生成佛经》、张任德造《观弥勒上生兜率经》，长安四年(704)汤怀玉造《金刚经》、《普门品》。此外还有宋小儿造的《金刚经》碑等。

僧仪以后主持刻经的是惠暹和玄法，这一时期在盛唐开元天宝间，为房山石经的全盛时期。惠暹和玄法的刻经事业，得到了唐玄宗和玄宗第八妹金仙长公主的大力支持。经金仙长公主奏请，玄宗御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作为刻经底本，命长安崇

福寺沙门——著名的《开元释教录》著者智升负责运送，又御赐大片田园山林作为刻经经费。唐王守泰《山顶石浮图后记》：“大唐开元十八年，金仙长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又奏，范阳县东南五十里，赵襄子淀中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东接房南岭，南逼他山，西止白带山，北限大山分水岭，并永充供给山门所用，又委禅师玄法，岁岁通转一切经，上延宝历，永福慈王，下引怀生，同攀觉树。”

惠暹和玄法刻经时，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藏经已满，于是又在雷音洞下开凿二洞(堂)，现称为第一洞、第二洞。《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载其事：“初此堂之经营也，绵乎十纪，作者三人，刻贯花之言，日不暇给。……有上座暹公者，……乃购垂石，执坚钢，□峭岫，填深障，……于旧堂之下，更造新堂两口，其始皆削青壁，不蹇不崩，……岁寻址聿云暮者五之。……有静流、玄法二上座，非暹公之徒欤？……克纂前修，咸熙至愿。”

惠暹和玄法时期所刻石经均藏于他们所开凿的二洞也就是两口“新堂”内。属于惠暹和玄法时期所刻石经主要有：开元十年(722)幽州良乡县仇二娘造《药师经》一卷，开元十一年(723)幽州总管梁戡刻《佛说恒水流树经》、《佛说摩达国王经》。惠暹于开元初至开元十七年(729)，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刻了大部头的《正法念处经》七十卷，开元二十九年(741)又刻成了《大方



石经山藏经洞

等大集经》三十卷。玄法时期于开元末开始刻造玄奘所译长达六百余卷的巨部佛经《大般若经》，天宝十三年(753)刻至163卷。此经刻石1512条，是房山石经中最多的一部，延至辽代才告完成。此外，开元末刻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以及现在于第一洞、第二洞的《大集经日藏分》和《大集往月藏分》，从字迹上看也都是玄法时期刻造。

天宝末年，经安史之乱，房山石经的刻造并未停止。现在的《大般若经》第一百九十五卷至二百一十四卷的题记中有安禄山的“圣武”、史思明的“顺天”、史朝义的“显圣”、朱泚的“应天”等年号，足以为证。

贞元至元和间(785—820)，为云居寺住持律僧真性主持刻经时期。这一时期，云居寺刻经事业得到了幽州地方势力，特别是幽州节度使刘济的施助。刘济刻了《法华经》一部，值得一提的是，刘济自贞元五年(789)至元和四年(809)，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续刻了《大般若经》300卷前后至412卷中的一百余卷(其中有一些别人捐助所刻)。刘济于元和四年(809)亲撰《涿鹿山石经堂记》记其事。终唐之际这部《大般若经》续刻至第520卷左右。

唐武宗废佛，云居寺也一度遭到打击而衰落，但很快又复兴起来。自大和元年

(827)至咸通四年(863)的三十余年间，在幽州地方长官杨志诚、史再荣、杨志荣、史元忠、史元宽、张允伸、张允皋等及其亲属的施助下，先后刻造石经百余卷。但是这些石经大部分为小部头佛经，而且许多是重复的，可见他们刻经并无计划，只是为了供养祈福而已。不过这些石经大部分都有年代题记，经碑上下还刻着佛像供养人，为我们研究唐代石刻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唐末，房山刻经事业逐渐衰落下来，五代时期因战乱而

废。

辽代刻经

辽会同三年五代晋天福三年(938)，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云居寺所在的幽州地区归辽人统治。辽人人主幽州后，自五代以来幽州地区的战乱局面并未因此而改变。相反，幽州地区却成了中原政权与辽人争夺之域，幽州地区干戈屡兴。应历间，辽人在云居寺曾做了一些建寺护经的努力，但终究未能恢复自五代以来中断的房山刻经事业。直到“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两国化干戈为玉帛，长期和平相处，幽州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辽人才有条件在云居寺恢复刻经。辽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天庆八年(1118)释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载了辽代刻经的经过。

圣宗太平七年(1027)涿州刺史韩绍芳于从政之暇前往白带山游览，他见到贮藏于石室中的石经，向云居寺内的僧人询问石经刊刻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已没人能讲得清了，韩绍芳命寺僧打开石室清点经目，又从古记中得知刻经始末，了解到自唐代结束至今未能续造，乃奏请圣宗皇帝恢复刻经，同时云居寺住持留公法师亦上奏

圣宗,要求恢复石经刊刻,于是圣宗赐普度坛利钱作为刻经经费,又委派瑜伽大师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辽代大规模刻经开始了。《大般若经》卷三十六、六十八、七十三、一百四十七、二百二十三、二百三十八、二百五十四、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七、四百八十六诸卷之经末均刻有“大辽太平七年岁次丁卯重修此经”的题记,可见刻经伊始韩绍芳首先补刻了《大般若经》中上述残损的十卷经,接着又开始从五百二十一卷刻起,续刻最后的八十卷。

兴宗继位以后,再度给予刻经事业大力支持。兴宗考虑到刻经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费用巨大,单靠社会捐助难以维持,便于重熙七年(1038)赐御府钱作为刻经基金,委派官吏贮存起来,岁析轻利,供书经镌碑之用,并以涿州刺史刘湘提点镌修。刘湘承袭韩绍芳续刻《大般若经》,重熙十年(1041)九月刻至第六〇〇卷,连同韩绍芳所刻,计经碑 240 条,最终完成全部《大般若经》。之后便开始镌刻《大宝积经》,至清宁三年(1057)刻完全部《大宝积经》120 卷,计经碑 360 条。至此完成了所谓的四大部经数。

兴宗所设刻经基金,至道宗时似渐耗尽。释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相国杨遵勳、梁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据《辽史》卷一百五·列传三十五·能吏·杨遵勳传,杨遵勳于大康初拜南府宰相,后改北府宰相,大安中暴卒。那么,道宗赐钱刻经当在大康(1075—1084)年间。

自大安以后,刻经事业由通理大师和其门人继承下来。

通理是道宗时高僧,他到涿州讲经,游白带山,宿于云居寺中,“慨石经未圆,有续造之念。”大安九年(1098)正月,通理在云居寺开放戒坛,以筹集刻经经费,至暮春而止,共获施助钱万余缗,付门人通慧圆照大师善定,校刊刻经。通理师徒对刻经进行了改革,经石由大板改为小板,由大字改为小字,并借鉴了印板的优点,由单面刻经改

为两面刻经,这样一块经石能刻两页纸经,从而提高了工效,节省了费用。大安十年(1099),募得的钱用完了,通理师徒的刻经告一段落。通理师徒共刻佛经 62 部,431 卷,经碑 8080 片。

通理时代所刻佛经与前代有所不同,以前所刻多为大乘的经,通理所刻多为律和大乘论。如《大智度论》一百卷,《十地经论》十二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阿毘达磨集论》七卷,《成唯识论》十卷,《大乘起信论》一卷,《摩诃衍论》十卷等,由是补前人所刻之缺,使大乘经、律、论三藏完备。这是通理对房山石经的一大贡献。

辽代早期刻经均藏于石经山藏经洞内,由于石经山各洞已满,通理师徒所刻四千余片经碑和道宗刻经碑 180 片,暂置山下。

通理讳恒策,字开玄,姓王氏,西京道奉圣州樊山县新安镇(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堡镇)人,道宗时期禅宗代表人物,在朝野享有极高的声望。他自幼出家于宝峰寺,礼崇谨为师,七岁得度,二十三岁时(咸雍六年[1071])以颇高的资质和声望为禅宗高僧看中,入禅宗,成为禅宗嫡传。道宗母亲宗天皇太后以及道宗本人对通理都非常器重,特赐紫袍。续刻房山石经是在通理四十五、四十六岁时。完成刻经,通理来到房山西北山区的大安山延福寺莲花峪结庵而居,后为道宗皇帝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又加检校司空,通理坚辞不受,到永泰寺开坛讲经,辽五京僧侣闻风而至。通理一生共度菩萨戒弟子 150 余万,剃度门徒 48 人。皇储以下及百官等 80 余人、公主国妃以下 50 余人礼通理为师。寿昌四年(1098)二月十三日入灭,年五十。^③

通理大师故世后,其弟子善锐、善定“念先人遗风不能扇,经碑未藏或有残坏”,于天庆七年(1117)在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通理、道宗所刻经碑瘞藏于内,天庆八年(1118)在地穴上建石塔一座,此即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世称“压经塔”。

通理之后,辽代刻经事业并未停止。通理弟子善伏,从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开始续造,一直到保大元年(1121)。其间得到辽“故守太保令公陈国别胥”的施助,共刻佛经十三帙,一百余卷,辽代所刻最后一部佛经为《虚空菩萨求闻持法》。

金元两代刻经

金代是继辽以后的,房山石经又一重要时期。金代石经刊刻始于太宗天会年间,历熙宗、海陵、世宗,至章宗明昌以后而止。金代刻经虽未见得到皇帝的直接支持,却也得到皇族权要、地方官员、僧俗两界的广泛支持和参与。

金代刻经始于天会十年(1132),涿州知州张玄徽首刻《佛印三昧经》,山西奉圣州(今河北省涿鹿县)保安寺沙门玄英和俗弟子史君庆所撰《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的二十七帙石经中,其中“覆”字以下十三帙,至“景”字的前一部分所刻石经,均为辽刻,“景”字的后一部分及自“行”至“八”后十四帙,则为金天会十年(1132)至天眷三年(1140)涿州知州张玄徽、刘庆余和保安寺沙门玄英及其俗弟子史君庆等募刻。可见金代的刻经是继续辽代的经帙而进行的。

金天眷三年(1140)以后,自皇统元年(1141)至九年(1149)间,刘庆余,玄英及史君庆等还继续刻了自“刻”字至“多”字,共39帙。其中“刻”字至“说”字31帙,是当时宋朝新译佛经,计有《大乘庄严宝王经》等183部,295卷。宋朝建立后曾派内官张从信至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经,世称《开宝藏》。《开宝藏》刊成后的太平兴国(976—984)初年,宋设立译经院,由著名佛经译家天息灾、法天、施护等逐年译出新经,所译多为密教典籍。金刘庆余、玄英及史君庆等于皇统年间所刻的便是宋朝新译的密教典籍,它和《高丽藏》入藏的自“杜”字至“穀”字30帙的经目完全相同。因此,是研究宋朝所译密教典籍,以及把宋朝新译经与《高丽藏》、《契丹藏》入藏内容作比较的

重要材料。

在天会至天眷间(1123—1140),燕京圆福寺沙门见嵩还曾刻石经一部。天会十四年(1136)见嵩游石经山,见山上各洞藏有隋、唐、辽历朝所刻石经,便发心造了《大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王教经》十卷,分别藏于石经山第一、二、三、四、七等五个藏经洞中,表示石经山上也有金代刻经,籍与前朝相媲美。

皇统九年(1149)以后,历正隆、大定至明昌之初,约五十年间,有刘承相夫人韩氏、张守仁、完颜永中等曾刻了自“履”至“息”及“取”“定”共二十帙。《增一阿含经》和《杂阿含经》是这一时期所刻的主要两部经,计101卷,其中完颜永中施刻74卷,刻经七百余石,数量占这两部经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可见金大定明昌之际的刻经,主要得到了完颜永中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完颜永中乃世宗庶长子、章宗伯父、大定十一年(1171)进封赵王,大定二十九(1179)年五月进封汉王,明昌二年(1191)进封并王,是金王朝的重要人物。

此外,辽译《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和辽代新撰的《一切佛菩萨名号集》等也是金代所刻。

金代刻经,只有燕京圆福寺沙门见嵩所刻《大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王教经》藏于石经山藏经洞内,其它刻经则均藏于云居寺内的地穴里。

元代未见大规模刻经。至正元年(1341)四月,高丽僧慧月到五台山朝圣,归途中路过云居寺的小西天华严堂(即雷音洞),见华严堂石户摧毁,堂内所嵌石经残损,遂发愿补刻佛经修葺华严堂。这时恰与前来云居寺的资政院使资德大夫高龙卜、匠作院使申党住相遇,慧月向此二人详陈补经修堂的心愿,二人“布施净财千余缗,命慧月施劳董工,修石户经本,不月余而俱修。”慧月共补刻了雷音洞内的五块经板,这五块经板是:雷音洞右壁《弥勒上生经》四石中的二石、《胜鬘经》四石中的一石,前壁《维摩经》三十三石中的二石。慧

月留下了“高丽国比丘等达牧书字，慧月修补经石五介。”的题记。慧月刻经事，详载于元人贾志道撰《重修华堂经本记》中。

明代刻经

明初的洪武年间，明王朝曾对云居寺和石经进行考察、保护并曾修复云居寺。但未见续造石经。

明中期宣德三年（1428），道教南北两派的代表人物，全真教的陈风便和正一教的王至玄等，仿效佛教刻造石经的意图，摹刻了道教的《玉皇经》，包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髓》、《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玉皇本行集经纂》、《无上玉皇心印经》等四部，共刻石八块，送至石经山，藏于第七洞中。

明代正式刻造石经，是在明末的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当时，吴兴沙门真程劝说在北京的南方籍官僚、居士，如葛一龙、王思任、赵琦美、冯铨、李腾芳、董其昌、黄汝亨等刻造石经，他们先集资在北京石灯庵用小石版刻好佛经，然后再送往石经山贮藏。据现存的石经查考，这一时期刻石经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部，明人于雷音洞左侧新开一洞，将这些石经藏入其中，洞额由董其昌题“宝藏”二字，此即石经山第六洞，俗称宝藏洞。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刻造事业，到此终告结束。

房山石经 中华瑰宝

房山石经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其刊刻时间之长、工程之浩大、所刻石经数量之众、佛教经籍之完备，冠绝古今。房山石经不仅是一座巨大的佛教经籍宝库，也是一座巨大的中华文化宝库。国人视房山石经为“国之瑰宝”。

房山石经是以历代的官修善本佛经作为蓝本刊刻的。隋代刻经是以官写经为蓝本，唐代刻经是以宫廷所藏新旧译经四千卷为蓝本的，辽金刻经则是以辽代官修《契

丹大藏经》为蓝本的。而这些佛经原本，经过一千多年基本无存，房山石经使隋唐以来的善本佛经保存下来，尤其是使《契丹大藏经》保存下来。

《契丹大藏经》与北宋官修《开宝藏》是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两部大藏经，这两部大藏经都早已遗失，而《契丹大藏经》却因房山石经的刊刻，以石经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为今世保留下一部最早的官修善本大藏经。

由于房山石经保存了历代善本佛经，所以对校勘存世佛经的脱误有重要价值。

房山石经还保存下其它一些久已佚失的佛教经籍。如我国唐代的密宗，极盛于开元天宝，至咸通而衰，五代时失传。辽金刻经中有唐末行琳的《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为唐代密宗传承上保存下一部可贵的文献。这部著作不仅集密教陀罗尼之大成，而且是研究唐代中印度音韵学的宝贵资料。

在房山石经中，许多经文后附有题记，这些题记是研究历代政治、经济、乃至一些风俗习惯的宝贵资料。此外，在研究历代书法艺术、雕刻艺术、文字演变上，房山石经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根据。

二、佛教圣地云居寺

北京西南房山区白带山麓的云居寺，是我国北方著名的佛教圣地。静琬开创的讫隋大业至明崇祯，长达千载的刻经事业，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历代刻造的1122部、3572卷、14278块石刻佛教大藏经就珍藏在云居寺。云居寺自建自唐贞观初，是刻经的创始人静琬为刻经的需要而建。但是，此地的佛事活动和建寺历史还要更早一些。

智泉寺与云居寺

据隋朗蔚之《隋州郡图经》记载，房山石经的创史人静琬为智泉寺僧人。智泉寺在云居寺所在的白带山，云居寺创建之前，

白带山有智泉寺。

民国溥儒《白带山志》卷三·考工：“云居寺，隋为智泉寺，以泉名也。”云居寺重开山第十三代住持纯山《白带山志序》：“白带山在涿县之西北，隋文帝建舍利塔于寰区山中，智泉寺其一也。嗣以琬公镌石经藏而知名。”据隋王劭《舍利感应记》记载，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曾于诸州高爽清净三十处，建舍利塔，分置舍利其中。纯山记中“隋文帝建舍利塔于寰区山中，智泉寺其一也。”即仁寿元年（601）文帝建塔事。以上记载表明，至少在隋代白带山已有智泉寺存在，而仁寿元年（601）隋文帝曾于白带山智泉寺奉安舍利，并于寺内建舍利塔。

隋智泉寺舍利塔曾留下两件石刻，一为《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一为《智泉寺舍利感应记》。《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六月十三日，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幽州涿县智泉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云居寺所在的白带山，隋为涿县境。上述“谨于幽州涿县智泉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的记载可作为智泉寺地址在白带山的一个佐证。

隋智泉寺舍利塔留下的两件石刻，在溥儒《白带山志》卷四·碑碣中均有载：“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未见。仁寿元年。”“智泉寺舍利感应记未见。正书。仁寿二年四月八日，王（邵）[劭]撰。”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白带“山古碑多于林木，著者二隋碑：一仁寿元年王臣暕碑，一仁寿（元）[二]年王（邵）[劭]碑。……”这里所谓“二隋碑”其实就是溥儒《白带山志》中所载的智泉寺的两件石刻，所谓“仁寿元年王臣暕碑”就是隋仁寿元年《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撰者乃文帝孙、炀帝子杨暕，而仁寿（元）[二]^①年王（邵）[劭]碑则是仁寿二年王劭所撰《智泉寺舍利感应记》。刘侗、于奕正是于明末游云居寺的，《帝京景物略》中所载是他们亲眼目睹，可见隋智泉寺舍利塔的两件石刻在明末尚存于云居寺。这两件石刻，是

智泉寺在白带山存在的历史见证。

那么，作为云居寺的前身的智泉寺又创于何时呢？《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舍利塔记》：“原此寺（指云居寺），始自北齐。”如果记载属实，那么智泉寺当创自北齐时期，也就是说云居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齐。云居寺中曾存有北朝时期的《观音像记》残石^⑤，证明白带山地区的佛教渊源确实早于隋代。从静琬与北齐高僧慧思的师承关系来看，说云居寺“始自北齐”也是情理之中的。

静琬创建云居寺

云居寺乃是智泉寺的后继。隋大业年间智泉寺僧静琬于白带山开创了石经刊刻事业，至唐贞观初，为刻经的需要，在白带山下大规模修建庙宇，这就是云居寺。

唐临《冥报记》：“苑尝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寝屋。而念木瓦难办，恐分财物，故未能起。一夜暴雨，雷电震山，明旦既晴，乃见山下的大松柏数千株，为水所飘流至道次。山东少木材，松柏尤稀，道俗惊骇，不知来处。推寻踪迹，逐自西山，崩岸倒木，漂送来此。于是远近叹服，谓为神助。苑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共助造堂宇，顷之毕成，皆如其志。”

刘济元和四年（809）《涿鹿山石经堂记》：“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其年六月，暴雨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

根据上述记载，静琬创建云居寺的年代在唐贞观五年（631）。静琬早就有建寺的打算，但是考虑到建寺会花去一部分钱财，影响刻经，所以一直未能如愿。事有凑巧，贞观五年六月，一夜大雨，引起山洪暴发，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漂至白带山下，于是静琬召来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在白带山下建起庙宇，这就是云居寺。

云居寺创建后，最终形成了云居三院：即东峪云居寺（又称东城云居寺、东云居

寺、东峪寺或东城寺),在石经山以东;西峪云居寺(又称西域云居寺、西云居寺、西峪寺或西域寺),在石经山以西,即今云居寺;中峪云居寺(又称中域云居寺、中云居寺、中峪寺或中域寺)。此外,石经山上以华严堂为中心,形成了石经寺(又称云居上寺、雷音寺)。在距云居寺不远的岩上村,还有专供刻经的磨碑寺。

唐代云居寺

在静琬第三代弟子惠暹时期,云居寺进行了创建后的第一次重修。唐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在奏请玄宗御赐云居寺经卷和田园山场的同时,还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既而玄宗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第八妹金仙公主特加崇饰,遐迹之人增之如蚁焉。有为之功,莫大于此。”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经修寺,是唐代云居寺全盛期的标致,云居寺的石经刊造事业也进入了全盛期。

唐会昌三年(843),武宗废佛,云居寺横遭劫难。当时,晚唐刻经主持人云居寺住持真性刚刚去世,他的七位弟子仲说、恒智、鉴真、惠增、志千、文展、宝定将真性遗体焚化,于寺外的杖引河左岸起塔葬之,本打算为真性立碑,找来工匠,选好了石料,未及雕刻,法难促至,寺院毁废,僧遁林岩。直到咸通八年(880),真性的神道碑才得立于其墓塔前,这时他的七位弟子中的六位已先后去世,只有宝定一人尚存。^⑥

会昌法难之后,云居寺虽得以恢复,但是其衰落之势已是不可逆转,唐末至五代的战乱,对云居寺造成极大的破坏。石经刊刻也被迫停顿下来。

辽代云居寺

辽会同三年五代晋天福三年(938),辽人入据幽州后,云居寺划入辽人版图。由于辽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云居寺开始转机,并再度兴盛起来。辽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曾记述辽应历年间云居寺

佛诞法会的盛况:“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宗,预馈供粮,号为义食。是时也,香车宝马,藻野缙川……从平地至于绝顶,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醮施者不以食会而由法会,巡礼者不以食而来而由法来,观其感于心,外于身,所燃指续灯者,所炼顶代香者,所堕岩舍命者,所积火焚躯者,道俗之间岁有数辈。”佛诞法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云居寺的兴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寺院住持僧谦讽和尚于应历十四年(964),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建设,共修建大小庙宇70余间。建库堂一座,五间六架;厨房一座,五间五架;转轮佛殿一座,五间六架;暖厅一座,五间五架;讲堂一座,五间七架;碑楼一座,五间六架;次建饭廊,二十三间四架;次建东库,四间五架;次建梵纲经廊房,八间四架;次建后屋四座。^⑦不仅唐末五代以来,“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得以修复,而且扩大了云居寺规模。这次云居寺建设工程,是云居寺自唐末五代以来由衰而盛的一个重要转折。

同年,在谦讽和尚与辽官员朝议郎行右补缺王正合力倡导下,云居寺广联僧俗,结千人邑会,千人邑乃是中国古代为寺院募捐的社会宗教组织,据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载,当年云居寺的千人邑“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千人邑的出现,反映了辽代云居寺复兴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谦讽等人结千人邑的目的,是为了“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坠于东峰”,也就是为了修寺护经,而五代以来中断了的石经刻造事业,尚无力恢复。辽人入据幽州后,幽州地区的动乱局面并没有结束,中原政权与辽人之间为争夺幽州屡兴干戈,由于缺乏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云居寺刻经事业一直未能恢复,直到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幽州地区社会稳定,经

济繁荣,辽人才得以在云居寺恢复石经刊刻。

辽人恢复云居寺刻经,在澶渊之盟以后的第二十个年头,即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如果说应历十四年(964)谦讽和尚大规模的云居寺建设,是云居寺自唐末五代以来由衰而盛的一个重要转折,那么恢复刻经,则成为云居寺自唐代以来佛教事业达到又一个巅峰的标致。

有辽一代,云居寺一直呈盛势。道宗重熙年间,郡守侍中刘六符与寺僧可信、藏俊、智通、文密等又开始了大规模的云居寺建设,屡年兴工,直至大安八年^⑧。云居寺原有南、北二塔,即是辽重熙至大安间所建。

北塔具体建造年代失考,据乾统十年(1110)行鲜《大辽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记载,北塔为寺僧文密化钱三万余缗而建,文密为重熙间寺僧,那么北塔当建于重熙年间(1032—1055),辽乾统年间(1101—1110)有高文用等人发起成立的云居寺供塔灯邑,每年上元节邑众按定例捐资,在北塔上下广设灯烛,三夜不息。“从昔至今,殆无缺焉。”^⑨可见到乾统十年(1110),供塔灯邑的上元节北塔燃灯已盛行多年。

云居寺南塔建于天庆七年(1117)四月十五日,为寺僧绍坦所建,塔一十三层,高六十余尺,内藏舍利三百余粒。《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舍利塔记》记载了建塔事并云居寺的状况:当时,云居寺“当寺具戒比丘常不灭五百,庄园典库供瞻有余。”而辽亡国四年以前的保大元年(1121),云居寺尚刻完一部《虚空菩萨求闻持法》经。上述史实反映了辽末云居寺的昌隆。

金元时期的云居寺

金代,云居寺似未因朝代的更替而衰落。早在金初的天会年间,金人便开始继辽人的经帙续刻石经,此后刻经事业从未间断,直至明昌年间。金中叶的世宗大定年间,云居寺进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

大定二十年(1180)义谦法师继任云居寺住持,云居寺改律为禅,这是云居寺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义谦并对云居寺进行了修复建设,“重建廊宇,别建僧庵,西序东厨,焕然顶新”,辽应年间结千人邑,而此时,云居寺“经邑门徒,众仅数千。供给斋粮,未曾有缺,香厨饮膳丰余。”不亚于应历时。当时,长乡城(今房山区良乡城)义井院、李河(今房山区琉璃河镇)灵岩寺以及岐阳(或即今房山区吉羊村)开化寺皆请云居寺主义谦为提控宗主,由此可见云居寺的影响之大。义谦,世居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俗姓颜,金太宗天会二年(1128)生,自幼于云居寺出家,历太宗、熙宗、海陵、世宗、章宗五帝,章宗承安五年(1200)卒于云居寺住持任上。^⑩十五年后的贞佑三年(1215),蒙古大军攻破中都(今北京),云居寺所在的幽州地区沦为蒙古人统治。因此义谦可以说是金代云居寺一位全始终的僧人。他在云居寺的僧侣生涯是有金一代云居寺状况的写照。

大元一统后,云居寺得到元统治者的重视。延佑二年(1315),元仁宗降旨,在涿州举行盛大地佛教法会,朝廷官员明里董阿奉旨前往涿州代仁宗进香,闻房山白带山藏有石经,顺便到云居寺视察,回京后奏请元仁宗赐经律论一大藏,藏于云居寺内,时归源任云居寺住持。

至正元年(1341)四月,高丽(今朝鲜)僧人慧月,修葺了石经山华严堂,并补刻了堂内残损的五块经版。这是元代惟一的一次刻经,可见慧月的刻经弥补了元代云居寺刻经的空白。慧月是一位高丽僧人,作为外国僧侣参与云居寺修寺刻经,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慧月此举为本来较为平淡的元代云居寺史增添了生动的一笔。元末的文宗、宁宗之际,云居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复建设,这次工程到宁宗至顺元年(1332)结束。

明代云居寺

明立国之初的洪武二十一年(1388),

明太祖朱元璋特派名僧道衍(姚广孝)到云居寺视察。是年正月二十一日,道衍到达云居寺。道衍为隋僧静琬开创的刻经事业所感,题《石经山诗》并序,镌于华严堂之石壁上。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人对云居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修复。正统九年(1444),明人再次对云居寺进行了较大规模修复。

明永乐年间,云居寺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中天竺(印度)僧人桑渴巴辣曾修复东峪云居寺(时称东峪观音寺),成为该寺重开山。^①当年,桑渴巴辣在钦差镇守涿州等处指挥同知驃骑将军石端等人的支持下,“修造正殿山门,庄严诸相,皆完之道场”。

桑渴巴辣自幼出家,遍游五天竺。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桑渴巴辣与葛哩麻等率领诸国使臣向明廷进贡方物,来到中国,在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接见,桑渴巴辣一行没有回国,从此在中国传教。永乐帝命其居南京西天寺,给光禄饮饌,并允其随方传教,自在修行,后封为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十一年后,桑渴巴辣奉诏来到北京,居崇恩寺,不久奉旨于内府经厂教授官员们学梵语,多有内外大臣投其手下,削发为僧者。正统元年(1436)修崇恩寺,四年(1439)其徒乌答麻任该寺住持,同年赴五台山重修法藏寺,九年(1444)蒙赐建普慈寺,其徒麻啰乞塔任住持,十一年(1446)功毕回京,卒于定州上生寺,追封大通法王光无隐大上师。死后,起塔两处葬之,一处在京城一带的西竺之西北隅,一处便在东峪云居寺附近的白云陀金香炉山清峰岭上。是时,其徒哩提干资罗任东峪云居寺住持,成化三年(1467)四月八日,哩提干资罗等为桑渴巴辣立《小西天东峪观音寺重开山碑》于寺内。

桑渴巴辣是继摩腾、达摩等人之后又一位来自佛教本土高僧,当时明都北京、陪都南京包括云居寺在内的一些重要寺院多为其天竺弟子住持。桑渴巴辣传播的是秘

密大乘佛教,他不远万里来中国传经布道,是佛教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云居寺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永乐年间桑渴巴辣重修东峪寺后到成化年间,东峪寺及西峪寺都是由他的梵僧弟子住持。成化年间的东峪寺住持哩提干资罗、西峪寺住持唵嗒唵哩当是永乐初与他一起来中国的梵僧弟子。^②这段寺史很值得研究。

明中叶以后,云居寺逐渐衰落,所谓“珠林鞠为草莽,金碧化为泥涂”,当时云居寺的香树庵以及静琬以下百余座历代高僧骨塔均被寺僧卖与巨室^③。

万历十五年(1587),云居寺住持擅达竟然掘开压经塔地穴,盗卖石经以渔利。事情发生后,很快被明廷发现查办,明廷责成房山县典吏督工,将盗掘地穴即时用砖石封砌,并明文刻石禁止。^④有史以来,云居寺石经失盗极为罕见,住持僧人盗卖石经更是闻所未闻。擅达盗卖石经事件,反映了当时云居寺的衰落和寺风的沦丧。

万历二十年(1592),达观真可法师至石经山雷音洞参礼,开启了明末云居寺复兴契机。

是年四月十二日,达观真可自五台山至京西潭柘寺,路过云居寺,至雷音洞参礼,见雷音洞像设拥蔽,石经薄蚀,因命东云居寺住持明亮酌情整救,翌日在雷音洞内的拜石下发现隋大业十二(616)年四月八日安放的三颗佛舍利。六月,佛舍利被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迎入慈宁宫供养。八月二十日,又放归雷音洞原处安置。^⑤

不久,在达观真可的主持下,修缮了云居寺上寺的雷音殿,继以慈圣太后的供养金并得到法灯等人的资助,从巨室手中赎回了静琬以下百余座历代高僧的骨塔,从郭某处赎回香树庵,为香树庵购置下庄一所,计地五百亩。^⑥达观真可认为,云居寺之所以衰落,根源在于寺僧“性戒不明,事戒不持”,于是诸事办妥后,达观真可将东西云居寺住持、执事僧召集到一起,严加训示,从申戒律,再剥清规。其训示内容存于

他自己撰写的《示东西云居寺僧众》一文。达观真可的介入,对明末的云居寺而言,确曾起到振衰起颓的作用。

明代云居寺刻经较晚,始于万历末,历天启,至崇祯年间而止。当时,北京的一些南方籍官员、居士集资刊刻《华严经》等佛经十余部,于石经山另辟一洞藏之。明代刻经规模虽然不大,其价值也无法与前代相比,但是却为房山石经的刊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此房山刻经宣告结束。

清代云居寺

清代,云居寺改临济正宗脉脉相传,康、雍、乾三世空前鼎盛,至嘉、道、咸以至于清末,未见衰落。

清母配坤《小西天石经寺碑》称:云居寺“历明而清,兵燹之余,复见剥落,香灯杳然。”可见,明末清初的战火对云居寺造成一定破坏。是时,老僧如全适任住持,与弟子性广募化筹资,于顺治三年(1646)重修接待庵三间,六年(1649)重修伽蓝祖师殿四楹。十三年(1656)左右,再修石经山上寺雷音殿抱檐三间。如全本打算继续修禅堂等项,但力不从心未能如愿。^{①7}

康熙四年(1665)正月二十四日,东峪寺住持性林目睹本寺日见摧颓,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募化集资,重修东峪寺。康熙六年(1667)九月十七日工竣,殿宇、禅堂、山门、垣寮,色色改观。^{①8}

在东峪寺动工稍后,西峪寺北的香树庵也开始修复。

香树庵自明万历被达观真可赎回后,香火再燃。不料,传到庵僧石璧的手里,又遭恶运,此僧私自把香树庵下庄五百亩香火地盗卖,弃庵而逃。香树庵无主,遂寄与涿州城北的胡良村延寿寺托管,至清康熙初,香树庵已沦为瓦砾。康熙四年(1665)春,延寿寺主含公动工修复香树庵,不久建成北禅房五间。翌年春,工程再继。香树庵修复工程一直持续数年,佛殿、僧房、山门、墙垣,靡不具备。此庵修复后,由纯白大师住持。纯白,中州唐县(今河南唐县)

人,俗姓李,披剃于少室山。纯白住持后,又开垦水田二十亩,种果树千余株。^{①9}

清初顺治康熙间如全、性林、含公等人对云居诸寺的个别修复工程,虽规模影响不大,也未能根本扭转云居寺衰颓局面,但是却开了云居寺大规模修复建设的先河,而此开启云居寺又一个辉煌时代的,则是溟波大师。此人在云居寺历史上被称为中兴之祖、重开山第一代。

云居寺自顺治年间老僧如全稍稍修治之后,到康熙十一年(1672)所谓“颓者益颓,而残者日就剥落”。是年云居寺住持溟波大师开始对云居寺进行全面修复建设,西域寺、东城寺、梦堂庵、云居寺双塔、戒坛,以及石经山藏经洞、曝经台一应建筑,或翻新、或修补、或重建。据载在溟波的主持下,云居寺共修复建设殿宇、禅堂、寮房、厨库二百余间,这在云居寺历史上是规模空前。又造八大菩萨、十二药叉大将、二十四诸天,并遵云居寺刻经故事,刻造经碑两方:一方刻《金刚经》,一方刻《药王经》。

溟波,俗姓郭,讳超古,字溟波,河北武清人。传临济下宗第三十三世。七岁投本邑天仙庙智庵为师,顺治十年(1653)于北京愍忠寺受具足戒,后住持房山云居寺。自溟波始,云居寺佛教改临济宗。遇康熙皇帝,赐白金三十两。托钵行化,至磐山,康熙皇帝亲临问候。溟波是清康熙年间著名高僧,蜚声遐迩,法迹远播,王公大臣、皇亲显贵多与之交,康熙三十一年(1692)圆寂。^{②0}

溟波圆寂后,云居寺修复工程尚未完工,其弟子圆通继任云居寺住持,是为云居寺第二代,传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世。圆通继承乃师遗志,继续云居寺修复,康熙三十七年(1698)终于告竣。

圆通,河北雄县人,俗姓高,讳明广,字圆通。早年于河北固安白沟河观音庵出家,结识溟波大师,受戒愍忠寺,后归云居寺溟波门下。在云居寺,他苦参佛理,颇有造诣,康熙十二年(1673),也就是溟波动工大规模修复云居寺的翌年,圆通离开云居

寺,开始了他的云游生涯,前后三年的时间里,他上五台,渡黄河,访少林,登首阳,逾岳麓,礼香岩,迂回数千里,经历诸祖廷,味道餐风,道乃大进。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了其云游生活,回到云居寺,充首座三年,“住慈愍者十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冬,溟波大师示寂,圆通奉遗命住持云居寺。圆通是继溟波之后的又一位高僧。《西域寺圆通广禅师塔铭》称:“上自王公大夫,靡不虚往实归,久而加敬;下至负贩之细人,骄悍之俗子,钦奉欢喜,从无间言。”足见他在当时的影响之大。雍正七年(1729)正月十二日,圆通示寂于云居本寺。^②

溟波、圆通两代住持开辟了云居寺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云居寺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他们对云居寺的全面修复,一改云居寺自明末清初以来衰颓败落的局面,再塑了云居寺作为佛教圣地的庄严,此时的云居寺,虽然不再有刻经盛事,但是却成了参佛论道之所。溟波著有《溟波禅师语录》,圆通著有《圆通禅师语录》。在清康、雍间,溟波和圆通成为闻名朝野的高僧,云居寺成为人心归往的所在。

圆通之后,了尘任云居寺住持。是为云居寺第三代,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五世。

了尘,河北河间县人,姓赵氏,于双塔村兴隆寺出家,礼本宗师。康熙四十五年(1706)春,始赴云居寺,求具自圆相戒。之后,参随圆通二十余载,雍正七年(1729)任云居寺住持,乾隆十年(1745)三月二十日示寂。了尘也是一代有作为的主持,清雍、乾间,住持云居寺凡十六载,移大悲坛,修两壁僧寮,建藏经阁,比丘坛、客堂、回廊及后层殿刹,或修之或建之,皆辉煌倍昔。^③

在了尘住持云居寺期间,香树庵住持法智曾于乾隆二年(1737)修复香树庵;^④东峪寺住持普兴曾修葺东峪寺,历时三载,于乾隆十年(1745)前竣工。^⑤

此后,云居寺未经大的修复。道光八年(1828),云居寺第七代住持福渊俗家弟子真善捐资重修大悲坛。道光九年

(1829),真善捐资重修千佛殿。^⑥是值云居寺第八代明文住持云居寺。

道光十五年(1835),真善再捐资赎回沦为俗产的香树庵,山西汾阳县冀村镇(寄居永清县南关镇)张隆太出资,按香树庵原制,重建香树庵。香树庵本归属云居寺,有清一代,香树庵一向自立山门。至此,真善与张隆太再建香树庵后,将此庵作为云居寺的别院,香树庵终于回归云居寺。^⑦是值第九代广泰住持云居寺。

清代,社会各阶层向云居寺捐赠田产、财物蔚然成风。清统治者时常向云居寺赏赠财物或田产。如:康熙皇帝曾赏赐重开山第一代溟波大师白金,^⑧嘉庆皇帝曾于嘉庆十四年(1809)赐云居寺稻田,^⑨末代皇帝溥仪也曾资助云居寺。^⑩民间的资助也极为广泛和普遍,文献记载了不少当年捐赠活动留下的碑刻如:《施地供众碑记》(乾隆十九年[1754]),《功德碑记》(乾隆二十八年[1763]),《施财置地斋僧功德碑》(乾隆四十五年[1780]),《云居寺施宝幡碑》(嘉庆七年[1802]),《施舍功德碑记》(同治三年[1864]),《施财功德碑》(光绪二年[1876])等。^⑪当年,结社联会,有组织的捐助活动极为普遍。乾隆年间有“麦会”,会众每年定期交出一定数量的小麦,捐集起来的小麦除供为云居寺僧众口粮外,每年还为云居寺购置若干地产。^⑫光绪九年(1883),良乡县(今房山区)任家营会曾向云居寺施缸。清末的宣统年间涿州东乡东小茌村有朝山会,^⑬该会曾于宣统三年(1911)捐助云居寺地藏阁工程。广泛的社会捐助活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云居寺佛教事业的兴旺。

云居寺兴盛势态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七·七事变后,云居寺历遭兵匪之燹,从此走向衰落。1942年,日本侵略军大肆轰炸云居寺,这座千年古刹成了断壁残垣。

云居寺的最后一任住持纯山。为云居寺第十三代,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五世。纯山目睹了云居寺衰亡,于1948年协助爱新

觉罗·溥儒撰成《白带山志》。

当代云居寺的文物保护

新中国建立以后,云居寺文物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的保护,云居寺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建设,房山石经研究也取得了突破进展,云居寺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经国务院批准,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等部门开始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的发掘整理,历时三载,于1958年而告成。

发掘整理工作是从石经山藏经洞开始的。1956年3月12日,在石经山上修建工房、工棚。石经山藏经洞分上下两层,为便于工作,研究人员按近代发掘处理办法进行编号,下层两洞自右向左编为第一洞、第二洞,上层自右向左编为第三、四、五、六、七、八、九洞,第五洞即雷音洞。4月21日,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同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先生亲临现场,首先开启第三洞,随后逐一打开各洞,将石经版搬出编号拓印,然后放归原洞封存。1957年底,石经山九洞石经的发掘整理工作圆满结束。各洞藏石经数目:第一洞,1131石。第二洞,1091石。第三洞,333石。第四洞,164石。第五洞,146石。第六洞,200石。第七洞,285石。第八洞,819石。第九洞,390石。

1957年夏,周叔迦会同北京大学考古系闫文儒教授开始对云居寺压经塔地穴进行发掘工作。当时南塔遗址已是一个土丘,杂草丛生。8月1日开始勘测,8月7日下午发现了经版,找出了地穴四至。地穴南北长1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面层以方砖铺墁,周围砌砖墙,东墙有一石门。此穴北部占全穴2/3,南部占1/3,两穴之间隔有一米宽的土墙。为保护这些出土的经版,在地穴上面搭起席棚。同时在出土前按经版排列顺序就地编号再拾出拓印。地穴北部藏石经6295片,南部藏3787片。共计10082片。1958年底,全部拓印工作圆满完成。至此,房山石经大规模发掘整理工作宣告结束。这次发掘整理工作相当

彻底,工作人员还收集拓印了散落于石经洞外和地穴外的残石400余块,全部拓印了云居寺及石经山上的碑记、经幢、题名、题记、造像、摩崖石刻等。^③

这次对房山石经的发掘整理是空前的,历史上,只有辽代的太平七年(1027)曾对石经山藏经洞的石经进行过清点,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极不彻底,云居寺压经塔地穴藏经则从未开启整理过。

房山石经不仅是研究我国佛教典籍和佛教历史的重要文物,也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艺术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文物,其巨大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早以引起中外学术界重视和研究。明清时期,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从碑刻书法的角度研究房山石经,近代一些学者开始注意于内容方面的研究。清代古籍《日下旧闻考》、民国王毓霖编纂的《房山游记汇编》等书籍,均有明清、民国时期文人学者研究、考证、介绍云居寺和房山石经的著述,溥儒所著《白带山志》则为云居寺保存下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一些外国学者也早就注意到房山石经的重大价值,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于日本昭和十年三月在《东方学报》京都第五册副刊刊载了《房山云居寺研究》专辑。

但是以往的研究往往依据古籍记载和为数不多的碑刻材料,而未能直接接触房山石经的实物资料,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

房山石经全面的发掘整理,为房山石经研究创造了充分的现实基础,从而揭开了大规模房山石经研究的序幕。

1980年,中国佛教图书馆成立,馆内设“房山石经研究小组”,专门从事房山石经研究。首先将“不知名经”辨别出来,并把近千余张残石拓片拼接起来,编出准确的目录。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房山石经编辑刊印小组委员会。北京图书馆、编辑局等部门也积极参与房山石经的研究及成果的编辑出版。一大批佛教界、文物界、史学界专家学者,投入房山石经的研究。

以房山石经发掘整理为基础,房山石

经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

《房山云居寺石经》，中国佛教协会编辑，1978年4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以拓印整理的房山石经为主要蓝本的佛教经籍浩卷《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1月至今已出版26册，全套将出版75册。《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1987年8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50万字。《房山石经之研究》，1987年9月由中国佛教协会编辑出版。影印本《房山石经》（辽金部分），中国佛教协会编印，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出版，1989年4月至今出版了23册，全套将出版35册。

房山石经的整理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云居寺文物保护的第一步。随后，国家及各级政府开始了对云居寺文物的全面保护和大规模的云居寺修复建设。1961年云居寺塔及石经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云居寺附近驻军“防化团”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通知部队保护云居寺和石经，于是部队出动武装力量，日夜坚守，使云居寺和石经免遭破坏。^⑩1979年5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来房山考察云居寺石经保护情况，目睹从压经塔地穴发掘的辽金石经在简陋的库内存放，拥挤不堪。当即指示：国家再困难，“保护文物的钱还是有的”。回京后，谷牧副总理责成北京市建委主任佟征和徐林处长拨专款15万元，建石经库房和“房山石经展室”，以妥善保护地穴出土的辽金石经。1980年7月开工，当年12月竣工，共建石经库房24间，展室9间，南北配房各3间。1981年10月，压经塔地穴辽金石经全面放入新建库房内。^⑪

1982年8月2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决定收回云居寺庙址。1983年春，北京市文物局拨款4.3万元，收回南尚乐乡水头对所占云居寺庙址49.5亩。

1984年4月19日，北京市政府决定修复云居寺，并筹备成立“云居寺修复委员

会”。1985年6月，“云居寺修复委员会”正式成立。

云居寺修复工作是1984年启动的。1984年冬，国家文物局拨款7万元修复云居寺围墙，1985年春竣工。1985年8月17日，天王殿3间、毗卢殿7间落成，投资62.2万元。1985年冬至1986年秋，修复小西天施茶亭及栏版柱子，投资1.5万元。1987年4月1日，大悲殿群19间落成，投资92万元；天王殿南北配殿10间落成，投资23万元。1987年秋，石经展馆改造、小西天修路，投资83万元。1988年7月19日，释迦殿群30间落成，投资76万元。1989年4月，弥陀殿、药师殿各5间落成。

1989年6月，投资30万元修缮云居寺北塔，年内竣工。北塔施工中，塔基上所镶200余块有“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字样的铭文佛偈砖朽坏，需要去旧换新，施工人员苦于没有替代品，工程无法进行，这时北塔东南10米处施工用的淋灰坑里的灰水，一夜之间向正北流渗而尽。水渗方向出现洼陷，长达10米，距北塔塔基不足两米。翌日，请来北京市文物局专家勘测，专家推测塔基下可能有藏有宝物的洞穴，当即决定停工挖宝，奇迹出现了，挖宝第一天，挖出了辽代建塔时埋下的佛偈砖221块，拆旧易新，恰巧用去220块，只余下一块。可想，当年建塔时便备下了未来修塔时所需砖偈，足见古人虑事慎密久远。

1993年，南路僧房、木版经房落成，北路行宫工程竣工。至此，云居寺累计投入修复资金800万元，竣工面积6160平方米，完成修复总面积的2/3，除个别附属殿宇外，主体建筑基本重建恢复。

云居寺二期工程1998年7月26日启动，总建筑面积2325.04平方米，投资总额999.7万元，1999年7月全面竣工。恢复了弥陀殿及药师殿的南北配殿、梅坛殿及弥陀殿的照门、嘉庆御碑亭、天王殿前石桥、钟鼓楼、牌楼、杜母殿、地藏殿8项寺院建筑。二期工程竣工以后，云居寺的修复

面积达到八千多平方米。云居寺这座千年古刹焕然一新。

而今,云居寺不仅恢复了佛教圣地的庄严,而且已成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佛教、石刻艺术、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旅游景区。便捷的交通、通讯,秀丽古朴的自然风光,使古老的云居寺充满现代风采和勃勃生机。

千年古刹 文物荟萃

云居寺规模宏敞,共有五进院落、六重殿宇。依次是天王殿、毗卢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弥陀殿、大悲殿。这六重殿宇随山势逐重攀升,形成了云居寺特有的寺庙建筑风格。1300多年的沧桑,使云居寺沉积了浑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除国宝石经外,云居寺还分布和珍藏着其它大量珍贵文物。

云居寺有唐塔7座、辽塔5座,明清时期的古塔若干。唐塔中著名的如金仙公主塔、开元十年塔、开元十五年塔、景云塔、太极塔。辽塔中著名的如云居寺北塔(罗汉塔)、开山琬公塔、续秘藏经塔、老虎塔等。清代的三公塔则是云居寺明清时期三座颇具代表性古塔。

静琬早期刻经地点雷音洞内,有四根雕刻佛像的石柱,共雕刻佛像1056尊,每尊佛像都刻有名号,所以这四根石柱又叫“千佛柱”。这些是隋代作品,为云居寺现存的年代最早的石刻文物。隋朝大业十二年(616),隋朝为鼓励静琬刻经曾在雷音洞内安奉3粒释迦牟尼佛舍利。1981年11月27日佛舍利在雷音洞内再次出土,只有两粒(另一粒当是在明代出土时遗失),此后曾在广济寺观瞻3天,1999年4月1日至15日又在北京雍和宫展陈。据悉,佛舍利最终将迎回云居寺。佛舍利为两千多年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遗骨,在我国存世的不多。云居寺雷音洞的释迦牟尼佛舍利,与北京八大处佛牙舍利、陕西法门寺佛指舍利并为海内三宝。

云居寺还珍藏着大量纸经和木版经。

石经、纸经、木版经世称云居寺三经,又称云居寺三绝。纸经和木版经作为明清两代的大藏经,也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它和云居寺石经相得益彰,构成云居寺藏经体系。

云居寺纸本经卷共有2.2万卷,绝大多数为明代刻本和手抄本,包括明代的《南藏》和《北藏》、单刻经卷、藏文经卷、手写经残卷。这是我国仅存的明版经卷,具有极宝贵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经初步整理统计,明《南藏》约存近3000卷,估计为永乐(1403—1424)时期的印本,在南京印刷,经文中“南京聚宝门外徐龙山印行”的题记。明《北藏》有两个版本,一为正统五年(1440)印本,现存7000余卷,这部经由两部同样的经拼凑而成,基本完整;一为万历十一年(1613)印本,现在3000余卷,乃太监卢受捐资刊印。单刻佛经4000卷左右,多为明代刻印本。藏文经卷共4种,1000余卷左右,属于最早的藏文印刷品之列。手写佛经多数为明代抄本,最早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这些抄本是珍贵的佛像文物,数量之多为国内各大名寺罕见。

木版经为清代印刷《龙藏》所用木质雕版,世称《龙藏》木版经,现存7.7块。《龙藏》又称《清藏》、《乾隆版大藏经》,由清皇室下令刊刻。其内容极为丰富,它集佛教传入中国1700多年以来佛教典籍译著之大成,包括历代流传下来的佛教经典著作和佛学研究著述共7000余卷。成为研究佛学、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乃至翻译工作的重要文献资料。经版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三年(1738)刻完。全部经版均选用上好梨木雕刻,刻工精细,字体工整劲秀,佛像及版面也刻得生动美观。

当年印刷的《龙藏》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起至“机”字止,共724字,每字一函,每函10卷,共7240卷,共雕经版79036块。此后,曾先后因故撤去一些内容,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龙藏》共有718函、1662部、7160卷、经版78238块。这套经版是我国仅存的一部大藏经版,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它不但是我国的

一宗珍贵文物,而且在世界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深受各信奉佛教国家的关心和重视。

《龙藏》经版刻成后,存放在故宫武英殿,先后印刷 103 部。后因取印不便,于乾隆后期迁入柏林寺存放,一向完好无损,1936 年再次印刷 22 部。解放后柏林寺及《龙藏》经版为北京图书馆接管,1966 年,该馆将经版从寺内迁出,存放于柏林寺山门外搭盖的临时大棚内。迁出后,原存放经版的经架挪为它用,经版被一块一块地从下向上垛放,高达三四米,经版的编号顺序也被全部打乱。由于当时仓促搬运,临时大棚搭盖简陋又不合理,从 1966 年到 1982 年长达 16 年的时间里,棚顶漏雨,雨水倒灌,致使这批珍贵的经版长期遭受雨淋、水浸、潮湿、重压、虫蛀等损害,毁坏严重。为抢救和保护这一珍贵文物,1982 年 7 月,北京市文物局接管了这些经版。不久,经版被移往智化寺存放。经统计,78238 块经版中,已有 3400 块经版彻底损坏,有的已成粉末或烂泥,还有一些经版部分残损或断为两截。

为稳妥保护这批经版,经有关部门多次研究,1989 年 11 月、1991 年 1 月 27 日,分别从智化寺和大兴古籍印刷厂运到云居寺。目前,存放在云居寺的木雕经版共计 7.7 万块,重达 400 余吨,堪称我国木版典籍之最。

房山石经保存了隋唐以来历代善本佛经以及我国最早的一部大藏经之一的《契丹大藏经》,继之以明《南藏》《北藏》、清《龙藏》构成了完整的藏经体系。云居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佛教典籍、佛教大藏经陈列馆和图书馆。

世纪之交的石经保护盛事

房山石经的保护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压经塔地穴出土的一万余块辽金石经,由于大气污染等因素,出现严重风化,几十年来,文物部门与有关专家多次探讨和论证石经的保护,彻底解决石经的风

化问题,已刻不容缓。为此,1998 年 4 月 3 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龙新民、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刘敬民等领导约请有关专家,在云居寺召开现场办公会,专门研究馆藏石经的保护问题。会议认为,把这些石经重新放归原理藏处的压经塔地穴封藏,是防止石经风化的最佳方案。石经归穴,既有利于石经的保护,又有利于石经的合理开发利用,是一个科学、合理、实用的保护措施。因此决定把石经归穴封藏,此项工程由刘敬民副市长主持。5 月 5 日,刘敬民副市长又来云居寺现场办公,检查 4 月 3 日办公会的落实情况,提出下步工作的具体意见。4 月 25 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赴云居寺实地考察,对保护石经、修复云居寺作了重要指示。5 月 31 日北京市政府邀请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云居寺文物保护和石经归藏召开研讨会。之后,进一步提出了采取地窖式,恒温、恒湿、充氮等手段,既提高石经保护质量,又可供参观的保护方案。6 月 13 日,刘敬民副市长第三次在云居寺召开现场办公会,会议决定成立“北京云居寺石经回归活动组织委员会”。

石经归藏活动启动之初就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首肯。6 月 20 日,以赵朴初先生为总顾问、刘敬民副市长为主任的“北京云居寺石经回归活动组织委员会”成立。

1999 年 9 月 9 日 9 时 9 分 9 秒,已经出土 40 年的镌刻着《契丹大藏经》的石经版,将放归到地下藏经穴珍藏。届时,赵朴初先生将在云居寺亲予主持盛大的法会,邀请海内外高僧大德及各界人士参加,以隆重的礼仪共祝石经归安。

①见中国佛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出版的《房山石经之研究》第 89 页。

②本文述及刻经的经目等细节,主要参见文物出版社《房山云居寺石经》一书(1978 年四月第一版)。

③据辽《大辽燕京西大安山 延福寺莲花峪

更改通圆通理旧庵为观音堂记并诸师实行录》(原载房山区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房山文史》第11期包世轩《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寺记碑疏证》)。

④文中()内为原文错字,〔〕内为所改正确字。

⑤民国溥儒《白带山志》卷四·碑碣·六朝:“观音像记残碑。存。……在小西天,今移文殊殿。”

⑥据唐咸通八年(867)何筹《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

⑦据辽应历十五年(965)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

⑧据金正隆五年(1160)七月李构《云居寺重修舍利塔碑》。

⑨据乾统十年(1110)行鲜《大辽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

⑩据金泰和元年(1201)《谦公法师灵塔记》。

⑪据明成化三年(1467)释道深《小西天东峪观音寺重开山碑铭》。

⑫1978年中国佛教协会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房山云居寺石经》(第八页)称唵啞嚩哩为“喇嘛僧”,当是忽略了桑谒巴辣为东峪寺重开山、以及他在中国传教的背景。考《小西天东峪观音寺重开山碑铭》,凡桑谒巴辣修复过的佛寺均由其梵僧弟子住持,如崇恩寺由其徒乌答麻住持,普慈寺由麻啰乞塔住持。

⑬明释德清《复石经山琬公塔院记》:“是时,(琬公)塔院业已为寺僧卖与巨室。”又明释可真《示东西云居寺僧众》:“命诸檀越賤琬公塔院已,賤自隋以来高僧骨塔一百余座已。”表明,琬公塔院及自隋以来一百余座高僧骨塔均曾被寺僧盗卖。

⑭据明万历十五年(1587)四月二十六日《房山县奉巡关察院明文》(见田福月编著《云居寺春秋》第66—67页)。

⑮据释德清《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

⑯据明释德清《复石经山琬公塔院记》、释可真《示东西云居寺僧众》、清母配坤《小西天石经寺碑》、周龙舒《重修石经山香树庵记》。

⑰据清母配坤《小西天石经寺碑》。

⑱据清《小西天东峪观音寺碑》。

⑲据清周龙舒《重修石经山香树庵记》。

⑳据清徐士廷《范阳郡白带山云居寺溟波和尚碑记》,释南湛《西域云居寺重开山第一代溟波古翁老人行略》,大护法功德主《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

㉑据清陈元龙《西域寺圆通广祥师塔铭》。

㉒据清宁郡王《西域大云居寺了尘福禅师塔铭》。

㉓据民国溥儒《白带山志》卷四·碑碣·清:“《重修香树庵碑》存。住持法智,房邑庠生梅子蕃撰并书。乾隆二年岁次丁巳季夏吉日立。”

㉔据清乾隆十年(1745)西林图密善《东峪寺重修天王殿碑记》。

㉕据清道光八年(1828)释通申《西域山大云居寺重修大悲坛碑记》,道光九年(1829)吕延烈《西域云居寺千佛殿碑记》。

㉖据清道光十五年(1835)释慈海《香树庵原置重修二善信碑记》。

㉗据清徐士廷《范阳郡白带山云居寺溟波和尚碑记》。

㉘据民国溥儒《白带山志》卷四·碑碣·清:“《云居寺纪赐稻田碑》存。正书。嘉庆十四年春,住持僧达焕敬立。”

㉙据田福月《云居寺春秋》——末代皇帝资助云居寺之残碑(75—76页)。

㉚据民国溥儒《白带山志》卷四·碑碣·清。

㉛据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博明《西域寺置地记》。

㉜据民国溥儒《白带山志》卷四·碑碣·清。

㉝据中国佛教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的《房山石经之研究》一书所载黄炳章《房山云居寺石经》一文。

㉞据房山区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房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所载颜景河《千古纵横话石经》。

㉟据田福月《云居寺春秋》——谷牧考察房山石经(569—571页)。

㊱据田福月《云居寺春秋》——胡耀帮视察云居寺(658—659页)。

(作者为房山区文化文物局办公室干部)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四合院平房保护区

刘季人

1990年12月,首都规划委员会公布24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街区,1999年3月22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原则通过了《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范围。两次划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都包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四合院平房保护区。

明清北京城由内外城的城墙、皇城、紫禁城和胡同四合院等组成。胡同四合院是北京旧城的象征和骄傲,是北京的一大优势和特色。

每一条胡同,每一座四合院都有可记述和回忆的历史和故事。历史事件、时代变革、人物升迁……都和四合院有关。

今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四合院平房保护区,在元、明两代属鸣玉坊,现保持当年鸣玉坊街巷格局,胡同内有保存较好的明清四合院建筑。清代为正红旗地界,清末至民国初年属内右四区,1928年后属内四区,1950年5月属第四区,1952年9月属西四区,1958年5月至今属西城区。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北临正在建设中的平安大街(原前车胡同和后车胡同),南至阜成门内大街,东至西四北大街,西止赵登禹路。现为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办事处辖界范围内。胡同为东西走向。

西四北头条 明代称驴肉胡同,因驴肉集市在而得名。1911年后雅称礼路胡同,后沿用。1965年因是西四北西侧自南往北的第一条胡同定今名。胡同长600米,宽5米。中与六合三条、姚家胡同、大兴隆胡同、西四北二条相交。西四北头条南侧为广济寺,历代帝王庙和原中央医院后墙。广济寺在阜成门内大街25号,现为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原为金代西刘村寺旧址。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重建,成化二年(1466年)赐名弘慈广济寺。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重修。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重修。民国十年(1921年)毁于火,民国十三年(1924年)重建。民国二十年(1931年)毁于火,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重建。1952年、1972年、1976年和1984年均曾修缮。广济寺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依次有山门,山门石门额中书“弘慈广济寺”、左书“毘庐性海”、右书“华藏玄门”,山门及八字影壁上书“阿弥陀佛”。旗杆、钟鼓楼、天王殿、大雄殿,大雄殿左为五观堂,右为三学堂、圆通殿、舍利阁多宝殿及配楼。东院有法器库、延寿堂;西院有云水堂、持梵律殿、戒台、净业堂。西院西侧有二进院落。现中国佛教协会在此。历代帝王庙在阜成门内大街131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明嘉靖九年(1530年)在原保安寺旧址建历代帝王庙,嘉靖十年(1531年)建成。清乾隆四年(1665年)、雍正七年(1729年)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修。自1996年开始修缮。历代帝王庙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主要建筑有屏墙,长32.40米。大门外原有石桥三座,木牌楼景德坊两座(1954年1月拆除)及下马牌。大门三间及两侧旁门各一。东有钟楼。景德门五间及两侧侧门各一。东西配殿各七间。景德崇圣殿九间,殿前有月台,左右碑亭各二。景德门外东有神库、神厨、宰牲亭;西有承祭官致斋所。建筑保持明代风格,现基本保持原建格局。中央医院旧址(今人民医院)在阜成门内大街133号。中央医院开办于1918年1月

27日,这是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规模较大的综合医院。倡议创办人是马来西亚华侨、流行病及防控鼠疫专家伍连德(1879—1960年)博士。以“谓国都之地,中外具瞻,宜有所建设,树之风声。爰就阜成门内,相度隙地,创立医院一所,名曰中央,尊首善也”,于1915年倡议,1916年奠基,1917年底建成。医院拥有一百五十张病床,伍连德任第一任院长。1946年更名中和医院,1950年定名中央人民医院,1956年改名北京人民医院,1958年更名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1985年更名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现为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第二住院部。西四北头条内6、12、27和31号是保存较好的四合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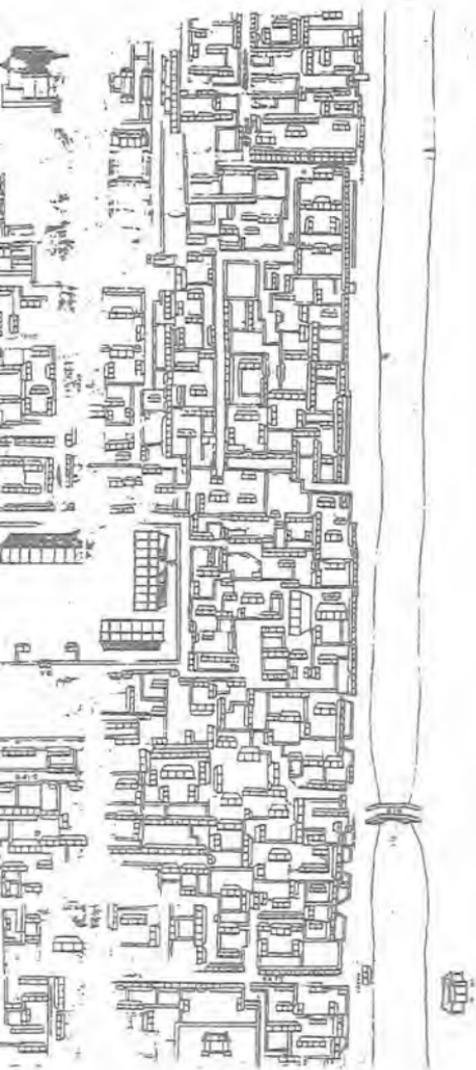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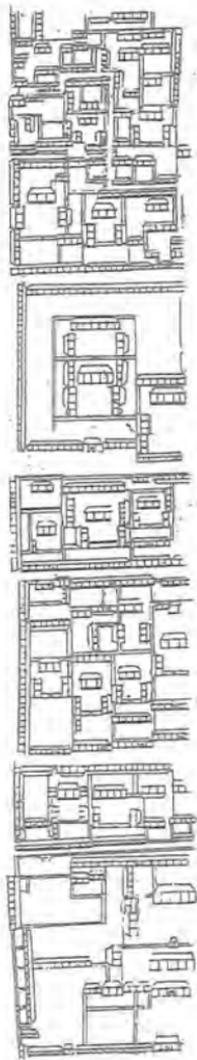
西四北二条 明代称西帅府胡同,永乐年间(1403—1424年)曾于都城设东、西二元帅府,次为军事会议之所,因西元帅府在此而得名。清代称帅府胡同,后沿用。1965年因是西四北西侧自南往北的第二条胡同定今名。胡同长595米,宽4米。中与新成胡同,小绒线胡同、西四北头条相交。胡同内58号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原为1921年由陈垣创办的平民中学,平民中学校舍初在育幼胡同(今西城区教育局址),后迁入西四帅府胡同原萃文、萃真学校校址。1952年改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胡同内3、5、7、9、11、18、19、25、31、36、45、54、55和59号是保存较好的四合院。

西四北三条 明代称箔子胡同。清代称报(或豹)子胡同、雹子胡同。1911年后沿称报子胡同。1965年因是在西四北西侧自南北的第三条胡同定今名。胡同长527米,宽5米。中与小绒线胡同相交。胡同内3号为隆长寺。11号和19号四合院和39号程砚秋故居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隆长寺原为明汉经厂外厂。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奉敕建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重修。寺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依次有山门一间,石门额上书“敕建护国圣祚隆长寺”。钟鼓楼各一间,天王殿三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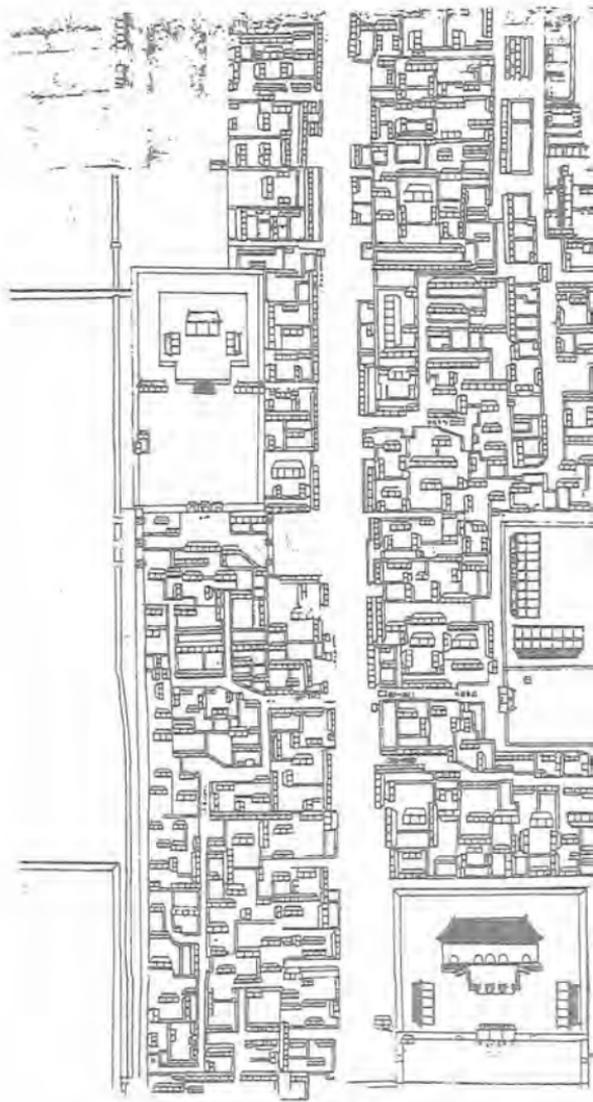
殿及东西配殿各三间和东西僧房各五间,后殿带耳房各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寺内原千佛绕毘卢铜像移至法原寺。殿中有匾二,一曰般若观空,一曰莲花净界。联曰:妙谛不多禅一指;善缘无量佛千身。寺内有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御制隆长寺诗碑,诗曰:“燕都四百载,梵宇数盈千。自不无颓废,岂能尽弃捐?间因为葺筑,亦次近街廓。重见金轮焕,成诗纪岁年。”西四北三条11号四合院是一座中型有小花园的四合院。坐北朝南。在南北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四进院落,大门在东南角,是一座广亮大门。进垂花门是二进院有北房及东西厢房各三间,三进院和二进院规制相同,四进院为后罩房。东院为花园,花园东侧有假山,山上有爬山廊,廊前有亭。花园中间为太湖石叠成的假山,假山北、南和西面建有花厅。此处曾为国民政府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1876—1932年)住所,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回族。现除花园内假山拆除建房外,尚保持原建格局。西四北三条19号四合院是一座小型四合院。坐北朝南。一进大门是前院,经垂花门进入正院,正院有北房三间及左右耳房各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现保存较好。西四北三条39号是程砚秋故居。程砚秋(1904—1958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程派创始人。从1937年直至逝世前寓此。故居坐北朝南。进大门迎面是照壁,倒座房四间,北房四间,西厢房三间。经月亮门、垂花门入正院,正院三间北房名御霜簪书斋。三间北房为两明一暗,东边里屋为卧室,明间为书房和练功房。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小院为厨房。故居保持原建格局。程砚秋生前用的戏装、剧本、图书和学习生活用品均保存完好。西四北三条5、9、11、13、19、23、25、26、27、31、33、39、和59号是保存较好的四合院。

西四北四条 相传有制皮作坊在此,明代称熟皮胡同。清代称臭皮胡同。1911年后称受壁胡同。1965年因是西四北西侧自南往北的第四条胡同定今名。胡同长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四合院平房保护区



《乾隆京师全图》上的西北地区



503米,宽4米。胡同内5、7、14、20、23、26、28、33、35、45、49和53号是保存较好的四合院。

西西北五条 明代称石老娘胡同,概因曾有石姓接生婆居此得名。后沿用。1965年因是西西北西侧自南往北的第五条胡同定今名。胡同长478米,宽5米。胡同内7号为傅增湘故居。傅增湘(1872—1950年),四川江安人。1917年任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晚年隐居,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研究。收藏善本书6.6万余卷。藏书楼曰“双鉴楼”、“藏园”。著有《双鉴楼善本书目》等。故居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并有东西跨院。东跨院有假山和六角攒尖亭。胡同有1、7、11、13、15、16、27、56和58号是保存较好的四合院。

西西北六条 明代因燕山前卫衙署在此。称燕山卫胡同。清代称魏儿胡同、卫儿胡同、卫衣胡同。1911年后称南魏胡同,后沿用。1965年因是西西北西侧自南往北的第六条胡同定今名。胡同长495米,宽4米。胡同内5、7、9、10、17、19、21、23、27、31、35和37号是保存较好的四合院。其中23号四合院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3号四合院坐北朝南。大门外有影壁和上马石。大门内有照壁。由四进院落组成。大门在东南角,其东有倒座房二间,西有倒座房六间,前院有东西配房各一间。进垂花门为二进院,有北房五间及左右耳房各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明间门上的裙版上雕刻有《西游记》等人物图案及花篮盆景。北房东侧有过道和三进院相通,内有北房五间及左右耳房各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明间门上的裙版上雕刻有松鼠葡萄盆景花篮图案。四进院有后罩房九间。院内墙上布满“卍”字不到头砖雕。现保存完好。

西西北七条 因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所封泰宁侯陈珪府第在此,明代称泰宁侯胡同。清初称泰宁侯胡同,后避宣宗旻字讳,改称泰安侯胡同,亦称太安侯胡同。后沿用。1965年因是西西北西侧自南

往北的第七条胡同定今名。胡同长430米,宽4米。胡同内7、29、33、37、49、53、和61号是保存较好的四合院。

西西北八条 因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所封武安侯郑亨府第在此,明代称武安侯胡同。清代称五(或武)王侯胡同,后沿用。1965年因是西西北西侧自南往北的第八条胡同定今名。长424米,宽6米。胡同内5号和58号是保存较好的四合院。11号是创办于1933年2月的北京燕京造纸厂。37号为长寿庵。长寿庵始建年代不详。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重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重修。同年宝禅寺(宝产胡同15号)僧侣将宝禅寺庙产卖掉,位于今宝产胡同15号的宝禅寺,成为从乐善园迁来的广善寺。宝禅寺迁到武王侯胡同的长寿庵,仍名宝禅寺。寺(庵)坐北朝南。有山门三间、前殿三间、中殿三间、后殿三间,僧房五间及东西配殿等共四十间。现基本保持原建格局。胡同中51、53和55号是庆宁寺。寺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坐北朝南。寺内有山门一间,前殿三间及东西配殿各三间。中殿三间及东西配殿各三间。后殿三间带左右耳房各二间。今前殿、后殿及配殿尚存。

西西北头条至八条东为西西北大街,在街西侧,西西北二条、三条间有位于西西北大街165、167、甲167号的护国双关帝庙。始建年代不详。元泰定元年(1324年)重修。明正统十年(1444年)、弘治十五年(1502年)、嘉靖十九年(1540年)重修。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重修。庙坐西朝东。依次为山门一间,钟鼓楼各一间,正殿三间及耳房各二间,北房三间,南房二间。北侧小院二间。现保持原建格局。

西西北头条至八条西为赵登禹路。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北平市政府府民户字第59号训令,“将北沟沿改为赵登禹路,南沟沿改为佟麟阁路,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

(作者为原西城区文化文物局干部)

追溯中华民族的庙会起源有的学者认为,周代的宗庙社祭,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庙会。在祭祀祖先时,民众云集祖庙,举行祭祀典礼,同时集市贸易,游艺娱乐。大多数学者认为,庙会活动起源于宗教祭祀。汉代以后,随着道教、佛教的相继传播,宫观寺庙不断兴建,宗教祭祀庆典的日趋繁盛,吸引成千上万民众的参与,形成定期集会规模。这种融祭祀、集市、娱乐于一体的庙会文化风俗,传承变异,至今仍依稀可见。

北京的庙会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与千余古都相辉映,燕京地区的庙会习俗,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上溯到辽金。自元朝定都后,历经明清,道教佛教寺庙遍及京城内外。各种庙会繁华昌盛,异彩纷呈。从古至今,规模盛大的庙会活动,一直吸引着千百万民众的热忱参与。

寺庙是宗教社会由无形向有形的具体转化。寺庙作为宗教社会的司职机构,代表着宗教精神的价值取向。北京地区现存的佛教道教寺庙,为人们考察庙会文化的渊源、发展与兴衰,提供了客

京都庙会风俗源流纵览

习五
一

观的脉络与历史轨迹。

幽州燕京古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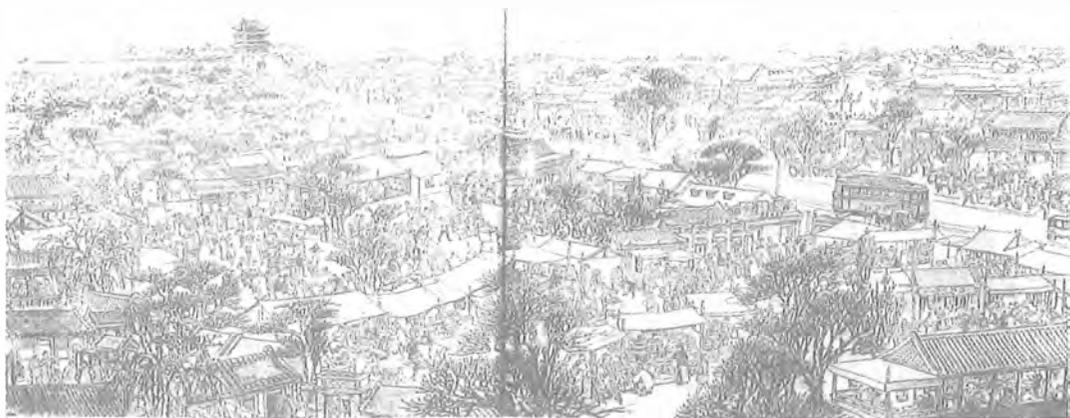
幽燕时期北京的庙会文化,朦胧闪烁,难以详述。北京地区最古的庙宇,尚需进一步发掘考证。

至今尚存最古的宗教寺庙是门头沟区的潭柘寺。该寺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十五,举办进香庙会,成为京郊初春最早的踏青庙会,吸引了众多游春的香客。

隋唐时期,幽州为北方藩镇之首。道教、佛教势力由中原北上,日益向幽燕地区扩展。幽州城郊内外庙宇日增。

唐代李氏王朝为抬高祖宗门第,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本名李耳)的后代。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公元739年,唐玄宗下令在幽州建立天长观。其后,这座重要的道观数次更名为太极宫、长春宫。而著名的道教宫观白云观,最初为长春宫的别院,是元初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安葬之所。自元明清至今,白云观庙会京城最著名的庙会之一。

始兴于唐代的北京远郊道教宫观,最著名的为丫髻山碧霞元君祠。祠始建于唐代贞观



旧京天桥一览

年间。经历代扩建，丫髻山相继兴建庙宇二十余座。至清初形成规模宏伟的宗教建筑群。清康熙、乾隆皇帝慕名仙山景致，曾两次来此游览进香。康熙赐碧霞元君祠天仙殿匾额为“敷锡广生”。每年四月初一至二十，丫髻山举办庙会时，朝廷派专人来此祭祀。北京城里许多达官显贵，翎顶辉煌，乘坐肩舆，络绎于途。方圆数百里的民众为祈福求子，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来此朝顶进香。其庙会“繁盛亚于妙峰山，而山景过之。”^①

盛唐时代，幽州地区的佛教传播也日渐广泛。据文献记载，城内修建寺庙数十座。至今原址尚存的庙宇有法源寺、善果寺等。法源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原名悯忠寺，是北京城内现存最久的古刹。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均举办祭祀佛祖诞辰庙会。“都人多于悯忠寺游玩，施斋饭僧，讲经于讲堂，听讲者甚夥。”^②

举世闻名的云居寺石经刻造工程，始于隋唐。名僧静琬于隋大业年间（605—617年）开始在京西白带山刻造石经，又于唐贞观五年（631年）在该地建造云居寺。

位于京西30公里马鞍山麓的佛教名刹戒台寺，创建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原名慧聚寺。每年四月初一至十五，举办祭祀佛祖诞辰的庙会。六月六日，为该寺的晾经日，届时四方善男信女前来进香。

唐末五代，中原政局大乱，契丹族日益强盛，建立辽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幽燕十六州划入契丹版图，辽王朝提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辽代中后期，皇帝崇奉佛教风气日盛。佛教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

始建于辽代的报国寺，经明清两代重修，至今仍坐落于宣武区广安门内。明末清初，报国寺农历逢五、逢六有庙会。该寺庙会书市颇盛，在京城首屈一指，为居宣南之学人觞咏之地。如王渔洋、孔尚任、王敬之、翁方纲等，均有咏报国寺的诗词。清康熙年间，该寺遭遇地震，殿宇倒塌，庙市渐渐萧条。随着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市五大庙会的兴起，报国寺到乾隆年间，已“古刹荒凉”、“集市也‘废不复作’”。

大觉寺，是至今尚存的著名辽代燕京寺庙。该寺坐落于京西阳台山麓。寺庙建筑坐西朝东，保持契丹人喜向东的“朝日”之俗。殿堂依山势层迭而上，巍峨壮观。大觉寺的玉兰享有盛名，素有“古寺兰香”的美誉。每逢花季，文人墨客纷纷赶来赋诗吟诵。该寺历代香火不断，每年初一、十五，均举办庙会。香客祈求神灵福佑，商贩乐见顾客解囊。

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崛起于东北，建立金国，攻灭辽国，占据燕京。1153年，金王朝迁都燕京，更名为中都。金王朝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密宗日渐衰微，律宗较

为盛行,寺庙兴建不及前朝。

广济寺,是至今尚存的金中都佛教寺庙。该寺坐落于今西城阜成门内,金元时期,广济寺庙会繁盛一时,为当时西城庙会之首。明初,因寺庙修缮,将庙会集市迁至护国寺。

元朝大都的兴盛

继辽、金王朝之后,蒙古民族崛起于漠北草原。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骁勇铁骑驰骋中原,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定鼎于燕,于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元大都成为统治全国的中枢城市。蒙古统治者尊崇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忽必烈尊封藏传佛教名僧八思巴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③。藏传佛教在元大都迅速传播,雄伟壮观的寺庙拔地而起。

元大都最著名的佛教寺院——白塔寺,坐落于今西城阜成门内。因寺中心建筑为雄伟的白色覆钵式塔,故俗称白塔寺,原名更迭,反而鲜为人知。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在辽佛舍利塔遗址上建造这座白塔。工程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主持。这座藏式巨塔竣工后,忽必烈又下令以塔为中心,修建一座大寺院,命名为大圣寿万安寺。该寺成为当时皇家宗教活动和百官习仪的中心场所,香火鼎盛京华。元末,该寺遭雷击焚毁,明代重建后,更名为妙应寺。清代、民国时期,白塔寺屡经修缮,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庙会集市场所之一。白塔寺庙会为农历每月逢五逢六,举办庙会集市。庙会期间,市民云集,摊商售货,艺人献艺,热闹非凡。

护国寺,始建于元代,初名崇国寺,明代皇帝赐名为大隆善护国寺。因它坐落于西城(西四北护国寺街),京城百姓俗称为西庙。护国寺庙会自17世纪中叶兴起,至20世纪中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起初,该庙会集市为农历每月初七、初八举办。民国年间,庙市日渐繁盛,增为农历每月逢七逢八举办,每月庙会期为六天。庙会期

间,摊商云集,从珠宝字画到日用百货,从风味小吃到杂技游艺,无所不有。

元代的道教虽不及佛教尊贵显赫,仍有所发展。在金元战乱之际,北方道教全真教派乘机兴起,亦称内丹派。京城的白云观成为全真教派的第一丛林。

白云观,坐落于今日西城区西便门外,是道教全真龙门派的祖庭,素有北方第一大道观之称。它是由元初长春真人丘处机仙逝后的藏蜕之所发展起来的。元末,长春宫毁于战火,明永乐年间欲重建,但基址不明,便修缮长春宫别院白云观。从此,该观一跃为全真第一丛林。白云观的建筑以八卦方位布局,经明清两代大规模扩建,形成一座恢宏完整的道教宫观。

白云观的年节庙会,以开放时间长、香火兴旺,冠绝京城。自明清以来,白云观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九日,举办庙会,为期十九天。庙会期间的传统风俗活动,摸石猴和打金钱眼,深得京城百姓喜爱,流传至今。十九天的庙会结合道教节日祭祀进行。正月初八朝拜星神,初九庆祝玉皇大帝诞辰,十三至十七日举办上元灯节。十八日夜至十九日凌晨,有“会神仙”之举。传说,丘真人于是日得道羽化为神仙,此夜仙人下界,重游故地,超度有缘者。因此,京城百姓云集白云观,焚香祈福,期待与神仙结缘。十九日上午,举办盛大法会。庙外,饮食和百货摊商的生意,红红火火,民间花会和游艺活动,精彩纷呈。京城市民称“燕九会”为“耍燕九”。

南方道教正一派北上发展,在大都兴建东岳庙,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宠信。东岳庙,坐落于朝阳门外大街。该庙于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竣工后,赐名东岳仁圣宫,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第一道观。东岳庙自元代以来,香火旺盛,倍受皇室重视,累朝不断修葺,现有殿宇600余间,供奉着道教神仙1272尊。该庙主祀泰山神东岳大帝。东岳庙自建成后,庙会香火始终繁盛,每月朔望各开庙一天。春节期间,由正月初一至十五开放半个月。相传三月二十

八日为东岳大帝的诞辰。故于每年三月十五至二十八日,举办庆祝东岳大帝诞辰的大型庙会,延续数百年。

东岳庙为京城历史最悠久的庙会之一。元代,这里正当大都通往漕运门户通州城的要道。客商云集,“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市场繁荣,因此香火格外兴旺。每逢初春三月,无论皇亲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纷纷前往进香。商贩汇集,“道途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亦盛会也。”^④明代,每逢东岳大帝诞辰,该庙举办巡游盛举。届时,“都人陈鼓乐、旗帜,楼阁亭彩,导仁圣帝游。帝之游所经,妇女满楼,士商满坊,肆行者满路,骈观之。”^⑤清代,每届大帝诞辰,朝廷派专员祭祀。民间香会护神驾出游,沿途香客游人成千上万。自明清以来,庙会期间,京都各行各业争相办善事,各种善会名目繁多。东岳庙庙会兴盛持续至民国年间。

九天宫和十八狱,始建于元代。朝阳门外东岳庙东边路北为九天宫,路南为十八狱。九天宫供奉着九天应元雷音普化天尊(即道教的雷祖天尊)。十八狱的神像是根据道教经典塑造的阴曹地府。九天宫和十八狱,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举办庙会,与东岳庙庙会连成一片。

都城隍庙,位于今复兴门内成方街,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数百年来屡经沧桑,屡毁屡建,至今尚存。城隍是神话传说中守护城池的神,后为道教供奉。都城隍庙是供奉都城的城隍神庙。

元代,都城隍庙是京城百姓日常祭祀、四时游览的主要庙宇之一。明代,都城隍庙会是北京最繁华的庙会集市。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从庙宇向东延伸,列肆三里。最盛时期,庙市绵延达十里。庙会上的货物,“人生日用所需,粗细兼备”,珍奇异宝,璀璨夺目。清代,每年五月初一至初十,开庙十天。初一,宛平县城隍出巡,至都城隍庙相见,各种香会同行,锣鼓喧天,所经街市,观者如潮。庙会期间,百戏杂陈,摊棚林立,尤以卖估衣者为多。清

朝诗人赋诗云:“西城五月城隍庙,濛濛纱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为穿新买估衣回。”^⑥民国年间,庙会香火日趋衰微。

都土地庙,位于宣武门外长椿街,始建于元代。农历每月逢三有庙会。届时,百货罗列,顾客摩肩接踵。《燕京竹枝词·土地庙》有诗云:“柳斗荆筐庙市陈,鸽子花厂点缀新。绫罗布衣皆出卖,往来皆是购物人。”清代,该庙会为京城五大庙会之一。民国年间,宗教祭祀香火断绝,庙会演变为纯粹的商业集市。

明朝京城的繁华

明代朝廷祀典,沿袭古制,祭天祭祖等为大祀;历代帝王、孔子、关帝、文昌、先农、先蚕等为中祀;先医、东岳、城隍、火神、龙神、窑神及历代贤良祠等为群祀。显然,朝廷祭祀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兼融佛教和道教文化。

有明一代,朝廷对社会影响巨大的佛教、道教,建立严格的宗教管理制度,设立善事院管理佛教,设立道录司,管理道教。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然成为宗教发展的胜地。京都佛教、道教的发展,远超前代。

明代诸帝多崇奉佛教,京城佛教发展趋于极盛。从封建帝王,到民间百姓,纷纷捐资修建寺庙。自太祖立国,至宪宗成化年间,仅百余年,“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已至六百三十九所。”^⑦其中,隆福寺、万寿寺、卧佛寺等庙会香火兴盛。

隆福寺,坐落于东直北大街,始建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明清两代屡有修缮。因其坐落于东城,京城百姓称之为“东庙”,与“西庙”护国寺对称。

清初,隆福寺农历每月初九、初十,举办庙会集市。其后,庙会集市日渐兴盛,增至每月农历逢九逢十有庙会,每月庙会期为六天。民国年间,庙会香火衰败,逐渐成为纯粹的集市。庙市日期逐渐增加,农历每月逢一、二、九、十开庙,每月庙会集市多

达十二、三天,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庙会之一。每逢庙市,摊商云集,人流如海。日用百货、珍奇古玩,琳琅满目;风味小吃、民间游艺,雅俗共赏。清康熙至民国年间,该寺素有“诸市之冠”的声誉。

万寿寺,位于海淀区苏州街、长河北岸,与紫竹院隔河相望,是京郊著名的古刹。该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清代朝廷数次出巨资扩建,殿堂富丽。该寺每逢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开庙,其中,四月初八日为正期。是日,为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日。届时,众僧聚齐在大延寿殿,举行“消灾解厄、增福延寿”大法会。城乡居民进香拜佛者成千上万。寺庙前空地,临时搭建摊棚,饮食、杂货连成一片。

寺庙门前的长河,两岸高大的垂柳绿荫成行,青青的柳枝随波摇曳。庙会期正逢清明时节,长河两岸游玩踏青者,车水马龙。明代,京城谚云:“天坛游松,长河游柳”。

卧佛寺,坐落于崇文门外,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因寺内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卧像,故称卧佛寺。原西廊有明代铁钟,音色优美,又称妙音寺。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开庙,为期五天。门前自成集市,主要出售农具、山货及端午节时令鲜品。东南城一带居民多到此进香游览。

明代京城佛教大盛之时,道教也有相当的发展。火神庙,位于崇文门外西花市大街,原名火德真君庙,始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清乾隆年间重修。该庙农历每月逢四有庙会。庙会集市日用百货、风味小吃、金鱼虫鸟,一应俱全。庙会的花市享誉京城。工艺花、鲜花,姹紫嫣红,满眼芬芳。民国年间,宗教祭祀香火断绝,庙会演变为纯粹的集市,人们便称此地为花市。

药王庙,明代京城修建的药王庙为数众多。其中最著名的药王庙位于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因其位于城南,故京城百姓称之为南药王庙。该庙建于明末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重修,殿堂宏伟。药王殿供奉

伏羲、神农、黄帝、孙思邈、韦慈藏,两侧分别供奉扁鹊、张仲景、华佗等古代十大名医。

该庙自始建起,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有庙会。明末清初,药王庙香火极盛,除夕至元旦彻夜不断。每年四月二十八相传为药王诞辰。从四月中旬起,进香拜神者拥挤不动,多有挤不进庙者。为方便进香民众,该庙在庙外神路街设立香池数处,供人焚香遥拜。清中期以后,庙会祭祀香火逐渐冷落,但赶庙会的市民却越来越多。庙内,各种风味小吃,飘香诱人,庙外,商贩云集,风筝、玩具、干鲜果品等应有尽有。每逢朔望之日,以药王庙为中心,形成商贸交易市场。由此东晓市街逐渐发展繁荣起来。

明代,北京城郊到处修建碧霞元君庙。京城百姓俗称碧霞元君庙为“顶”。其中最著名的位于左安门外弘仁桥,时人称为“大南顶”。该顶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8年),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奉敕重修。据《道藏》本《搜神记》记载,四月十八日为碧霞元君诞辰。届时,朝顶庙会风靡京郊。“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胜”^⑧。每年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尘风汗气,四十里一道相属。舆者、骑者、步者、步以拜者、张旗幢鸣鼓金者,……群从游闲,数唱吹弹以乐之”^⑨。会期,桥畔形成集市。商贾云集,百货杂陈,熙来攘往。庙中祭祀,香烟缭绕,磬声盈耳。

清代,京城近郊香火最盛的碧霞元君庙为“西顶”。该顶原名护国洪慈宫,位于西直门外蓝靛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0-1620年),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奉敕重修,又名“广仁宫”。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八,举办庙会。清廷特派大臣前往拈香,为京畿五顶仅有。清人樊彬《燕都杂咏》云:“年年男女抱土袋随香纸往祀,名进土。”

妙峰山,全名“莲花金顶妙峰山”,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乡涧沟村北,距京城近70公里。妙峰山碧霞元君祠创建于明末,俗称娘娘庙,原为道士主持,香火不旺。康熙

二十八年(1689年)后,佛教势力上升,改由僧人主持,香火逐渐兴盛。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建后,更名灵感宫。“每届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止,香无断烟,奇观哉!……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人计之,亦约有数十万。以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⑩

香客除京城民众外,还有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的进香者,多来自天津、福建、广东、广西、吉林等地。其盛况不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骤然冷落。

蟠桃宫,系道教庙宇,主尊西王母娘娘及祝寿列仙。它位于东便门内、护城河桥南,始建于明代,清康熙元年(1662年)重建,庙宇不大,但香火颇盛。明清至民国年间,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有庙会,称“蟠桃盛会”。届时,摊贩云集,游人如织,风味小吃、民间游艺,各显身手。时逢阳春三月,游客“长堤纵马,飞花箭洒绿杨坡;夹岸联殇,醉酒人眠芳草地。”^⑪

太阳宫为道教宫观,位于左安门内大街,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重修。主殿供奉太阳星君,塑有一只雄鸡。相传农历二月初一为太阳诞辰,太阳宫举办“修崇醮事”,从初一至初三举办庙会。市民前往进香,“结侣携殇,往游竟日。”庙前,临时集市上,小贩多卖“太阳糕”。米面糕装饰着雄鸡图案,以祭祀太阳星神,祭奠后,分与儿童食之。

崇乐观,道教宫观,位于西直门内新街口,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明清两代,该庙系西城较大的定期庙会。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十五,举办庙会。届时,百货齐备,游客络绎。灯节时,举办“奇巧花灯认不明”的大型灯会。清末,殿宇坍塌,庙会冷落。

前门关帝庙,位于正阳门外,城门洞西侧,明、清两代,本在瓮城之内,1913年瓮城拆除后,露在街面。该庙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8年)正月。“殿祀精严、失楹

黄覆,绮槛金龕,中奉圣祖御书,额曰‘忠义’”。^⑫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天下,而京师尤胜。”^⑬京城中,前门关帝庙的香火最盛。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均有庙会。届时,求福寿者、求子嗣者、求功名者,络绎不绝。庙会期间,庙外形成临时市集。相传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关帝诞辰。是日,朝廷派大臣祭祀。“进刀马于关帝庙,刀以铁,其重以八十斤,纸马高二丈,鞍鞞绣文,髻衔金色,旗鼓头踏导之”^⑭。每年“除夕开正阳门内门,由内城居人瞻拜;子夜后开西门,城外居人瞻拜。”^⑮民国年间,当局为维持治安,将庙会缩减为正月初一天。

中华民族的行业神崇拜,历史悠久。明代京城,随着社会生活的繁华,各种都市行业祭祀本行业祖师神的庙会,日益兴盛。

都灶君庙,坐落于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建于明代,清康熙年间(1662—1721年)重修。灶君,道教俗神,传说主管饮食之神。相传农历八月初三为灶君诞辰,厨行在此祀神,谓之“灶君会”。因此,每年八月初一至初三,举办庙会。腊月二十三为灶君朝天之日,也有一日庙会。庙会期间,京师各大饭庄厨师均前往进香,并演戏谢神。届时,庙外形成临时集市,主要出售炊事用具。此外,凡厨行学徒拜师或出师时,均在此庙举办仪式,烧香祭拜灶神,置酒席宴请同行。

极乐林,位于安定门外大街。前殿供奉三世佛,后殿为玉皇阁,跨院有鲁班殿。传说农历五月初七为鲁班祖师诞辰。届时,京城瓦匠、木匠、棚彩行业的同仁聚此“摆斋”,祭祀行业祖师。是日,本行业的花会前来献艺。庙前,设火壶茶会,招待同行及香客。有商贩来此出售应节鲜货等。

花神庙,坐落在北京的花乡丰台镇东,建于明代,供奉花王神。这里是花农祭祀花神的庙宇,也是花行同业公会的会馆。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神诞辰,花农到此进香献花,谓之“花朝”。三月二十九日,各档花会到此献艺,谓之“谢神”。城里的“幽人韵士”也来看戏,并即兴赋诗唱和。届时,

庙外有鲜花集市。

窑神庙,位于门头沟区圈门,约建于明代,清代屡次重修。该庙窑神是古代京西采煤业供奉的行业祖师。其神像面目凶猛,须发蓬松,身穿黄袍,头戴乌纱,手中倒提一串铜钱。虽然窑神庙的偶像为道教尊神,但该庙一直由佛教僧人主持。自清代起,庙内设立煤业议事公所。农历每年腊月十七为祭祀窑神之日,煤窑业主到庙进香膜拜。每座煤窑都定期向窑神庙奉送银钱,或用于祭祀窑神,或举办同行慈善公益事业。

明代,北京涌现出一批工商行业会馆。这些会馆建筑的基本格局为“前庙后馆”,即:前半部分为祭祀行业神的庙宇,后半部分为会馆的行业管理办公机构。当时京城的行业会馆有:颜料行会馆、梨园会馆、弓箭会馆等。

颜料行会馆,位于崇文区北芦草园,建于明代中叶,清代康熙、嘉庆年间两次集资重修。这座会馆由山西颜料、桐油行在京城商人创建。原名平遥会馆,后改名为颜料会馆,到清末改称为颜料行同业公会。前半部分为仙翁庙及火神庙。仙翁庙供奉的行业祖师为梅福、葛洪、谢科三位道教仙翁。每年九月,举行祭祀行业神的仪式,敬备金钱、云马、灯为仪,并献戏娱神。庙后建有一座戏楼,为演戏酬神的地方。

梨园会馆位于崇文区东珠市口南的精忠庙内。北京的梨园会馆——精忠庙建于明代,源于“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典故。起初,殿内供奉仅岳飞塑像。后来,戏行艺人集资建筑一座天喜宫,宫内供奉戏行祖师——喜神,即唐明皇。因唐明皇喜爱音乐歌舞,在唐朝大兴梨园教坊,被戏曲行供奉为行业神。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为唐明皇的诞辰,戏班名伶聚集会馆,举行祭祀仪式。届时,梨园名角举办募捐义演,集资修建会馆设施及公益事业。

弓箭会馆在德胜门外冰窖口路南,始建于明代。弓箭界同仁在馆内供奉黄帝为祖师,东西配殿供奉有历代神箭手的牌位。

会馆南面的护城河边为一片空旷之地,每年在此举办射箭比赛。

清朝帝都的盛衰

清朝的宗教政策沿用明朝的方略,对传统的佛教、道教,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尊崇,一方面控制。清前期,国力强盛,佛教道教都有发展,修复旧寺,兴建新寺,寺庙总数超过明代的全盛时期。如:顺治年间,在琼华岛上修建白塔寺(今北海公园);康熙年间,在皇城之内修建弘仁寺,雍正年间,整理刻印《大藏经》,共收佛教经典1670部,7240卷,分装724函。雍正年间,敕建云、雨、风、雷等道教坛庙。乾隆年间,修建万寿山上的大报恩延寿寺等。清中叶以后,国力日衰,佛教日益削弱。清道光年间,禁止道教天师晋谒皇帝,道教日趋民间化。

为安抚蒙古、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清朝注意利用藏传佛教(亦称为喇嘛教)。清中前期,京城的藏传佛教虽不及元代,但比明末有所发展。清代京城陆续修建一些藏传佛教寺庙,其中与民众性庙会相关的有:雍和宫、黄寺、黑寺等。

雍和宫,位于东城北新桥北,是京城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原为雍亲王府,乾隆九年(1744年),改为喇嘛庙,成为清政府管理全国喇嘛教事务的中心。雍和宫主要宗教建筑为天王殿、雍和宫、永佑殿、法轮殿、万佛阁等,将汉、满、蒙、藏各族建筑艺术风格融为一体,巍峨壮丽。

雍和宫每年农历正月三十举行演鬼;二月初一清晨打鬼。循例为庙会期。打鬼,是汉族民间的俗称,喇嘛称为:“跳布扎”。“跳”是汉语,舞蹈之意,“布扎”是蒙语的音译,伏魔驱祟之意。喇嘛教的“魔”和“祟”,是指反对佛教的贵族和异教徒。“跳布扎”是喇嘛教利用大型宗教乐舞剧,向异教徒示威,使邪魔外道慑服。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跳布扎”的宗教仪式传到京城的黄寺。嗣后,雍和宫、黑寺、弘

仁寺等喇嘛庙相继举行“跳布扎”。历代相传,沿袭成风,成为京城新春民俗。

雍和宫跳布扎的仪式,由清朝皇帝主持,王公大臣云集,盛冠京华。打鬼日,雍和宫牌坊前,风味小吃和玩具摊商林立,游客拥挤,无立锥之地。清帝逊位后,由蒙藏院主持,仪式逐年从简,但慕名前来观光的中外游客云集,一时竟超过往昔。^⑩

黄寺,位于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黄寺有西黄寺、东黄寺之分,二寺毗连。两寺殿宇皆以黄琉璃瓦覆盖,因而得名。附近居民皆称之为双黄寺。西黄寺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是清政府为西藏达赖五世来京朝觐准备的住所。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开放一日,庙里喇嘛举行盛大的“善愿日”法会,“跳布扎”,送祟除邪。东黄寺无单独打鬼之举。

据《京华春梦录》记载,西黄寺“每届上元节序,各喇嘛演习舞蹈,或戴面具,或击鼗乐,牛鬼蛇神,聚在一堂,口唱番歌,似有节奏,名曰‘打鬼’,能辟不祥。是日万人空巷,裙屐杂沓。”届时,在黄寺的北教场,自安定门至德胜门之间,三里之遥,有走车、赛马大会。

黑寺,有前黑寺和后黑寺之分。因覆以铁色琉璃瓦,故俗称“黑寺”。前后黑寺均建于清初,原名为慈度寺和察罕喇嘛庙。每年正月十五,后黑寺“演鬼”;正月二十三日,前后黑寺均开庙一天,举行打鬼。凡挤不进庙观看“跳布扎”的民众。一律等着看送鬼。送鬼的行列一出庙门,游艺者和购物者一拥而上,人流涌动,为打鬼活动的高潮。送鬼之后,游客扛着糖葫芦,举着风车纷纷散去。

大钟寺,本名觉生寺,坐落于西直门外西北的曾家庄,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寺内珍藏一口明代永乐年间(15世纪初)铸造的大钟,俗称“大钟寺”。这座铜钟高6.75米,重46.5吨,钟身内外共铸汉文经咒十六种,梵文经咒一百余种,共23万字。经文字体典雅隽秀,堪称艺术佳作。大钟音质圆润深沉,经科学鉴定,可达方圆

百里,为世界古钟之最。大钟悬挂在寺内主体建筑——大钟楼上。楼高16.7米,上圆下方,取“天圆地方”之意。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觉生寺被辟为皇家祈雨之所。皇帝亲临祈雨,王公大臣轮流拈香。从此,永乐大钟除逢年过节外,“非祈雨不鸣”。

这座皇家寺庙名声显赫,平时香火极盛,尤以春节为最。每逢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开庙半个月。香客慕名登楼,观赏大钟。钟身有两孔气眼,如拳大小,中悬铜铃,游客以铜钱击之,中者铿锵作响,以为祥瑞,称之为“打金钱眼”。届时,游人纷集,士女如云,钟下八角浅井积钱多达一米厚。

精忠庙,京城内有两座,建于清康熙年间。一座位于前门外山涧口精忠庙街。一座位于东直门大街。精忠庙供奉岳飞塑像。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三至十七日灯节期间开放,共有庙会六天。灯节时,有夜市。殿外石阶上列满纱灯,绘有《精忠传》故事的连续图画。

厂甸和火神庙,是典型的春节集市性庙会。厂甸是和平门外南新华街路东的一条胡同小街。每到春节,与厂甸毗邻的琉璃厂东西街口、南新华街口、吕祖阁、玉皇阁、大小沙土园的摊位联成一片,成为一个大集市。厂甸集市的兴起在清乾隆年间,直至民国时期,始终兴盛。早年,厂甸庙会有宗教祭祀活动。每临新春,火神庙、土地祠、吕祖阁等寺庙,香火颇盛。烧香祈福者,求签问卦者,络绎不绝。后来,厂甸地区香火日衰,生意日隆,成为以展销文玩、书画著称的贸易集市。每届正月初一至十五为庙会期。南新华街一带,高棚林立,广陈名人字画、珠宝玉器、雕漆珐琅、陶瓷古镜,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庙会期间,海王村水法池前的广场开辟为茶社。厂甸庙市是儿童玩具荟萃之地,如:空竹、泥人、鬼脸、花炮、灯笼、万花筒、氢气球等,任人选购。

火神庙系道教庙宇,位于和平门外东琉璃厂路北,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

民国以后,辟为“文化商场”。平时,只有博久书局、同善堂、文汇阁等几家书店在此租房营业。每逢春节期间,火神庙内高棚下布满珠宝摊、古玩摊、玉器摊和书画摊,成为厂甸庙会文玩书画展销地之一。

财神庙,又名五显财神庙,位于广安门外六里桥西南。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每年农历正月初二及九月十五至十七,开庙举办庙会。正月初二,香火极盛。求财者群往烧香,人人奋勇,争先恐后。据说,可吉星高照,顺利发财。“初二日,致祭财神,鞭炮甚多,昼夜不休”。“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开庙三日,祈祷相属,而梨园子弟与青楼校书等为尤多”。^{①7}

吕祖阁,位于西城区和平门内半壁街,建于清初,系供奉吕洞宾等神仙的道教宫观。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有庙会。每年四月十四日为吕祖诞辰日,开庙一日。庙宇不大,但香火颇盛,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庙内设“孚佑帝君灵签”,可求财问喜,香客争献香资,一卜吉凶。

清代,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京城的行业会馆日渐增多。在京城影响较大的有,银号会馆、缘行公所、成衣行会馆、烟行会馆、靛行会馆、药行会馆、玉行会馆、文昌会馆、当行会馆、布商会馆、纸商会馆等。这些行业会馆的建筑设计基本上为“前庙后馆”的结构。各行各业都供奉着本行业的祖师神像。

烟行会馆,又名河东会馆,由山西烟行商人集资,始建于雍正五年(1727年),屡经修葺。馆中建有关帝庙,主祀关帝,左右配祀火神、财神,烟贾商人合称为三圣殿。关帝被奉为主神,原因有二。其一,关羽武艺超群,为忠义品格的典范;其二,关羽为山西运城人士。正殿上高悬“义炳乾坤”、“万世人极”的题匾。馆内公举主持,朝夕香火不断。烟行同仁认为,祈求神灵保佑。才能财源茂盛。

布商会馆,又名晋翼会馆,由山西翼城布行商人集资兴建。会馆位于崇文区小江胡同,建于雍正癸丑年(1733年)。此馆坐

东朝西,馆中神殿,供奉关圣帝君、火神金龙大王、玄坛财神。每月朔望吉旦,同仁群聚馆内,焚香瞻拜行业祖神,演戏谢神。

玉行会馆位于宣武区琉璃厂,建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馆内建有祖师宝殿,内供白云观大师丘处机、古代工匠名师鲁班、财神爷赵公元帅。馆内每年农历正月十九和七月二十八举行祭祀典礼。前者为丘处机诞辰日,后者为其成仙日。玉行同仁供奉丘处机为祖师。根据丘祖定做金丝嵌玉道冠的典故。每年正月,白云观开庙举办庙会时,玉行会馆召集同行前往,举行集体拜祭活动。

缘行公所坐落于陶然亭东的哪吒庙内。该庙建于明末,自清乾隆年间起至民国时期为京城缘行公所。缘行供奉哪吒为其祖师神,源于《封神演义》。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京城缘行行业在该庙举行盛大的祭典。

纸商会馆,又名延邵会馆,因福建延平、邵武二府纸商出资合建。该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会馆坐西朝东,设有神殿,供奉“天后”(闽浙等沿海地区称之为妈祖)。天后,传说为福建莆田女子,后得道成仙,为著名的航海保护神。当时,福建纸商每年航海运纸来京销售。因此,同行集资建馆,广置戏台,演戏酬神,祈求天后,保佑旅途平安。

银号会馆位于前门外西河沿路南,于清康熙年间,由浙江绍兴银号商人集资兴建。馆内供奉玄坛祖师,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每至春秋假日,同行欢聚一堂,祀神献酬。

成衣行会馆,又名浙慈会馆。当时许多浙江慈溪工商人士到京城从事成衣行业。同乡同行集资修建这座会馆。该会馆位于前门外晓市大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道光、光绪年间屡次重修。馆中“建造殿宇、戏楼、配房,供奉三皇祖师神像”。“历年来,行中唱戏庆贺,神灵默佑。”^{①8}

靛行会馆位于前门鹞儿胡同,建于道光辛卯年(1831年)。靛:原为一种蓝黑色

的染料。当时,人们统将染料称之为靛,靛行会馆即染料会馆。京城从事此行业者多为山西平定和翼城人。靛行会馆供奉的行业祖师为梅福、葛洪、谢科三位道教仙翁。每年九月,行业同仁举行祭祀祖师诞辰仪式。

当行会馆,位于前门外西柳树井路南。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馆内建有火神殿、财神殿,内祀火神、财神和关帝,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为祭祀财神日,五月十三日为祭祀关帝日,六月二十三为祭祀火神日。届时,召集同行,进香祈福,演戏酬神。

文昌会馆位于宣武区琉璃厂,与玉行会馆为邻,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该馆由河北书行商人集资兴建。馆内建有文昌殿,供奉文昌帝君和火帝神君。每年农历二月初三为文昌帝诞辰日。是日,同行演戏团拜,共襄盛举。

京城工商业祭祀行业神庙会的兴盛,反映出明清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间行业宗教文化的繁荣。

北京的庙会文化,随着在都市社会的发展,其多元功能的互动关系不断调整,各种功能的内涵逐渐演变。宗教的主导作用逐渐动摇,商贸与文娱功能日益增强。地处繁华闹市的庙会,商业贸易功能迅速超过宗教的魅力。民众荟集的庙会集市,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自然舞台。

庙会文化,这种具有千年古风的民族

传统,在现代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再度蓬勃兴起。以其浓郁的民族传统风韵,成为当代京城最具魅力的风景线之一。

①(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63页。

②(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19页。

③《元史》卷四《世祖本纪》。

④(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⑤(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⑥(清)得硕亭:《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词》),见《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⑦《明史·单宇传》。

⑧(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19页。

⑨(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133页。

⑩(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第62-63页。

⑪⑫⑬(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17页,第23页。

⑭(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68-69页。

⑮(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23页。

⑯参见魏开肇:《雍和宫漫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16-19页。

⑰(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第46页。

⑱胡春煊、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世界遗产名录(中国部分)

在全球400多项世界遗产中,中国有21项,名单如下: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九寨沟、黄龙。

世界自然与文化综合遗产:泰山、黄山、峨眉山。

世界文化景观:庐山。

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故宫、敦煌石窟、秦始皇陵(包括兵马俑坑)、北京猿人遗址、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承德避暑山庄、曲阜孔府孔庙孔林、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园林、颐和园、天坛。



永定河是北京地区第一大河流,其上源流经黄土高原,沿途又接纳了数道河流之水,所以河水含沙量大、流速快。一路上穿山越岭,至门头沟区三家店出山。下游即永定河冲积扇平原,土质肥沃,养育了两岸的京畿人民。

但是,历史上的永定河就像一匹桀傲不驯的烈马、泛滥成灾。据史载:从金代到1949年的800多年间,永定河共决口81次、漫溢59次、河流改道9次,给沿途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所以它又被称为浑河、小黄河、无定河。自金代至清代,统治者治理永定河的记载,充盈史册。笔者由于工作关

系,参加了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普查中发现京西门头沟境内、永定河边几处石刻文物,均与清末治理永定河有关。

1. 光绪八年(1882),和硕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视察永定河工程奏折碑。

该碑出土于1995年8月,在门头沟区城子小学施工中发现。碑青石质、无碑额,方座,高205cm、宽107cm、厚22cm,记述了“钦命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前福建布政史王德榜”率军治理永定河,两亲王奉慈禧太后懿旨视察工程事宜。(该碑在《光绪顺天府志·水利》篇中有摘录)。王德榜,字朗青,湖南人氏。咸丰初年,与其兄在家乡办团练

镇压太平军起义, 还曾参与过赫赫有名的“镇南关”战役, 大败法军。1860年起跟随左宗棠转战南北, 战功卓著。“光绪七年(1881)奉命入京教练火器健锐营兼兴畿辅水利。”其实王德榜在随左宗棠转战陕甘一带时, 在甘肃临洮曾“浚狄道河渠, 护沃壤百余万亩”。所以到京后, 即受左宗棠之命勘查永定河上源工程。

王德榜首先与同僚一起从卢沟桥溯流而上历经石景山、三家店曲折入山, 沿永定河走到乾隆年间所建的沿河口玲珑坝遗址, 然后又顺流而下。他把河道情况逐段绘成图, 并附上说明, 回京后与左宗棠等详细研讨后, 遂决定在下尾店、丁家滩、车子崖、水峪嘴、琉璃渠五处筑渠建坝。左宗棠在令王德榜移营开工的同时, 又从涿州、房山等处募选二百多名石匠助役。8月20日, 永定河汛期已过, 王德榜带领人马来到工地, “筑坝分渠等工逐段次第兴办”, “各坝随山逶迤”, 就地伐石筑坝凿渠。其取石法“四周凿孔, 以火药轰取, 举手之顷, 数日运之不尽, 大石筑坝, 碎石则以烧灰, 即省椎凿之劳复免挽运之费, 其功效实不止事半功倍。”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王德榜采石, 竭力避开“百姓田庐、坟墓”等, “其火药轰石, 皆择荒僻之区。”此举深得附近居民之心, 民众赞扬王德榜“驭军有方、兵不扰民、兵民相安”。当两亲王视察工程时, 也赞赏这一方案, 并令王德榜再接再厉“以下各段工作务照此认真, 以竟全工”。

就这样, 历经八个多月, 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严寒的冬季, 王德榜带领全体将士, 上下齐心, 顽强苦干, 永定河上源工程终于在光绪八年四月初六日(1882年5月22日)完成。

史载: 王德榜所修的五处水利工程, 共计:

- (1) 杀水坝 5 道, 迎水坝 3 道, 总长 793 丈多。
- (2) 顺水墙 3 道, 总长 257 丈。
- (3) 顺水堤 1 道, 长 920 丈。
- (4) 石渠 8 道, 总长 280 丈。

(5) 正渠 8 道, 支渠 9 道。

(6) 迎水、束水涵洞、石桥 6 座; 过路石桥 26 座, 过水堰槽 8 道。

即遏止了永定河水的肆意泛滥, 又可灌溉良田二、三万亩, 其灌溉法: “若用水时, 则上其闸板, 鼓涨其水分流入地; 不用水时, 撤其闸板, 其水随渠而流, 仍归入河”。非常方便。

2. 野溪刻石: 这块刻石在现今门头沟区妙峰山乡野溪漫水桥附近一巨石上, 距地表 5 米许, 山石面较平整, 高 2 米、宽约 1 米, 文字竖刻, 从左到右: “光绪八年(1882)孟春谷旦立于野溪河滩(小字), 统师徒, 杀水势, 燕民从此乐熙熙(大字)。钦命头品顶戴, 赏穿黄马褂奏办直隶顺天河务、前福建布政使, 达冲阿巴图鲁楚南王德榜题(小字)”。

刻石大字 30×30 厘米, 小字 10×10 厘米, 字体楷书、端正有力。这是王德榜为纪念水峪嘴、车子崖水利工程竣工, 亲自题词并命令刻在该处的, 从中可以看出王德榜自豪的心情, 以实际行动实现了统帅左宗棠的愿望。

3. 丁家湾刻石: 位于妙峰山乡丁家湾村前永定河边的丁家湾, 字刻在一巨石上, 巨石高 150、宽 80 厘米, 文字竖刻, 从右到左:



野溪石刻



丁家湾石刻

“光绪七年(1881)十月二十日(小字),醇亲王到此(大字)(刻石中的‘醇’字写成‘醇’字)前福建使王德榜立”(小字)。

刻石大字 24 厘米见方,小字径 10 厘米,字体楷书,浑厚有力。该刻石印证了《懿旨碑》中提到的、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醇亲王“于察看神机营水碓造药局之便……取道协和洞至丁家滩周历详察所有筑坝分渠等工”的记载。王德榜令人刻石留念,就是在醇亲王的这次视察中赞扬王德榜“驭军有法、兵民相安”,他还亲自观察了王部下用火药轰山取石的办法并予以肯定还“从神机营中提取存款一千两,交王德榜奖励勇丁夫役。”

4.“修永定河题诗碑”:该碑青石质,1956年修筑城子拦河闸时被截为六节,每节高 1.8 米,宽 0.3 米,均被砌在坝堤之中,其中一截在城子拦河闸西岸,其外露文字为:“率师旅,释戈予象取復……筑石坝,节河流……三时不害亦有秋。光绪八年岁次壬午清和既望吉立。”字径 5 寸,体势雄奇。

有人疑是左宗棠自书诗歌碑,可是从年代看,光绪八年,左宗棠已被调任两江总督,不可能再回京师立碑。查有关史料光绪八年四月,王德榜的施工部队曾在三家店(即拦河闸附近)附近永定河刻石立碑、纪念工程竣工,是否就是该碑,还有待以后考证。

5.傅家台水利碑,在今门头沟区雁翅镇傅家台村,碑墨石质,额题“永垂不朽”,右上角残,碑尺寸为 60×47×19 厘米。记述了傅家台村清末至民国初年集资兴修水利之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傅有光等首倡集资筑渠;光绪三十年,傅有光又借款千五百元缮修,测勘不精,修筑无法,徒筑债台,破家荡产……张君于民国九年邀煤矿技师来山细测,开凿二十丈山洞……值大水冲毁。又筹集粮款重修,始告成功,则一渠曲水抱村流,千顷腴田万斛收。”

这几处刻石(傅家台水利碑除外),其实都是记载清朝光绪七八年间,治理永定河上游工程之事,如今你若到门头沟区来,到上述几处地点,仍能看出当年所筑渠坝的痕迹。民国初年,在上述水利工程基础上修建的城龙灌渠至今仍是门头沟区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该渠全长 20 多公里,灌溉上万亩良田。

那么,在清末,清廷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各族人民起义的困难背景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什么要斥资修治永定河泥?固然永定河经常泛滥,威胁北京城的安全,但促成这一工程上马的关键人物是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人氏,出身布衣。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早年郁郁不得志。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在家乡编练湘军,曾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民起义。1875 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率军打败英俄走狗阿古柏反动势力,收复了天山南、北路和伊犁,成为晚清政府的“中兴名将”。官至太子太保、二等侯爵兼在军机大臣行走。光绪六年被调入京。

左宗棠为什么热衷于治理永定河呢?

首先,左宗棠奉命调回京城之日,正是慈禧太后实行“垂帘听政”之时。朝廷内部



“修永定河
题诗碑”

矛盾重重,尔虞我诈。作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左宗棠为了打消最高统治者的疑虑,主动要求带领所部兴修水利、训练旗兵。

其次,左宗棠“从小从事陇亩,积苦民间”成年后又在全国许多地方任职,他对水患的认识相当深刻。作为有志之士,为民造福也是他一贯的信念。所以在任陕甘总督时,曾花费很大的精力治水,领导军民耕荒种树,开挖灌渠,陕甘一带至今仍有他在任时种植的柳树,人称“左公柳”。

再次,当时朝廷内部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当权派,因平时就与左宗棠不和,阻挠左宗棠的计划,坚持只在永定河下游疏挖河床,左宗棠明确指出:如果不治理上游,那么水流急,含沙量大的河水会不断淤积下游,只疏挖下游是治标不治本的作法,只有在上游山区筑坝修渠,那么河水则会被分流、被拦截,泥沙就会沉淀下来,这样才能减弱河水流势和泥沙在下游的淤积。

慈禧太后批准了左宗棠的奏折,让左

宗棠和醇亲王、恭亲王、李鸿章及顺天府尹游百川、童华等共同实施治水方案。

正当左宗棠准备实施其计划,在永定河大干一场时,由于李鸿章等人的排挤,他又被调出京城,改任两江总督,治河重任就这样落在了王德榜肩上。

真正大规模治理永定河是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综合治理了永定河山峡,在永定河上相继修复了官厅水库、珠窝水库、落坡岭水库,三家店拦河闸,(后三项工程均在门头沟境内),等水利工程,变害为利,永定河边的水利石刻,也成为珍贵的文物遗存,为人们研究永定河的水利史提供着可靠的佐证。

参考书目:

- 1.《光绪顺天府志》
- 2.《清史稿》
- 3.《门头沟区文史资料》
- 4.《门头沟区文物所资料》

(作者为门头沟区文物管理所助理馆员)

故宫筒子河宇墙维修工程的施工与监督

焦占红

故宫筒子河是一条环绕故宫紫禁城的护城河,全长 3500 米,两岸宇墙长 6232 米,经过历史上多次修缮,形制极不统一,墙体多处坍塌,使用材料杂乱无序。为了迎接建国 50 周年,市政府下决心还其历史原貌,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由市政府与故宫出款,由市重点办负责,市水利局二处承包修缮护城河宇墙维修工程。

此工程于 1998 年 6 月到我站办理质量监督手续,市重点办十分重视此项工程,下达明确指标此工程必须创优。为此,我站按重点工程实施重点监督,全面介入此项工程的施工过程,制订相应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并按文物建筑工程验评标准的要求,结合故宫筒子河宇墙、帽石维修工程的实际,制订了“故宫筒子河宇墙城砖质量验收要求”和“故宫筒子河帽石石料验收要求”,并辅以每周二至三次到施工现场进行监督管理。

此次宇墙修缮严格按照明代墙体砌筑形式进行设计施工,部分残缺损毁部位予以复原,大部分墙体拆除重新砌筑。墙体砌筑为淌白墙灰勾灰砌一顺一丁做法,帽石为泥鳅背做法。为保证工程质量,我站分以下几项实施重点监督:

监督施工单位把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提前做好:

1. 施工用原材料:故宫筒子河宇墙、帽石维修工程按照“故宫筒子河宇墙城砖质量验收要求”和“故宫筒子河帽石石料验收要求”,需送检的原材料只有城砖一种,我站要求城砖的抗压强度不小于 7.5 兆帕,砖体密度大于 1600 千克/立方米。

2. 砖料加工:新砖到场后应进行选砖,按其长短、薄厚进行分类,不能满足加工要

求的不得使用,且应先砍出官砖。砖料加工要求如下:

(1) 拉面:砖的看面必须铲平磨光不得有“花羊皮”、刨子印、糙砂轮痕迹、鏊影、釜花、硬疤病等,砖面应跟尺,且不得缺楞掉角。

(2) 截头:截头的长短及砍两肋均要跟“制子”以确保看面的方正,四楞八角应完整,砖的薄厚长短应与官砖相符。

(3) 新砖加工完毕后应按照规定进行码放,应时刻提醒工人码放时注意砖楞不要损坏,且加工面应朝外码放,以便质量检查人员随时进行检查。另外砖的码放高度不宜过高,一般以 10 层为准进行码放。

3. 墙体砌筑用灰和墙体灌注用浆:我站要求墙体砌筑用灰和墙体灌注用浆均需用块灰淋制泼灰,禁止用袋灰淋制,泼灰是用块状生石灰加水反复均匀的泼洒成粉状后过筛而成。墙体砌筑用灰为素灰,是用泼灰加水调成糊状后使用。墙体灌注用浆为白灰浆,即用生石灰加水搅拌成浆状,经细筛过淋后方可使用。

4. 墙面勾缝用灰:用小麻刀灰进行墙面勾缝,灰与麻刀的重量比例为 100:3,麻刀不宜糟腐,应有一定的强度,且加工后的麻刀长度不应超过 1.5 厘米。

5. 石料加工:我站要求凡新添配的石料应与旧料材质基本一致,施工单位应按旧料形式定做,且样品到现场后施工单位必须通知我站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大批订制。根据事先调查取证,聘请老专家鉴定,确定帽石为青白石。帽石形式下为矩形,上为泥鳅背剥斧做法。加工时应三遍剥斧,且弧度圆滑,楞角直顺。帽石采用糙底做法,以确保帽石与灰口的结合牢

固。

测量放线及基底清理:墙体是在泊岸石上进行砌筑。为保证墙体直顺,我站要求必须进行放线。放线前应把泊岸石墙体砌筑处用扫把打扫干净,并用水冲刷干净,待晾干后进行放线。我站要求必须用墨斗弹出三条线,一条轴线,两条边线,墙宽 50 厘米。

墙体砌筑:把砍磨好的城砖沿边线一顺一丁摆放好,摆放时应轻拿轻放,以避免损伤砖楞,且两边丁砖应交错码放。用调制好的素灰满铺基底,满足设计标高要求,如标高相差过大,可适当调整城砖的厚度,但不许集中在一层调整,尽量在两三层之间把标高上的偏差调整至设计标高。之后用素灰砌筑墙体,采取原淌白做法。由于墙体不高,应把砖的好楞朝上,摆砌好的砖按淌白做法砌出 1.2 厘米灰缝,砖的里楞应打上小灰墩,以保证灌浆时灰浆能够流入,避免上灰条,砖砌筑好后应把挤出砖外的余灰刮去,以保证墙体清洁。墙体砌筑的平缝、立缝要横平竖直,游丁走缝要在规范的允许偏差之内。用生石灰浆在已砌筑好的墙体上灌浆。灌浆必须分三次浇灌,第一次只灌 1/3 层厚,且浆应较稀以填充缝隙较小处,第二次用稍稠的浆浇灌,把缝隙填满,第三次仍用较稀的浆浇灌,以弥补第二次灌浆的不足之处,即“点落窝”。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出现墙体灌浆不实现象。灌浆应饱满,既不能出现灌浆不实现象,又不能灌浆灌的太多。

墙面勾缝:勾缝用小麻刀灰采取平缝做法,勾缝灰应与砖面平齐。灰缝横平竖直,深浅均匀一致,勾缝灰无开裂,接茬无搭痕。勾缝应用镢子(宽 7—8 毫米长 15 厘米,呈之字形的铁制工具),禁止用瓦刀抹缝,并注意勾缝时不要损坏砖楞。

帽石安装:在墙体砌至设计标高后,方可进行帽石安装。帽石必须加工好后才能安装,严禁帽石上墙后再修理的做法。帽石安装应按帽石长度进行统一调整,长短

不一的应尽量调整开,不许出现几块短料连续摆放的现象。防止摆砌好后效果不佳。安装时应轻放,防止把以砌好的顶层砖楞磕坏。帽石之间的灰缝必须灌浆饱满,灰口用擦子落实。防止雨水进入损坏墙体。

墙体面层打点:用事先做好的砖面打点墙面,在砖的坑洼处用砖药填满再用磨头磨,即漫干活,然后在已漫完干活的砖面上边浇水边用磨头磨,即漫水活。成活后的墙面应注意进行成品保护。

在具体施工过程中,我站的监督工作深入到施工的每一个细节,每周二至三次到现场检查,发现质量问题及时解决,确保工程质量。我站提出宇墙砌筑及帽石安装必须先做出样板墙,待我站验收样板墙合格后,施工单位方可按照样板墙大面积施工。

样板墙墙体砌筑好后,施工单位通知我站进行验收。为了慎重起见,我站邀请国家文物局晋宏逵;中国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杜仙州、谢辰生等共同对此样板墙进行验收。验收时发现,原淌白拉面做法砌筑的墙体外观效果不佳,经研究发现,这是由于厂家生产的城砖表面粗糙,且大小不均,误差较大所致。为了把此重要工程做好,美化首都环境,经过几方仔细研究,征求专家意见后,由国家局晋宏逵拍板决定:墙体做法改为糙墙细做,细做墙体就是砌筑好后先漫干活打砖药再漫水活,以求得补砖后面墙体颜色的统一;大城样城砖加工好后长度定位 480 毫米,灰缝定位 1.2 厘米。

做法定下来后,施工单位把原样板墙拆除后又重新砌筑了一段样板墙,经我站验收,符合要求,同意施工单位按此样板墙继续施工。经过施工单位的努力,我站数十次的监督检查,此工程于 1999 年 6 月 15 日经市重点办组织验收后顺利竣工。经我站核查,此工程达到优良标准,同意申报市优工程。

(作者为市文物局工程监督站工程师)



“七夕乞巧”古今谈

· 王 丹

中国是世界大国,历史长、民族多,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各地不一,所以一年四季就有许多种节日,较古老的已经延续了二、三千年,其中小部分由名人故事或神话传说而来,大多数和农事生产相关。比如农历七月七日“乞巧节”就是这样一个带着劳动色彩的妇女节(也叫“女儿节”)。节日是从织女、牛郎七夕鹊桥相聚这一星辰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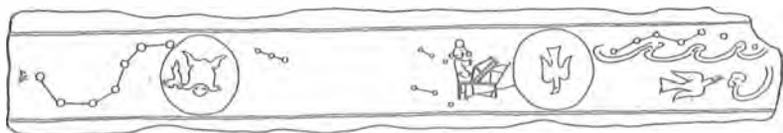
衍生而来的,同时也和农事生产有关,因为依照中国耕织时序的顺排(如元代赵孟頫题《耕织图》的诗句:“七月暑方炽,长日弄机杼。头蓬不暇梳,挥手汗如雨。”所描述的那样),七月里女人们就该开始登上织机织布,以便能在冬季来临之前准备好一家老幼的冬装。故而每逢此节,女人们要在夜里举行对月穿针等仪式,向天上年年机



图一 汉·织女石像 图二 汉·牛郎石像



图四 明·仇英《乞巧图》局部



图三 山东省孝堂山东汉石祠日、月、星象图

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①的织女星乞求智巧,以期提高自己的女工技艺。所以,七夕夜自然就是有劳动意义的“女儿节”了。

一、两星故事

“织女星”由三颗星,即天琴座 α 、 ϵ 、 ζ 星组成一个的等边三角形,在银河西;银河东与“织女星”相对的“牵牛星”则由六颗星组成,它们分别是摩羯座的 β 、 ω_2 、 ξ_2 、 π 、 σ 、 ρ 六星。中国自古天文学就十分发达,人们在观察天象时佐以现实中的农耕生产等活动,渐渐产生了神话。古籍中所见到织女、牵牛被人格化最早的文字是《诗·小雅·大东》的“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当时的牛郎、织女星还仅仅是众多日月星辰神话中的两个独立形象,它们之间并不见有瓜葛,

更谈不上爱情。然而“牵牛”、“织女”的称谓,并非一般符号那样简单,它们给后世留下了创造文学故事的无限空间。

汉代两星间的爱情故事就有流传了。西汉时期,在人间出现了具体的实物人格化形象,比如建在西汉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0年)修筑的昆明池畔的牵牛、织女石像(图一、二)。两像虽然形象古拙憨实,很难与人们印象中飘渺的神仙联系在一起,但有班固《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右牵牛而左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南北贯通,以象天汉。”以及张衡《西京赋》:“昆明灵沼,黑水玄祉。牵牛在其右,织女在其左。”等文献证明了它们的身份。解放初期,在西安城西约40里的斗门镇东南的两座小庙里,仍可见到这两座显然是两位普通劳动者形象的石像,他们被当地人亲切唤做“石爷”、“石婆”^②。东汉时



图五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金代七夕铜镜拓片

图六 清院本十二月令图局部



期牛郎织女故事不仅内容日渐丰富,而且对其感情的描述也细腻低婉。《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亲,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说明当时的故事已是一幕恋人受着分别之苦的爱情悲剧。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山东省孝堂山东汉石祠三角石梁梁底刻的日、月、星象图,从图像上可以看到坐于织机上孤独劳作的织女形象(图三)^③。

三国时期,许多诗赋中可见借牛郎织女故事抒发爱恋和思念之苦的词句,比如蔡邕《青衣赋》:“悲彼牛女,隔于河维。”其中最著名的是曹植《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它是迄今见到的最早明确牵牛、织女夫妻身份的文字材料。

魏晋南北朝以后,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广泛,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

‘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后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嫁牵牛。”表明牛郎织女故事基本定型。从此以后,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天,在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留下一份或浓或淡的情愁。

二、过节

在人们心目中,织女是女红的顶尖巧手,如果得到织女的保佑,可以使自己的女红技艺进步提高。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以后,七月七日渐渐的就成为一个重要节日了:妇女们一定要在七夕月夜里对月穿针乞求智巧。此外,又因“织女主瓜果,”^④人家还多设瓜果祭祀,以求保佑瓜果丰收;民间七夕前后又有做(或买)“摩睺罗”^⑤娃娃作为应节礼品互相馈赠,祝

图八 莱州地区七夕节摆设的供桌



图七 巧饼

福家人丁兴旺的风俗；还有操办曝衣晒书等应节事宜……。故此，每当秋风带着丝丝凉意驱走暑热的时候，鹊桥相会的幸福气氛便从天上扩散到凡尘，七夕的活动渐渐在人间热闹起来了。

1. 乞巧

所谓“乞巧”，一是“乞”，即设置香案拜祭织女，乞求智巧：首先要“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⑦然后，女孩子们凭借月光穿针引线，如果穿针顺利，则意味着得到了冥冥中织女的佑护。仪式的规模从宋·赵伯驹《汉宫图》中可见一斑：庭院、高阁、车驾、仆从、红毡铺道、宫娥成行……，足见古时该仪式的隆重、奢华(图四)。若有几个同龄好友凑在一起，用五彩丝线穿七孔针、九孔针，则又含有赛巧的意思了。“先(穿)完者为得巧，迟(穿)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

巧者。”^⑧明代仇英绘《乞巧图》里有几名女子在庭院里对月穿针乞巧、赛巧的景致(图五)，这样的比赛，其乐融融，正是年轻女孩子之间既相亲相爱又争强好胜的心态写照。

乞巧之二是“卜”，乞到巧后，当然是想知道得巧的多少，总要卜问一番，通常是捉来小蜘蛛关在盒子里次日察看它织出的丝网，凭借“结网之疏密，为得巧的多少。”^⑨唐·祖咏《七夕》诗中是这样描写乞巧的：“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字里行间散发出女儿节里轻快活跃的气氛。

明清两朝，又新出现“丢针”的游戏，取代了蛛网卜巧。即于初六或初七，设水碗于花下，通过阳光暴晒，使水面生膜，至初七日正午，妇女们把平日里缝衣、刺绣用的小针轻轻投入碗中，在表面张力作用下，针多会浮在水面上。然后研究水下的针影，

若像云,或花、鸟等物则意味乞巧成功,或针影粗如棒槌、直如轴蜡则象征丢针的妇女粗拙不巧,这种卜巧方式使女孩子们有喜有悲,甚至严重到有的人为之哭泣起来了^⑧。

2. 乞巧习俗的沿革

乞巧的习俗,在汉代已初见端倪,据《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到魏晋南北朝时,乞巧习俗已极为普遍。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上:“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偷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比赛所用的“七孔针”想必穿起线来让人觉得又紧张又有趣;“喜子”即蜘蛛,如果有它在瓜果上结网,往往被认为得到织女的青睐,必然乞得织女织成“云锦天衣”的技巧。

“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崔颢的《七夕》诗形象说明了唐代七夕乞巧风气的盛行:上至皇族权贵,下至平民百姓,都十分重视此节,甚至还专门举行各式庆典。据王仁裕著《开元天宝遗事》上称:玄宗李隆基也喜欢组织嫔妃宫女在每年七夕热闹一番,于是在宫中建了乞巧彩楼,楼上陈列瓜果酒炙,以祭祀牵牛、织女二星;又赐给嫔妃、宫女七孔针、九孔针、五色线,于月下举行穿针、比赛乞巧;宴乐歌舞通宵达旦^⑨。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隧道清理出土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奉养通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石碑上,记载了懿、僖二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等皇室贵戚、内臣、僧官供奉给真身的金银宝器、衫袍、裙衣……其中就有“七孔针一”字文的记载。可见七孔针在唐代是极珍视的贵重器物:它不仅在宫苑节日里有不可缺少的礼器地位,也可作为宝物奉献给神冥。令人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中并未发现七孔针实物。

两宋时期,乞巧活动更为丰富。七夕

节已不仅限于七月初七一天,节期自入七月后就开始了,规模浩大,热闹非常。《东京梦华录》载:“……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儿童辈特地新装,竞夸鲜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盒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平民百姓因财力限制,多用竹木、麻秆结乞巧棚过节^⑩。吴自牧《梦粱录》中描写七夕也是:“其日晚哺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著新衣。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回忆南宋旧俗的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对杭州城的七夕女儿节也有类似记载:“七夕节物,多尚果食、茜鸡,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恒钗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宫姬市娃,冠花衣领皆以乞巧时物为饰焉……”。可见,宋代的七夕已演变为一个相当隆重而且奢华的节日,甚至连装蜘蛛的小盒子在富贵人家也是用“金银小盒”^⑪不再是一般之物。

金、元时期七夕节仍旧代代沿袭,于每年七月里如火如荼地举办着。在一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的金代铜镜上,也铸着七夕节里天上牛女相会、人间月下乞巧伎乐表演的场面(图六)。元·熊梦祥著《析津志》里描写的“七夕”俨然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女儿节:“宫廷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曰女孩儿节。占卜贞咎,饮宴尽欢,次日馈送还家……”。

明朝,上至皇族官宦下至平常百姓对七夕乞巧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据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载:“七夕宫中最重。市上卖巧果,人家设宴,儿女对银河拜。”每逢七夕,人们多在衣领装饰乞巧时物,甚至“官眷内臣穿鹊桥补子”^⑫以渲染过节的气氛。而且此时又兴起了一种新的乞巧方法——“丢巧针”来验证今后女红是否会进步。清朝满族人也对七夕节乐此不疲,只是称“丢

针”为“髻(音‘曙’)巧”,方式与明代的基本一致。《清嘉录》里有载:“七日前夕,以杯盛鸳鸯水,掬和露庭中,天明日出晒之,徐俟水膜面,各拈小针投之使浮,因视水底针影之所以,以验智鲁,谓之髻巧。”也有一首杭州人的诗专门描述髻巧的:“穿线年年约比邻,更将馀巧试针神。谁家独见龙梭影,绣出鸳鸯不度人。”清院本十二月令图(图七)中画的就是几位妇女正围在案桌上的小水碗边“髻巧”呢!清末民初,南方各地更有以麦芽、豆芽、瓜蔓等作为巧芽,在七夕夜里问巧、赛巧的。多是摘下巧芽投入水中,如上浮并呈簪、钩、花等美丽形象的,就算得巧。民间的七夕歌谣也有许多,如:“巧芽芽,生得怪。盆盆生,手巾盖,七月七日摘下来,姐姐妹妹照影来。又像花,又像菜,看谁心灵手儿快。”

从历代七夕乞巧习俗的沿革上看,其形式虽在各个朝代稍有差异,但在社会生活中它一直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工业化生产的兴起,传统手工业受到极大冲击,人们不再以高超的女红技艺做为建立美满幸福家庭生活的必要条件,七夕节才由此丧失了其普遍性、社会性。引退到一些远离工业化城市的小乡村里。

3. 今天的乞巧节

山东省莱州湾沿海地区,在很多平平常常的农民家里,每年七月都能见到“做巧饼”、“供姐姐”(当地对织女、牛郎有自己更亲切的称呼:“姐姐”、“姐夫”)的风俗场面。

一进七月,母亲们就忙里偷闲,为女儿的节日张罗起来。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发绿豆芽,在当地方言中叫“生巧芽子”。一般在七月初二左右就着手这件事,以使豆芽在初七那天就能长得有12、13厘米高,密密匝匝的一丛。供于织女牛郎像前,为孩子们卜巧用。

其次是初五做巧饼。巧饼是用七种颜色的面团拼接在一起,再用专门模子加工成各种图形的生胚后烤制而成的面饼。彩

色面团是以天然植物捣出的汁液为“染料”和面粉染成的。“染料”取自时令蔬菜:红的是红苋菜、绿的是豇豆叶、黄的是姜黄、黑的是高粱节上生长的乌霉、紫的是紫草、杏黄是苏木,再算上面粉本色白,一共七种。染好色的面团分别被揉成手指粗细的长条,排放在一起后用刀切成见方小丁,颜色混杂地拼在巧饼模子里,按紧后磕出,巧饼的生胚即做成了。巧饼模子在集市上就能买到,木制的,有各种花样:鱼、鸟、花、蝶等等,邻居间彼此又可互相借用,这样每家做出的巧饼样就很多,烤熟后花花绿绿的,可爱至极。也可以把它们一个一个用线穿起来,中间隔以寸把长的高粱节,二十几个为一串儿,家中每个孩子、大人各有一串儿,挂在墙上,慢慢的直吃到来年。巧饼是充满母女亲情的工巧,纯朴真挚,不带造作商品市贾气息。(图八)

做巧饼的彩色面团还要留一些做一个“姐姐筐箩”,即用红色面做底,绿色面做筐箩的边,筐箩里放入黑色面做成的小剪刀、小鞋子,及各色面搓成的小针、线等。烤熟以后代表针线筐箩,初七时与巧饼一起供在织女像前面。

所有活计,年纪小的孩子由妈妈给做,年长些的姑娘则自己跟着母亲一起忙。高粱地里隐约可见寻找乌霉的身影,东家西家传出用石臼捣蔬菜汁的“嗒嗒”声,另有邻居之间互相交换巧饼模子时的说笑,交织着焙烤巧饼散发出的麦香,整个村庄沉浸在由母亲和女儿们制造出的亲切温馨氛围里。

初七白天,妈妈要在西厢房窗下摆设供桌,张挂牛郎织女画像,画像大多是年画市场上买的鹊桥相会故事画。供品一般是几种时令水果,当然少不了花红李子^⑭。再置上香炉和生好的豆芽,摆放好巧饼、姐姐筐箩,香炉前放一碗清水,这便准备停当了。(图九)

点灯时分是最热闹的时候了。燃香拜祭之后,女孩摘下豆芽的两片子叶一边念着:“漂针、漂线儿,姐姐教我扎线儿。”^⑮—

边将子叶轻扔到水碗里,众姊妹、妈妈、婶婶此时都围过来看那子叶在水中的倒影呈现什么影像,往往听到这样兴奋的称赞声:“哎呀,是朵花儿呀!”“哎呀,是个蜂子呀?”^⑩这些都是吉语,意思是这个女孩乞巧成功,今后能获得织女的智巧;如果众人左看右看仍是两片“Y”型的叶子,粗拙得像搅拌牲口草料用的叉子,则象征织女不愿赐巧。此刻孩子们是兴奋的,几个要好的小姊妹常常凑在一起,挨家挨户轮流重复她们的占卜。

男孩子们有凑趣儿的,走上来掐片巧芽念句:“漂笔、漂墨儿,姐夫教我写字。”也占卜一下。最喜那些十四五岁正处无邪年纪的小顽童,被姊妹们欢快的情绪骚动得怎么也坐不住了,找来个竹篓再在其上插两个玉米棒子往头上一扣,算是扮成老牛,在供桌前翻滚闹笑,添一道风景,混几个果子吃。

莱州湾人一向对女子的针线活计看得很要紧。心灵手巧的闺女为人们所怜爱,更惹青年男子追求。少女乞巧是为了抓紧学习针线女工,以使婚后夫妻恩爱,生活美满。天上女红技艺高超的织女是少女们心中的保佑神。民谣中这样唱:“青花红,紫李子,姐姐教我纳底子。”^⑪那些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子,对人生刚刚有些朦胧的触及,就知道闹着要家里为她在七月初七举行“供姐姐”的仪式,以保佑自己今后女工出类拔萃,高人一等。认真地说,母亲对过这个节才是最热衷的,或许孩子的情热中多少掺和着图热闹好玩的情绪,惟有母亲才真正对女儿的未来怀着强烈的祈福,因为世上的每一位妈妈都对自己的孩子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三、结语

七月七的夜晚是属于孩子们的,尤其是女孩子的。从经史古籍中曾无数遍的提起它种种来历和举行的仪式上,这个古

老节日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年复一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七夕节昔日的隆重和辉煌正在民间逐渐淡忘消失。愿这个传统能永远的流传下去,使千百个母亲从女儿闪烁的眸子中看到对未来的向往,也使千百个女儿成人以后,额外拥有一份少女时代幸福温馨的记忆。

① 梁殿芸《小说》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

② 《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顾铁符/《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1期。

③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罗哲文/《文物》1961年4、5合期。

④ 《续汉书》载:“牵牛主关梁,织女主瓜果。”

⑤ 《岁时纪事》:“七夕俗以蜡做婴儿形,浮水以为戏,为妇人宜子之祥,谓之化生。本出西域,谓之摩睺罗。”

⑥ 引自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⑦ 《元掖庭记》:“九引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孔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

⑧ 引自《武林旧事》卷三。

⑨ 《帝京景物略》卷之二·春场:“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欢;女有泣者。”

⑩ 《开元天宝遗事》:“宫中七夕,以锦彩结楼殿,高百丈,可容数十人,陈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穿针乞巧,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皆效之。”

⑪ 引自《岁时杂记》。

⑫ 《梦粱录》:“……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盛之,次早观其网丝圆正,多曰得巧。”

⑬ 刘若愚《酌中志》:“初七日‘七夕节’宫眷内臣穿鹊桥补子,宫中设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乞巧针。”

⑭ 相传“姐夫”牛郎姓李。

⑮ “扎线儿”为莱州方言,指刺绣。

⑯ “蜂子”为莱州方言,指蜜蜂。

⑰ “纳底子”指纳鞋底子。

(作者为北京文物研究所馆员)

北京市文物局
1999年二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3月31日至4月15日 释迦牟尼佛舍利在雍和宫观瞻。

4月1日 完成天安门至午门、正阳门箭楼地区整治规划方案的落实。

4月5日 天安门内侧地面大修工程开工。

端门油饰彩画工程开工。

4月7日 历代帝王庙围墙修缮工程开工。

4月8日 先农坛神厨抢险修缮工程开工。

4月9日 恭王府配房修缮工程开工。

4月10日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扎哈洛夫夫妇参观了友好宾馆、国祥胡同2号、鼓楼东大街255号三所保存较好的四合院。

4月12日 市文物局接收了北京市公安分局移交的1991年罚没的涉案文物16件。

4月15日至16日 举办“局属博物馆藏品软件应用”培训班,局属博物馆的保管部人员共18人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是为在局系统内推广藏品电脑管理做准备。

4月16日 完成了对润鸿拍卖公司春季大拍的700件文物拍卖标的的鉴定及审批工作。

4月20日 香山玉华岫修复工程开工。

4月23日 贤良祠修缮工程开工。

4月27日 完成了对太平洋拍卖公司春季大拍的551件文物拍卖标的的鉴定及审批工作。

4月29日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对丰台区公安分局查获的33件涉案文物进行了鉴定。

4月底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网站”正式与“首都之窗网站”连通。

网址为 <http://www.bjww.gov.cn>

5月5日 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委员视察云居寺。

5月11日 原北大法学所抢险加固工程开工。

对丰台区公安分局查获的13件涉案文物进行了鉴定。

召开科技自然类博物馆藏品管理软件开发研讨会,北京地区各科技类博物馆的藏品保管人员应邀参加了会议。

5月12日 组织市政协委员视察东四北平房保护区。

5月13日 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墙工程开工。

5月17日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对北京市公安局查获的(画稿册)涉案文物进行了鉴定。

5月18日 完成北京纪念“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组织工作,并在这一天在全市设北京古代钱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四个主会场进行宣传活动。

5月19日至5月21日 各区、县、特区文物市场管理人员,在大觉寺培训中心进行了业务培训。

5月20日 原花旗银行加固工程开工。

就《北京市社会文物流通管理办法》的立法,与市政府法制办一同到古玩城、潘家园旧货市场进行立法调研。

5月20日至6月1日 全市博物馆开展“六·一”儿童节对全市少年儿童免费开放活动。

5月24日 完成了对中鸿信拍卖公司春季大拍的538件文件拍卖标的的鉴定及审批工作。

文物研究所对在东单路口市政施工中

发现五件铜器,进行妥善的处理。

5月25日 市政府组织召开《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立项论证会。市人大常委会文卫体委员会、法工委,立法涉及的国家文物局、相关委、办、局及部分博物馆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论证清楚,同意立项。

5月 对东城区交道口办事处城管监察支队在段祺瑞执政府大门西侧的违章建筑进行了查处。

5月 对孚王府东侧“九爷府酒楼”的违章建筑进行了查处。

6月1日 北海五龙亭油饰工程通过验收。

6月3日 正阳门箭楼粉刷工程开工。市政协委员视察门头沟区川底下村。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对宣武区分安分局查获的43件涉案文物进行了鉴定。

6月10日 汪光焘、刘敬民副市长主持的圆明园遗址保护协调会。

6月11日 为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由市文物局投资维修的河北省泊头市原华北局城工部旧址抢修工程开工。

6月14日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对宣武区公安分局查获的数件(硬木家具零件)涉案文物进行了鉴定。

6月15日 故宫筒子河加固工程通过验收。

完成瀚海拍卖公司春季大拍的1181件文物拍卖标的的鉴定及审批工作。

6月17日 七王坟抢修工程开工。

6月21日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完成改陈工作,《中国建筑展》当日正式对外开放。

6月27日至7月2日 为打击非法交易文物行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文物及文物监管旧货市场的经营秩序,市文物局联合市工商局、市公安局对本市旧货市场、宾馆饭店、

旅游景点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对广汉堂(凯宾斯基饭店内)、天红市场(天坛公园坛墙内)等无照经营的单位责令其立即停业,对个别经营秩序较差、超范围经营的单位提出了限期整改的要求。此次检查中,暂扣涉嫌文物和其它禁止流通的物品200余件。

6月30日 长辛店关帝庙戏台抢修工程开工。

6月 文研所完成故宫筒子河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达400平方米。

截止6月底 完成古玩城市场的日常文物监管工作向朝阳区移交的工作。

上半年 审批利用古建筑拍摄影视31项,审批和监督实施大型活动7项。

上半年 完成了对42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巡视检查,并对18个市保单位进行了抽查。共查出问题和隐患110起,其中监督整改86起。

局属博物馆'99 二季度
参观人数一览表

单位简称	总人数	成人人数	学生人数	外宾人数	其中免费人数
艺博	17036	2245	744	14047	6593
辽金馆	2158	1613	536	9	2085
首博	550000	30000	20000	500000	500000
大觉寺	22908	16639	1926	132	4211
大钟寺	18788	10109	1263	2994	4422
石刻馆	7382	3458	1457	1426	1041
徐馆	15000	8000	6000	1000	6500
德胜门	4405	2814	1341	250	1600
西周馆	5569	2755	2755	59	450
大葆台	3389	1092	2037	260	1370
智化寺	963	714	147	102	1971
白塔寺	48000	48000			
团城	3446	2013	1415	18	1390
古建馆	6月21日才对外开放				
正阳门	尚未对外开放				
总计	699044	129452	39621	520297	531633

(本表由博物馆处提供)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1999 年第 3 辑/张展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9

ISBN 7-5402-1187-3

I.北… II.张… III.历史文物—北京—期刊 IV.K872.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574 号

北京文博(1999 * 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 782 信箱

煤炭印刷厂制版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定价:10.00 元

房山云居寺石经的保护

云居寺创建于唐贞观初，经历代修建形成五进院落六重殿宇，两侧有配殿和帝王行宫，南北有二塔相峙，依山带水，气势宏伟。

云居寺石经世称“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隋大业年间由高僧敬琬发起刊刻，历辽金元，到明崇祯结束，长达一千多年，共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石，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瑰宝。

云居寺还珍藏着2.2万卷明代纸经——《南藏》《北藏》、7.7万块清龙藏木版经，都是绝世珍品。云居寺尚存唐塔7座、辽塔5座，以及隋唐以来历代的碑刻文物。

石经山雷音洞，四壁嵌有静琬早期刻经146块，洞内四根隋代雕刻的石柱，并称“千佛柱”，共雕佛像1056尊。隋大业十二年曾于洞内奉安释迦佛舍利。

云居寺石经全部珍藏在石经山9个藏经洞和寺内的藏经地穴中，藏经地穴10082块石经，50年代出土后，出现风化，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政府及文物部门为妥善保护石经，决定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回藏地穴保护。1999年9月9日完成归藏工程，在寺内举行归藏大典。
(图文：杨亦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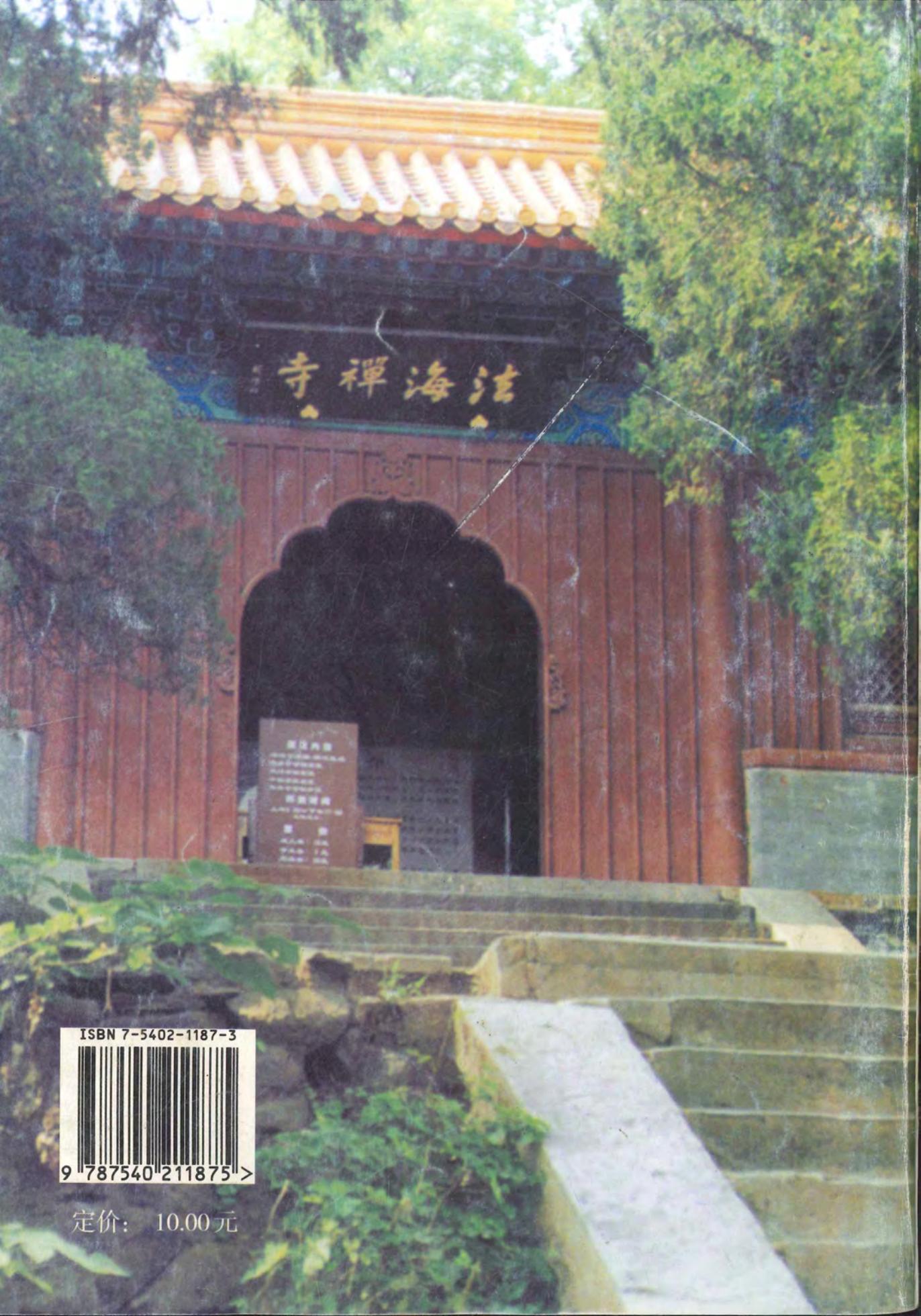
• 存放于库房的辽金石经



• 50年代工作人员进入藏经洞发掘拓印石经



• 即将竣工的地穴藏经馆外景



法海禅寺

法海禅寺
简介
法海禅寺位于...
始建于...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联系电话...
地址...

ISBN 7-5402-1187-3



9 787540 211875 >

定价：10.00元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